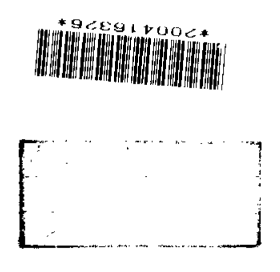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萧克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百年潮》精品书系;2)

ISBN 7－80109－265－1

Ⅰ.我… Ⅱ.萧… Ⅲ.政治运动－中国－史料 Ⅳ.D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3711号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著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字　　数**:302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 毛泽东谈到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的讲话提纲手迹



▲ 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 何干之与刘炼夫妇



► 胡风与晓风

▼ 胡风的私人通信成了罪证后得到了这张逮捕证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逮捕證**

號

年 月 日

部長




◀ 何干之与国际友人在一起

▼ 历经反右风涛后的韦君宜（右）与弟妹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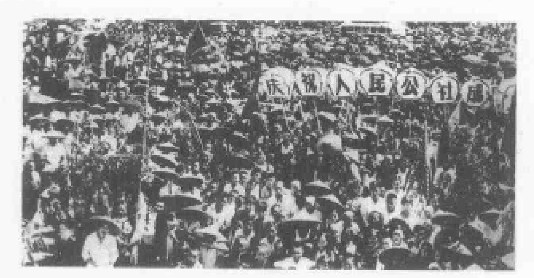




◀ 脱下军装的萧克有了一次与毛泽东主席亲切交谈的机会

▼ 在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的萧克，没有想到后来会成为"第一次军内大批判"的靶子






▲ 乌托邦：狂热的“人民公社”运动

▼ 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



▶ 1959年3月上海会议后，李锐陪同周恩来视察新安江水电站工地



▼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从盲目地追求工农业高指标开始的，各地不断地报高产“放卫星”，浮夸风盛行。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



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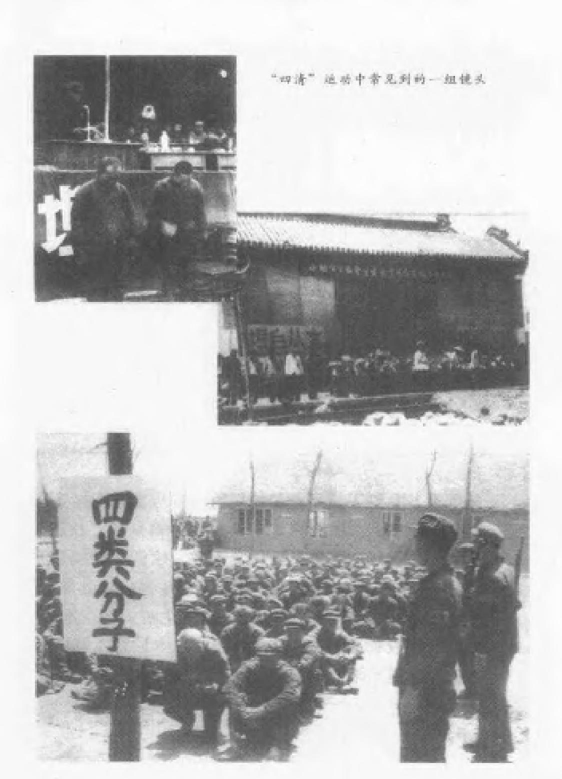
RENMIN RIBAO

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星社創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紀录






“四清”运动中常见到的一组镜头



▲ 批判会的常见镜头 ▼



◀ 因《海瑞罢官》而罹难的吴晗与夫人及女儿

▼ “文革”中批斗邓拓的一个镜头





◄ 龚育之近影

► 六十年代初的龚育之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群众



▲ 江青在“文革”期间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人民日報

# 中共中央决定改組北京市委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記 吳德同志任第二书記

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学党委

##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通告的发表，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北京不再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 "文革"中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批斗的情景

▼ 1966年12月24日，北京军事院校的红卫兵用箩筐把罗瑞卿大将抬进批斗会场。当时罗瑞卿被加上"篡军反党集团头子"的莫须有罪名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号召"炮打司令部"。图为群众游行表示拥护毛泽东的大字报

▼ 1967年2月11日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





◀ 1967年初"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中的中国留学生们 ▼。





解放军报

这样介绍"体会"对

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

本文涉及的1974年1月17日和2月15日《解放军报》

▼ 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引来了由江青操纵的另一篇文章《这样介绍"体会"对吗？》，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

▼ 解放军某部官兵批林批孔大会会场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

批林彪与孔孟之





◀ 晚年的刘冰与夫人

▼ 刘冰与柳一安（前右）、惠宪钧（后右）、吕方正（后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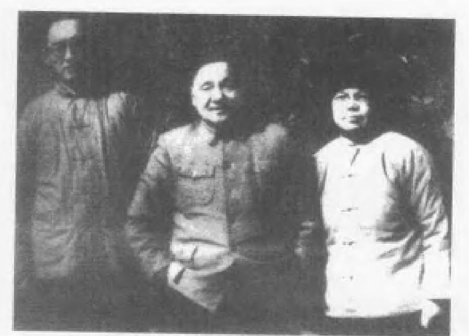




◀ 1975 年 11 月 18 日，吴德在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示

▼ 1977 年 12 月，邓小平在广州接见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右二）等有关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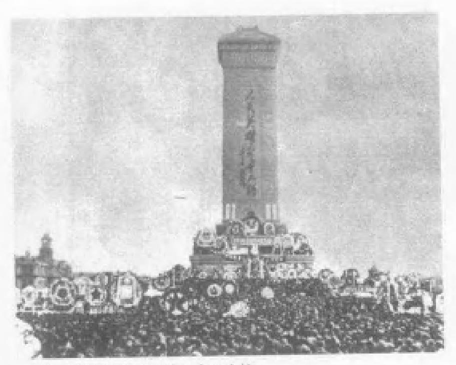




▲ 1973 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他离开江西前与夫人及秘书的合影

▼ 1974 年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





▲ “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

▼ “四五运动”时，一位工人慷慨陈词，发表演说





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天安门诗抄

◄ 197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华国锋的题词

影印自197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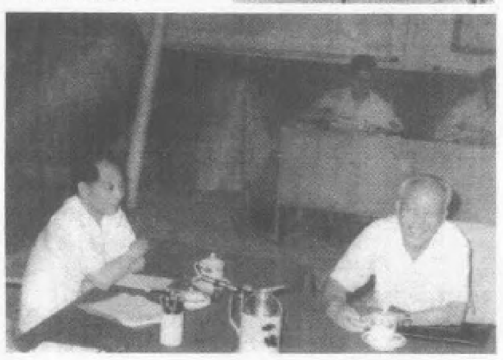
▼ 1977年1月于光远在天安门广场



▶ 历尽“文革”的磨难，李雪峰依然精神饱满



▼ 胡耀邦和万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 前　　言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甚至,“文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了,从“文革”像章、“文革”歌曲、“文革”中的样板戏,直到以“文革”为题材的书籍…… 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也是当年我们许许多多人冥思苦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吗?

“文革”是怎么发生的?直至今日,人们更多强调的仍旧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看到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化官僚横行一方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他们往往会口出惊人之语:“真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幻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杜绝各种社会腐败现象,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规模大些的运动吗?建国以来,这样的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

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文革”搞了几年之后，毛泽东自己就意识到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的思想已成定式，钻进“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出不来了。无可奈何之余，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讲这话时，已是垂垂老矣。人老多健忘，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从 1957 年到 1959 年，从 1959 年到 1963 年，从 1963 年到 1966 年，他亲自发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隔最短者不足两年，最长者也不过五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何使得？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辑录这些亲历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暴露所谓的“阴暗面”。事实上，具体到某一个运动本身的社会效果

和政治效果而言，人们今天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并且，即使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不少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当初发动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动机。问题是，靠运动，或者用“文革”这种令人发指的“打倒一切”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吗？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文革”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仍然有人会赞赏“文革”，主张再搞运动呢？除了那些“文革”中的受益者和少数思想极端偏执者外，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出解决的出路何在。

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问题，但很多国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我们的有些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改革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

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如同朱镕基总理在本届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民怨沸腾"的局面,从而使许多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怀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产生了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糊涂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不行了。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编辑这部集子,也是希望读者能够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光明前景: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编辑这部集子,更是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了解:搞运动不是出路,中国决不能再搞运动。无论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搞运动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避免重犯"文革"的错误在于此,恢复人民对改革

开放的信心在于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在于此。

编　者

# 目　　录

## 1. 一段公案的由来

## 2. 反右亲历记



## 3. 何干之幸免被捕的背后

## 4. 文坛反右风涛

## 5.“劳改纪实”

## 6. 殉情自杀者遗书



## 7. 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

## 8. 给毛泽东的二次上书

## 9. 亩产13万斤“大卫星”的幕后

## 10. "四清"札记

## *11*. 胡耀邦 *100* 天的超前改革

## 12.《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 *14.* 红卫兵红场流血记

## 15. 九届二中全会见闻录

## *16*. 军报变相停刊事件始末

## 17. 冒险上书揭发迟群

## 20.《人民日报》与天安门事件

## 21.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 李慎之

# 一段公案的由来

## 1.1 主张"大民主",受毛泽东点名批判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

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当年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平解放时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天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按:195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16开8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一定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

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制度，党内有资格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的本来只有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一人，但是，第一，邓拓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过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指名要吴冷西代替邓拓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而为他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完全在我个人的

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120块16开的版面，尽管是老5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有二十三四万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当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

整个1956年，在人们心目中是越来越宽松的一年。高饶事件与先是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后来又扩大为肃反的运动都随着1955年过去了，也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这一年开头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然后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了。3月份的苏共二十大推倒了斯大林，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去除了不少思想上的压力。接着就是4月份毛主席发表有很多新思想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使更多的人心情进一步舒畅、思想活泼。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

## 1.2 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的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 selective eyes 或 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他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达到的结果。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至于毛

主席引用王风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是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我还因此而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要搞"不断革命"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时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却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促使我这样想的原因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王飞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相互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得最多。"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

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 7 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 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古来未有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另外，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话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

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家就住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还是并不在意。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8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启程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是全程参加的）。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号召“志士仁人学习哥白尼、布鲁诺”，进行鸣放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生病住院，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移”，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

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尤其是毛主席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头上要长犄角"，"要敢唱对台戏"，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以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这是我的功劳。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参"之外出了20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孰先孰后……等问题的议论"。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

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是最权威的。

## 1.3 “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后，突然又在十年“文革”中大红大紫起来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无人理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下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仅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五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源是在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这个人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打心眼里反对“四大”，迄今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

自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纵然自愿千刀万剐,又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当初提出'大民主'的人。"20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为什么我"以辞逆志"而终于失之?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60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或者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10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全文,读完之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要是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和林克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

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和林克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预先出告示,到期(明年)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前半年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包括党的干部在内)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 1.4 "大民主"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的一桩公案。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而向历史交待一下的义务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有点"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所厌恶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没有成什么气候，然而在欧美的大学里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彻底消灭官僚制度的主张。

事情已经过去整40年。我年逾七旬，行将就木。我个人虽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而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派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我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

了怀疑以至异议，但是那是到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李　新

# 反右亲历记

## 2.1　有人想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的帽子安在我头上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

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而不致让当代著名的"史家"把这段痛史掩盖过去,或把其中的是非功过,胡乱地编排以至任意地颠倒。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6年"胡风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这当然是经过最高领导决定的。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

1956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校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校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他于是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故意装出很开明大方的样子,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到大家(主要是知识分子)都说了话,他抓住一些人说话过了头,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包括全国知识分子中许多精英在内的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便给他们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其实,什么话算是过了头呢?就拿"轮流坐庄"来说吧,只要实行民主共和,总不能像袁世凯那样由终身总统而后就当

皇帝。哪有领导人实行终身制的民主国家呢？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在各种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家的领导人，只能是终身制，也就是只能出现事实上的皇帝。不管它的名称叫什么，或者叫委员长，或者叫总统，或者叫主席，其实质都是一样。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事实上都是皇帝，不过名称上不同罢了。袁世凯的愚蠢，就在于他非称为皇帝不可。在中国，国家的领导一定是终身制，政党的领导也得是终身制，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高岗、饶漱石提出党的主席要"轮流坐庄"，他们要倒霉是必然的。一个真正实行民主的党，它的领导人，虽不一定是轮流坐庄，但也绝不该是终身制。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胡锡奎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

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女)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地，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

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胡锡奎的心是多么的阴险啊!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

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岗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吹嘘她所在的《大公报》。她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 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岗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 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 4 月 3 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岗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

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 2.2 有些系总支领导,心胸狭窄,借机整人

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总支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子。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

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 2.3 葛佩琦受尽折磨被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看了这些材料,联想当时的情况,觉得这场斗争实在毫无道理,而且太令人可怕了!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回忆录中说"篡改了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聂真在党内是素来以态度温和著名

的。现在他早已知道毛主席“引蛇出洞”的策略，于是便以温和的态度去对待葛佩琦气愤的态度。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毛主席、党中央认为当前“形势大好”，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

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我们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做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任了人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请看，把50多万人，一举就打成了"右派"，而要改正一个错划的"右派"，竟是这样的困难！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以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

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1984 年 6 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 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对 1957 年人为制造的那场所谓反“右派”斗争，既感到无限的愤慨，又感到异常的后怕。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聂真（表面很和善的好人）分明知道“引蛇出洞”的策略，他竟然把葛佩琦这样一个老党员也当成一条蛇引出洞来打了！胡锡奎那样狠心的人，要把我打成右派又何足为奇？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干了。只是因为吴老识破了他的阴谋，采取巧妙的措施才阻止了他的阴谋得逞。《党内参考资料》的假报导和《人大周报》的捏造何其相似！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这太可怕了！只有像吴老那样的辛亥老人，经历过无数世变沧桑，才能看破各种阴谋、阳谋、诡计、巧计，而且只有像吴老那样的仁人志士，有胆有识，才能在共产党内，在毛泽东的无限权威之下救出不少的人来。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

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 2.4 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中,我也有一份责任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

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但胡锡奎一直从中作梗。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改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高级党校的情况也应该写一写。虽然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一些具体情况我很了解,这是杨献珍当时的秘书在80年代详细告诉我的。杨献珍是我们党内的一个

长者，说话很刻薄，但心肠却很好。我们都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跟那种“豆腐嘴，刀子心”（口蜜腹剑）的恶人完全相反。反“右派”初期，他领导的高级党校没有打到一个“右派”。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高级党校党委常委找去谈话。刘邓问他们高级党校反“右派”没有？杨说反了。又问：打倒多少“右派”？杨说：查了，一个也没有。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决定高级党校要重新展开反“右派”斗争。常委们回去后，为展开斗争，就让杨献珍靠边站了。刘邓都认为杨的立场有问题，是否该把杨划成“右派”呢？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杨的领导下工作，而且都认为杨的为人不错，所以没有把杨划成“右派”，而把他的秘书马鸿模划成了“右派”。

80年代马鸿模的“右派”被改正了以后，杨献珍把他调到身边，替他编辑自己的文集。因为从1940年起，我就是杨的学生和他的忘年交，我们的私交很好，他有事总爱找我帮忙，也很能听我的意见。所以马鸿模编辑杨献珍的文集时，我无形中成了编辑和出版的顾问。

一天，我问马鸿模：你给杨老当秘书，被划了“右派”，他怎么还能请你替他编文集呢？马说：不是杨老把我打成“右派”的，是我替他当了20多年的“右派”。把我打成“右派”确是天大的冤枉，若按当时的情况，杨老不仅立场是右的，他的思想也实在右得可以。从1956年开始，他就极力反对个人迷信，1957年请民主人士帮助我党整风，他是赞成的。但因听不进意见就反过来整人，他很不赞成，特别是“引蛇出洞”的策略他更反对。他说：一个堂堂的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

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他的这些话,我没有揭发,若揭发出来,他可要倒大霉的。他的思想一直右下来,1958年他反对大跃进,到处讲话,甚至作报告,把大跃进挖苦得不成样子。他和黄松龄回到湖北,当众要王任重拿出100多斤重的南瓜来吃,使王任重十分难堪。这些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真的倒霉了。听了马鸿模的话,我补充说:献珍同志的右,是一贯的。1940年我们在北方局讨论《新民主主义论》时,他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那时,我们年轻人思想都很左,大家都反对他的意见。后来因争论敌后根据地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算新民主主义性质,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回电说:只要建立了我们的政权,就算新社会了。我们听见回电都很高兴。但献珍同志不服。他说:我们在太南的几个县政府跨了,能说社会性质变了?如果我们的县长再回去,能说社会性质又变回来了?原来社会性质就在我们县长的马背上,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有人听了他的意见后说:这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嘛。献珍同志听了,更为不满。他说:山沟沟里没有资本主义、没有无产阶级,哪来无产阶级思想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山沟沟里,那是可以的;如果说山沟沟里也能产生马克思主义,那就荒谬绝伦!总之,献珍同志是一贯坚持真理的,只要不合乎真理,不管是谁说的,哪怕明知是毛主席说的,他也不赞成。在可能的条件下,他甚至公开地反对。正因为这样,1957年你虽然替他当了"右派",可到了60年代,没有人能替他受罪了,他终于被赶出党校,赶到了我们学部的哲学研究所。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因此,除中央党校的虽非亲历却近似亲历的也顺便写出外,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刘 炼

# 何干之幸免被捕的背后

## 3.1 谈到何干之同胡风的关系，要从30年代那场笔墨官司说起

谈到干之与胡风的关系，还要从30年代上海文艺界那场笔墨官司说起。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他同鲁迅先生交往甚深。周扬是上海中国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党内文学工作

者的"围攻"。对这桩"公案",干之始终认为属于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分歧,并且知道周扬与胡风的私人关系不好。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虽认识胡风,但少有来往。周扬是中央文委负责人,主管上海文化界的工作,所以他同周扬有不少工作上的关系。1935年干之流亡日本期间,曾介绍林基路(即林为梁,1930年干之在台山开办暑期讲习班时的学生)到上海找到周扬与国内文总接上联系,建立了东京文总。1936年回国后,周扬向干之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并鼓励他可以公开写文章了。自此干之开始用"何干之"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和周扬、艾思奇、李初梨、林基路等人奉中央调令一道赴延安。所以干之与周扬的关系正如1983年周扬给我的信中所说,"过从甚密"。尽管干之同胡风只有数面之交,而且离开上海后即无任何往来,但他对胡风的看法与周扬不同,始终认为胡风是参加过左联的进步作家,应当团结。

进城后干之与胡风有过一些接触。干之在华大工作期间,二部有一位哲学教员谢韬(平反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只有20多岁,做过新闻记者,能言善辩,才思敏捷,很受干之器重,他也很敬重干之,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49年7月谢韬在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认识胡风,谈得很投机,胡风对他产生好感,也有一些来往。这样谢韬在与干之闲谈有时讲到胡风,例如有关胡风进三十万言书的事就是谢韬告诉干之的。据谢韬讲,1952年胡风到北京求见周恩来,两人谈了五个半小时之久,为此乔冠华还责怪胡风占用总理的时间太长了。事后胡风告诉谢韬说:周总理是一位谙熟文

艺理解文化人的好领导,他向总理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文艺和文艺界现状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周总理至少对他的两点见解表示赞同,一是批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认为如果一味要求文学作品图解党的政策,那么这种作品一定是苍白的。二是指出以政治代替文艺创作的观点,是一种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当年苏联提倡的拉普文学就有这种倾向,如今人家都改正了,而我们还奉为至宝。胡风还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的论述,周总理还特地找出书查到了这段话的原文,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马克思主义。"当时建国不久,百废待兴,总理的工作非常繁忙,不可能用更多的精力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请他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送给中央研究。一是希望文艺界各方人士座谈一次,沟通思想。这次谈话使胡风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党系统陈述自己对文艺问题的见解,这大概是他后来给中央进三十万言书的背景。不想后来周扬找胡风谈话,要他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然后再安排工作。座谈会本是总理指示召开的,目的是在老同志中谈谈,以求团结进步。但在具体执行时却走了样,变成了对胡风的批判,这更增加了胡风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1954 年 3 月,他到北京后开始起草给中央的长信。

胡风在起草长信的过程中,曾就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问题请教过谢韬,谢韬也常对干之谈起胡风倔强的性格,其中也包括胡风与周扬的矛盾以及迟迟不能安排工作等情况。当时

中宣部(周扬任副部长)提出三个工作让胡风选择，一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一是到田间主持的作家写作讲习班授课；一是到清华大学当教授。按胡风在文艺界的资历和水平，这几个安排显然不够公正也不尽适当，所以胡风认为是对他的压制而没有接受。了解到这些情况，干之表示应劝劝胡风不要过于固执己见，应从大局出发，服从组织安排。谢韬认为自己年轻，人微言轻，如果干之能亲自做胡风的工作也许会起些作用。这样在谢韬的引见下干之见过胡风几次，其中有一次是干之带我一道去的。那是1954年春的一天，我们到商店买东西，路过煤渣胡同，干之说这是《人民日报》宿舍，胡风就住在这里，要我和他一道去看看他。我是从鲁迅著作中知道胡风其人的，所以很有兴趣去见见他。胡风住的房间很小，陈设极简单，一床一桌几把椅子。胡风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脸色阴沉。他见了干之非常热情，但对我似乎很冷淡，也许是大作家的缘故吧，不过我并不在意，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话。胡风先谈了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情绪很激动，表示不能去《人民文学》，他说："当副主编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文艺主张，怎么工作？决不能干。"接着他又说，30年代在上海时还有编刊物的自由，现在很想找几个朋友办个同人杂志。这时干之语气和缓地劝他说，对工作安排不太满意没有关系，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以后再想办法调动，长期悬着总不是办法，又劝他不要和上面顶，周扬等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的批评、不同意见可以慢慢讨论，办同人杂志恐怕行不通，现在不是30年代的上海，在党的领导下不允许办这类刊物，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他还劝胡风说话办事要慎重，最好不要给中央写什

么信。胡风点点头,紧锁眉头说了一句"观点相左难于合作"。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最后对干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感谢干之的帮助和理解,并说干之学识渊博,如能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将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希望以后有什么问题再讨教。临走时他送给干之一本他1948年出版的《论现实主义之路》。出来之后我问干之"不要和他们顶"的"他们"指谁,干之告诉我是指中宣部的领导,主要是周扬,他们30年代在上海就打过笔墨官司,现在关系还是搞不好,胡风个性很强,文艺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且无视现在的文艺领导,所以很难合作,他不服从党的安排是行不通的。

## 3.2 何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但又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

后来我从干之那里得知他们又见过几次面,大都是和谢韬一起去的,他们谈话的内容干之也对我讲过一二,除去上述外,还涉及了一些过去文艺界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干之说他们之间的芥蒂很深,不单是个人成见,主要是文艺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胡风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但性格执拗,不易与人团结共事。党的领导者对他也存在偏见。干之对胡风某些观点并不赞同,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但又认为有些见解还是可取的,不应一概否定。据我的印象,在两个问题上干之比较同意胡风的观点,一个是对鲁迅的看法。干之不同意30年代"左联"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认为排斥像鲁迅这样倾向党倾向革

命的人,实际上是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这一点他和胡风的观点是一致的;再一个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看法。解放初期胡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长诗《欢乐颂》和《安魂曲》,每次占一个版面,影响很大,其中涉及到对"五四"以来文艺和思想界的看法,胡认为当时的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方面的曲解,所以这场启蒙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根,中国还需要新的启蒙,继承"五四"传统要注入新的内容。干之很同意胡风的这个见解,早在1937年他就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虽宣传了民主主义,但政论家只是照搬了西洋的民治主义,在方法上只限于"初级原理的说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只求个性的解放而不求社会的解放",反儒学孔教"缺了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摇动着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运动虽然有它的历史功绩,但"平心静气地说来,还很有限度……"这些论述是从理论上指出"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其出发点同胡风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此外谢韬把胡风给中央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有关内容零零星星对干之讲过,想在理论上听听他的意见,如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一个民族两种文化(统治阶级文化和民间文化)等问题。干之表示他对文艺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不便发表具体意见。但干之认为,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存在,可以通过讨论解决,对于认识问题,不应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以势压人。所以对胡风1952年以来所受的批判和压制以及不安排恰当的工作等表示同情。不过他始终没有看过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至于他向干之请教的理论问题,

大多是谢韬查了马列原文后来和干之讨论，干之只是听听而已。

这些事情本属于理论学术和思想观点的研究与思考，胡风给中央的长信写得很认真，力求理论上站得住脚，即便是存在什么错误，也应当在允许和欢迎文学家坦诚向党陈述己见的前提下，通过民主讨论求得一致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可是当时文艺界的领导没有这样做，特别是《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批胡风和友人的来往信件，再加上那篇骇人听闻的"编者按"，把一场本来很普通的文艺思想讨论演变成一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的政治斗争，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 3.3 胡风事件发生后，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临头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于 1955 年 5 月 13 日发表，同时发表了胡风 1955 年 1 月所写的"自我批判"。特别是将胡风问题定性为"反革命反党集团"，证据是胡风在私人通信(而且多为解放前的信件)中流露了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惊诧之余我们不由联想到，我们与胡风有过接触，会不会因此引来什么麻烦呢？4 天后的 5 月 17 日，谢韬被捕，当时第二三批材料尚未发表，还没有看到胡风给谢韬的信，只知道他们有较多的来往。莫非干之同胡风的来往也会出问题？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临头，我们努力回忆见胡风的情况和所谈的问题，但怎么也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集团"

首领的结论,更无从谈起我们有什么罪过。

第二三批材料于5月24日和6月10日先后公布了,并且提醒人们不要"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受胡风等人的欺骗。我仔细阅读了这两批材料,特别是或长或短的编者按,我一面看一面冒冷汗。这时倒是于之来安慰我,他说:"我们和胡风可见天日,我劝他接受党安排的工作,听从党的领导,改正自己的错误,有什么不对呢?你只是跟我见了他一面,毫无瓜葛。但是一定要写材料的,也会有人找你,你如实写好了。如果这种来往也算是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就没有真理可言了。"他心地坦荡,无所畏惧,但我却为他感到不安。事实很快验证了我的不安。不久他便受到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也不准我去看他。这下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没过几天,农业大学的领导找到我,谈话的口气还算和缓,要求我向组织上讲明与胡风、谢韬的关系。同胡风的关系比较好写,我和他只见过一面,而且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我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如实写下来,未作任何评论。至于我和谢韬的关系,我对谢、胡的关系一无所知,只从于之那里听到过一些,不了解的情况不能瞎写。所以我只讲了同谢韬的来往,我说,谢韬是哲学教员,很有才华,之所以成为我的朋友,主要是他曾努力促进我和于之的关系,常来农大做我的工作……仅此而已。我想他们真正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政治关系"而非这些个人生活的琐事,但事实是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学校和单位领导再三找我谈话,启发我要把生活问题放到政治斗争高度来认识。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有转正,他们也曾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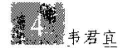
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政治考察。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怎么"认识"也不能改变事实真相,我的直觉告诉我,当年谢韬与我们的来往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尽管当时我也很矛盾苦恼,但我还是以自己的政治良知直视眼前的一切,至于我在前文所提到干之与胡风交谈的具体内容以及周总理同胡风谈话的情况,是40年后我采访谢韬时得知的。最后为应付了事,我在学习会上说了一通自己"觉悟低","书生气十足","看不清胡风的真面目"等话,就算过关了

## 3.4 由于李新的坚决反对,何干之幸免被捕

干之的处境比我险恶多了,形势也日趋紧张。听说凡是胡风信中提到的人一个一个被捕了,我担心干之也会有此遭遇,他说:"不会吧,我和胡风只不过见过几次面,还劝他向党靠拢,总不能乱抓人嘛。"然后真正书生气十足的他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险些使他陷入灭顶之灾。事情的详情虽然是40年后李新同志告诉我的,但得知这个迟到的消息仍使我惊恐和后怕。原来第二批材料公布后,当时李新同志因公事去杭州,见到时在杭州休假的吴玉章校长,两人晤面后谈起胡风问题,吴玉章校长预感到这是一场可能牵涉很多人的政治风暴,当他看见其中有胡风写给谢韬的信,立刻让人民大学党委常委李新赶回北京了解情况。吴老是个爱才知人的老教育家,他对谢韬的才华赞许有加,怕他因胡风一

案受牵连，要李新回校尽可能保护谢韬。李新下了飞机立刻赶到学校，见党委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心里不由一沉，想必是谁出了问题。党委办公室里有三个人，一个是副校长邹鲁风，另一个是某党组成员，第三个是一位身着警服的公安部的干部，他正神态严肃地和两位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领导谈逮捕何干之的问题。李新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要逮捕也不过是谢韬，万万没有想到不仅谢韬已被捕，而且还要抓何干之。他立即问为什么要抓何干之？回答是因为胡风的日记中提到与何干之见面的事。李新又追问日记里写了些什么，对方回答说没有多少具体内容，只是记事，多次和谢韬、干之一起吃饭。邹鲁风说何干之和胡风关系密切，可以认为是胡风分子，李新问明胡风和何干之的谈话内容后说："何干之劝胡风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不要办同人杂志，这也是反革命议论吗？"他不顾邹等二人不让继续讲下去的暗示，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要知道，何干之是国内外有声望的学者，你们现在抓他容易，将来怎么放他就不好交代了。何必这么急呢，把情况弄清再说怎么样？而且这么大的事，也要党组开会研究才能决定呀！"说到这儿公安部的干部松了口，说："先让他写交待材料吧，我回去向上级汇报后再做决定。"警车开走了，当时的"逮捕令"是在还没有看到干之写的材料（刚刚在写），仅凭胡风日记中提到与他见过面的简单记载的情况下发出的。在李新的坚决反对下，当时没有逮捕干之。等党组成员都回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罗瑞卿经吴老说明，知道谢韬抓错了，但因是毛泽东批准的，无法改变，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派谢韬到秦城去"做战犯的工作"。逮捕干之的问题自然不了了之。但党组还打算开除

干之的党籍,也是由于李新的坚决反对而未果。后来,邹鲁风再三对李新说,逮捕问题千万不要告诉干之。过了若干时日后,李新才对干之讲了。讲完事情经过后李新对我说:“好险啊,只差两小时,我如果晚到两个小时,何干之就被抓走了,真是如此你们一家的命运也就完全改变了。”关于这件事,干之生前从未对我说起过,现在想起来,他知情而不对我吐露,一定是不想让我为他担惊受怕。从此事看出:李新同志确是一位忠直之士,敢于在如此险境下挺身保护干之,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机智地采取缓兵之计,从而避免了又一起冤案,令人肃然起敬。



韦君宜

# 文坛反右风涛

## 4.1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

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宗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20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

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

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罢,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辩驳一

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 4.2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类。作家协会总共不过 200 人，右派划了 50 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

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

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

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20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 4.3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

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位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20几年。到1985

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文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

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言。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把就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 1957 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 4.4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

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在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 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 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 1983—1984 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 4.5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

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说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怎么这么说？出尔反尔，这岂不成了阴谋么？"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公然承认这个出尔反尔，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就是先前所说一切，全是钓鱼的诱饵！青年人怎么吃得消这样的"阳谋"，他们就此都上了钩。

王蒙那时才 24 岁，15 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所在的共青团市委，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给人家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

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于是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自己既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帽子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一个葛佩琦。这个人是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反对它，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哪里就是他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这样过了20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才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的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了强调“要为人民”，人民很重要，竟毁掉

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了。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右派，看看他们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的。让后人想一想，这回划右派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是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她早年的革命政治活动，为人所共知。在重庆时代，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当时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在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索

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弄不清楚。

解放后新闻界有"才女"之称的，除浦熙修外，还有一个也划成了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被认为这是攻击了可爱的新社会，就划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幸逃"右"网的"才女"，那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他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是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太冤。但是人家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没有龙云，怎么把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赶出云南，怎么让共产党势力在云南站住脚跟，最后，又怎么把云南省双手交给共产党！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吧。结果刚建国不久，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一脚踢开。还有好几位原来的地方领袖，也同此下场。

还是说右派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每当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就想起了它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我和他同一单位，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始终也弄不清楚。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我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打进去了，并遣往东北。多年

之后又见到他，仍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准了，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状”。这算什么政治？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荒淫无耻。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自动跑出来接待。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来看我们。把他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会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因为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20几年前曾反对“抢救”运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划上了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估算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

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说，就悄悄划上了。看起来，大概也是由于市级干部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还有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都说其作品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20多年随意抛弃，都划成了右派呢？谁也不能回答。

这些年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他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到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处分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并无一个犯了什么罪，甚至人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行，拥护得不太对也不行。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20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

5 梦 波

# "劳改纪实"

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禁闲杂人等闯人。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历代帝王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们要在这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这一举措,不但可以让那些在深宫内院住腻了的皇亲国戚们舒一舒懒散的筋骨,吐一吐胸中的闷气,更主要的是要以此显示"天下是打下来的",皇族的子孙们不能忘记皇朝"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

1958年"大跃进",属于大兴县管辖的"团河"地区,成立了"金星公社",男女壮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秋收过去,严寒到来,一个个硕大的老玉米棒

子,还结在玉米秆上,戳在地里,收不回来。为了开发这片“荒地”,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接管了行宫以西直到大兴县县府所在地黄村镇旁边的几万亩土地,成立了一个“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当时的建制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个四方形的“牢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拉有电网,四角有四个由警卫部队守望的岗楼,安有探照灯,关押的是劳改犯,种的是水稻;二大队是五六排平房,外面虽然也拉着铁丝网,但是并不通电,也没有警卫,里面住的是劳改释放和劳教解除人员,单有一个名称,叫做“就业人员”,共有六个中队,种的是葡萄;三大队是一座L型四层楼房,尽管四周没有警卫岗哨,可大门口有人值班,每个窗户外面,都钉有很粗的铁条,因为里面关的是18岁的少年犯。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量高达600万斤,正好与当时的北京市人口相等。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北京人每人可分得一斤。其中的“佳品”,曾空运供应港澳市场。

60年代的团河,与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团河史”上的再度辉煌。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具有世界级知名度的团河农场里。

这一时期的“团河史”,牵动着成千上万善良的北京人,决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特殊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我讲的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千百万个故事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 5.1 团河农场的"右派分子"分六个等级

1957年的"反右运动",弄出了552877个"右派分子"。"左派"与"右派",本来是政坛上一个常用的名词,一般说来,"左派"指革命的、先进的一伙儿,"右派"则指保守的、落后的一伙儿。但是"右派分子",却是一个产生于新中国50年代的新名词。1957年以前,中国大陆有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但是1957年产生的55万多个"右派",其身份却有些特殊:既非经济领域中的地主、富农,也不是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更不是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因此也是一种"四不像",只好单划一类,称为"右派分子"。从此中国有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通称"黑五类"。

全国近56万右派,除了少数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知名人士"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之外,其余的人,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一个不抓"的决策,分六个等级处理:最高的"行政处分"是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最低是只戴帽子,免予行政处分,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先是在某国营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因"坚持反动立场不知悔改",被"升级"到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1962年10月,我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一个世界著名的劳

改农场清河农场劳动，忽然全场所有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统统集中，被送到了团河农场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度过了漫长的、终身难忘的七个春秋。

清河农场虽然占的是宁河县的地面，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的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的票证。这种外省市县内的“租界”，有一个专门的但却不一定是法定的名称，叫做“飞地”。北京市公安局所拥有的“飞地”，除此之外，远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和西北的青海，还有许多。

到了团河以后，我被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团河农场的最北端，也就是现在的警官大学附近。由于这里从前有过一个小村子名叫“三余庄”，所以习惯上大家仍都这样叫，很少有人叫七中队的。这个中队虽然隶属于二大队，但却不种葡萄，而是种大田。在我到达之前四五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的兴凯湖、白城子等劳改农场（也是飞地）调到茶淀农场来的“教养右派”以及北京市郊各劳改厂矿的“教养右派”们先期集中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一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后找补”的。前后几批人加在一起，总数共有230多人，分编为四个小队。由于所有的“三余庄庄员”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所以当时有人戏说：这里是“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生产单位”，此言不谬也。

这是全农场唯一的一个“教养中队”。正因为它的“唯一性”，人员的文化水平又相当高，最高的有大学教授，最低的也是小学教员，更主要的是当时纷纷传说：这次集中，是中央有了新的政策，经过“甄别”，要恢复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工作，

因此场部对这些“右派分子”的管理比较松，主要实行“自管”，连小队长也是我们“自己人”担任。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们这一批“劫后余生”的人尽管没在那天天死人的“荒年”饿死，但一个个不是两腿水肿，“胖”得不行，就是皮包骨头，瘦得不像人样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还是从车上抬下来的。第一次集合起来到场部附近的澡堂子去洗澡，一共不过两千多米的路程，一行人像蜗牛似的慢慢儿往前蠕动，居然走了足足两个小时！

七中队的中队长武进文虽然是个大老粗，说话嗓门儿极大，人却颇为善良。他秉承上级“生活管理从宽”的意图，尽量改善大家的伙食，下车伊始，就给大家定了每月 39 斤、41 斤、45 斤的粮食定量。不但粮食是实打实的大米、白面、棒子面，当时菜园里的黄瓜、茄子、西红柿正熟，他让炊事员每顿饭都熬上几大桶，多多地给，一人一大水舀子，足有小半脸盆，光是这一份儿菜，就能吃个半饱了。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吃“代食品”的劳改农场来的“饿鬼”们说来，简直人人皆大欢喜。就连不出工的四小队的病号们，也大都吃饱了。武队长是个有心人，右派们一到，他一个个都过了秤，记录在案，三个月以后再过一次秤，然后公布每人“长肉”的数量。说来有趣，也确实惊人：像谭天荣那么大的个子，下车的时候已经瘦得只剩下 80 多斤了，三个月过来，居然长到了 120 斤。也就是说：近 100 天时间，长了 40 斤肉，平均每天增加四两，简直是奇迹！就连因患肺病长期不出工的杜高，也长得白白胖胖的，可以说是他历史上的最胖阶段，绝不像他后来当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那样，反倒瘦成了一头干巴狼！

指导员高原松，虽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有一次雨后不出工，大家到路边去摘黄花儿菜，有位老兄感慨系之，诗兴大发，说了一句"人比黄花瘦"，高原松正好在旁边，就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那个黄花，不是这个黄花儿吧？"我们大为惊讶：这个管劳改的干部，水平可不一般，从此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从来不大声说话，就是批评一个人，话也不多，口气也不重。晚上点名，训话的往往是武队长。

劳动只是象征性的，能干多少干多少，并不强求定额，而且一律由教养人员担任的小队长和小组长分配活茬儿。

还有一个董干事，是场部派来专门管教这批"右派分子"的。他有一单间办公室，而且只代表场部领导队长指导员们做工作，很少直面教养分子们。

队部除了组织大家劳动生产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档案，要大家谈认识、写总结，还曾经登记谁没有像样的服装和被褥。

我们到三余庄后没多久，刘祖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1950 年经历了千难万险主动回国，被分配在新华社当外文编辑，肃反中被怀疑是"派遣特务"，受到审查，并被抄家。1957 年提了"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的意见，又被划为右派。1979 年落实政策后任上海交大科技外语中心主任）等好几个外语人才被调到北京市公安干校当教员去了。一批还没摘帽的右派，居然能够去当"公安干校"的教员，这本身就说明政策的确要"变"，而且已经在变。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果然有了新的政策，很可能就要放

我们了。

大家心情愉快，人人翘首以待，盼望着"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 5.2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直到1978年才摘帽，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吉尼斯纪录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1957年8月1日，《劳动教养条例》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字公布的时候，"反右运动"刚刚进入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产生了大量的"右派分子"，于是这些"右派分子们"正好赶上了"头一刀"。

劳动教养开始实行的头一二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定。几年来，教养单位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有许多人刚进来的时候，悔改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以清河农场为例：1958年由教养分子在"西荒地"一口气建设起来的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当

年那种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盛大”场面再也看不见了。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清河农场大战七里海的时候，一天要吃五顿饭，最高土方量一人能做四五十方；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多数人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当然是“最高奖赏”：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你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但是身在囹圄中，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要是这以后真按照规定认真执行，倒也罢了。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了1964年5月24日，好歹是个“尽头”。糟的是，由于说不明白的原因，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年底才得到解放，终于创造了教养

14年、改造22年的“吉尼斯记录”。

我们这一批集中到三余庄来的200多名“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将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突然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我们适当的工作的。说实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是从思想上承认了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我敢保证：如果当局这时候把我们放了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变”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逐渐烟消云散了。新的小道儿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子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是因为不合时宜，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于是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所有的人，就都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热情歌颂劳改政策的英明伟大，被捧为“大墙文学之父”，并荣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太大的人。从维熙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又担任小队长，表现最突出，所以能够光荣地获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宠。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明白地写着“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因为这时候的确已经有“新政策”下来：解除教养的人，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

对失业的人来说，有“就业”机会，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就业”前面一带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就不怎么样了。不说所谓的“就业”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单是“三等公民”的待遇：下班后外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被检查，没有通信自由；虽然有选举权，但指定只能选场长或政委，不可选别人，弃权则绝对不允许，更没有被选举权，离真正的“公民”，也还远着呢。当时的劳改单位，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是专政对象。“强制就业”是个什么身份，也就不言自明了。

从维熙因为妻子张沪在清河农场教养女队，所以他在就业一中队种了一段时间葡萄以后，就主动申请到清河农场与爱妻张沪“团聚”去也。

接着，定期一年半、两年的也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 1963 年 11 月 24 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一共只剩下 72 个定期三年的“老号”。眼看着再过半年，三余庄就将没有“教养分子”了。尽管解除与不解除，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但是关长了的人，哪怕下了班请个假能到黄村小酒店去喝上一盅，能与女服务员说两句俏皮话调调情，也是美滋滋的，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需要哇！

定期三年的教养人员中，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有人是在统一宣布教养期的日子之前宣布教养期的，所以三年到期

的人,并不个个都是5月24日,其中也有个别人略早几天。例如张永贤(原北京工业学院助教),就是1961年4月27日在公安分局宣布的,所以到了1964年的4月27日他准时解除教养了。

到了1964年5月24日,这天是星期一,大家一早就都在盼望着队部通知不出工,全体留下开会,宣布"教养中队"的胜利结束。到了7点半钟,小队长们得到通知:到中队部去开会。其实这是每天出工之前的例行公事:由主管生产的中队长布置劳动作业。但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与众不同"上。到了八点钟,出工的哨子照常吹响了,小队长们"带铁锹,集合"或"带箩筐,集合"的喊声也接连响起,各小队的人马,极不情愿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眼角嘴边挂着大大的问号,互相看看,又带着一肚子疑虑慢吞吞地走出大门去。

大家都觉得奇怪: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队部怎么居然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保持沉默呢?有那憋不住劲儿的,就趁工地休息的时候去问队长:"这三年来,我们认罪守法,积极劳动,为什么到期了还不宣布我们解教呢?"队长的答复是:"解教的报告早就送上去了,上面没有批下来,我们执行单位,没有批示,也不能自作主张。说不定再过几天就会批下来的。"

中午吃过饭以后,没有出工,值班员却通知全体带板凳到伙房后面的空地上集合。有人以为这一下很可能是宣布全体解教摘帽了。因为来的是场部的宁干事。但是他讲话的内容,依旧是队长在工地唱过的老调调儿:"解教的材料已经送上去,正在办手续,希望大家安心、耐心、放心。"

这话很可能是事实,当然也是无懈可击的。既然已经报

上去,总有批下来的一天。三跪九叩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么?已经被关傻了的人们,依旧在希望中度日。有希望,有盼头,不是总比绝望要强不是?

宁干事讲话以后不久,队部个别通知李喜兰、刘新民、孙本乔三人解教摘帽。这三人,前者是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门市部营业主任,后两个都是大学生。这一来,希望之火又在人们的心中熊熊燃起,都相信"手续正在办理之中",都以为不久之后就会一个个地解除教养的。奇怪的是:这三人以后,就到此为止,完全打住,"手续"一办就是好几年,再也没有解除过一个人。总不能说:70几个人中,只有他们三人表现最好或"罪行"最轻吧?

有个叫王玉琦的,原是黑色冶金研究院的干部,定期也是三年。他爱好京剧,会弹月琴,所以他刚到三余庄不久,就被调到团河京剧班去了。由于剧班是从职工、犯人和教养人员中抽调演员或票友组织起来的,不算教养单位,所以王玉琦三年教养期满,居然准时于1964年5月24日宣布他解除教养,连购货证什么的都发给他了。可是三余庄的那一大批人不解除,他也不能例外,只好又把他的购货证之类收回去,并把他也送到三余庄"归队"。结果,三年到期的人,只解除了一个张永贤,算是唯一的例外。

一个月之差,命运可就差远了。

有人自我解嘲地说:"谁叫咱们来到'三余庄'这个'绝地'来的呢?就冲这地名,不是明明告诉咱们了:凡是定期'三'年的,都要'余'下来么?"

## 5.3 农场中的"积极分子"与"反改造分子"

这期间，七中队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定期三年尚未解除的教养分子只剩下了"七十二贤"，只不过以前一个小队的人数，就把原来由教养分子担任的小队长统统撤销，合并为一个小队，由干部担任小队长，下分若干个小组，每组设两个组长，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学习。同时从二大队调一部分就业人员来，编为一个"就业小队"，住在"教养小队"的后院儿，干活儿分开，但在一个食堂买饭吃。

中队部也有了变化：董干事先撤回场部去，接着高指导员也调走了。但他不是"另有高就"，而是先被调到二大队一中队去当中队长，不久又被调到场部大仓库去管物资，明明是"降级使用"。武队长被调到顺义砖厂去当厂长，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升"了，实际上那是个极小的劳改单位，地方又偏僻，谁都不愿意去当这个官儿。

新调来的指导员姓郝，一只假眼珠，年纪已经五十开外，看样子是个老干部。单从人品上说，他作风正派，对党忠心耿耿，提倡艰苦朴素，处处以身作则，应该说，绝对是个好干部。

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两名复员军人，一个姓阎名进财，是个大麻子，在部队里虽然只是个班长，但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受到过林彪接见的。因为他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所以他的分工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经

常在出工的时候把某个人找去个别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有个叫郭东海的，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恶作剧的行家，调皮捣蛋的干将。他发现与队长谈话是一个逃避劳动的好机会，就三天两头借口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在出工的时间主动找阎队长个别谈话。大冬天的，他穿上棉大衣、捂着棉帽子，坐在背风向阳的斜坡地上诚诚恳恳地请求阎队长开导。他的问题也实在多，一个解决了又出来一个。阎队长的修养也实在好，总是耐心地分析、苦口婆心地帮助，不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不算完。一个冬天下来，郭东海没干几天活儿，满心欢喜；阎队长因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久就调到一中队去当上了副指导员，也是满心欢喜。

另一个姓曾，河南人，大伙儿都管他叫"傻曾"。为什么叫他"傻曾"呢？第一，因为，因为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行动迟缓，说话也慢吞吞、轻轻声的，不像个军人。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有人半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这些"右派分子"们谁也不想跑，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实施严格的户口和居住管理制度，随后又实行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由户口所在的粮店配发当月有效的地方粮票；没有户口粮食的"黑人"，哪儿也藏不住身子，更没饭吃。只有盗匪和小偷儿能够跑出去"闯荡江湖"，但那也是过一天算一天，或早或晚还是要被抓回来的。三余庄的右派分子们如果要跑，就是十个傻曾也看不住。第二，他老家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天安门，他却想借此机会考验考验姑娘是不是艰苦朴素，一大早的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尽管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

有一趟公共汽车，两个人楞是不坐，30多里路上午走了去，在天安门广场吃了馒头，下午又走了回来。他这样一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搞对象的事儿自然也吹了灯。他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

这些干部，尽管各有个性，但就个人品质来说，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比现在这些只知道贪污腐化、只知道"向钱看"的干部强百倍。当时如果让他们去带兵，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也许都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政治修养，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与心态，在三余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单凭"对党忠心"是断然不够的。他们的好心与"忠心"，往往办了坏事、铸成了大错。在他们看来明明是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却恰恰是牛蹄子两掰着，错到姥姥家里去了。谭天荣的被"延长教养期"，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谭天荣，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四年级学生，"百花学社"的上将之一，现在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我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样"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好学精神。好学的人在三余庄并不少，像陈海铨，工人出身的北师大历史系学生，一有空闲，不是捧

着《盐铁论》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就是拿着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大声朗读。还有个吴越，是个研究语文的学者，曾任《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的编辑，而且是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他身陷囹圄，还孜孜不倦地在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进行浙南某方言的研究，甚至在紧张的劳动间歇，也要拿出用旧书裁成的卡片来“排序”。这些人，研究的是他们的“本行业务”，倒也不足为怪，怪的是谭天荣不是在钻研他的物理学，而是天天捧着一部《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揣摩。只要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就知道他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并不是只会夸夸其谈地背两句“否定之否定”教条的人。

事情出在讨论读报上。那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发表了观感，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只要四分钱，就能买一斤，而在苏联，是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的。当时的货币比价，一个卢布等于人民币两元、美金四元。读报之后，具有杨修性格的谭天荣发言了，他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卖四块钱一斤，中国农民就富了。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越大，农民越穷，这是常识。但是文化不高的管劳改的干部可没读过《政治经济学》，看了小组讨论记录，听了学习小组长的汇报，晚上点名，就说谭天荣“眼看着中国的西红柿便宜有气”，硬给按上了一个“右派本质不改”的罪名。谭天荣当然不服，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又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进行辩解。尽管他的“答辩”与会者大都能听懂，但是有的采取“明哲保身”态度，不置可否；有的明知他的论点正确，但为了表示自己靠拢政府，

也昧着良心与队长持同样的观点,用"歪理"来进行"批驳"。当然也确实还有少部分"糊涂分子右派"是没什么文化的,是"混杂在右派队伍中"的"半文盲",他们有的是学徒出身的商店经理,有的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教员,从"货物总是便宜的好"的简单认识出发,也"自以为有理",居然头头是道地批判起来。于是谭天荣越辩论"问题"越多,又不肯投降,最后队部认定他"坚持反动立场",是"拒绝改造"的典型,经上级批准,在一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和另三名"反改造"的大学生右派陈海铨、宗国才、郭远年一起被宣布延长教养期一年,并在不久之后就用小吉普送走了。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已经"荣升",至于究竟送到了哪里去,公安局办事不论巨细一向保密,我们这些人当然谁也不可能知道。直到1965年,谭天荣他们四人又与另外32名分散在各劳改单位一直未摘帽的右派一起集中到三余庄来"归队",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德胜门外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去的。

谭天荣的"升迁",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据说他有一本笔记本被积极分子偷走并上交队部,场部干事为此找他谈话多次。由于此事没有公开批判,具体内容我们不大清楚。可是在学生右派中,能够被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大总统所知晓,又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赞扬的,终究是少数。他这个知名度最大的学生右派先期荣升,应该是一种"风云突变"的先兆。但当时能够作如是观的明眼者并不多,八成以上的人依旧相信政府正在"办手续",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天开眼"上。

"手续"一办就是遥遥无期,只"办"下李喜兰等三个人来。

这期间,阎队长倒是说过"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这样的话。但是他的官儿太小,许这种不负责任的愿,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最多也不过作为笑话听听而已。等到阎队长荣升以后,队长们不再唱"正在办手续"的调调儿,更没有人来许"有好事儿"的愿,而是换了一副面孔,统一了口径,强调的是"你们还没有改造好"。明眼者开始怀疑政策有变,因为这句话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第一,定期两年半以内的人,怎么就都"走"了呢(其实不过是把铺盖搬到了另一个中队去,教养分子变成了"强制就业人员"而已)?难道这样巧,他们全都改造好了,我们就全都没改造好?第二,现在可不是劳动教养的草创时期,不再说"谁改造好了谁走人"这样的话,而是每人都有一个法定的"教养期",即便"没有改造好",右派帽子可以不摘,"解教"手续却不能不办。不然,就是执法机关违法了。超过了"解教期"进入了"无期"的"右派分子"们,逐渐滋生的茫然、苦闷、不满、焦急情绪与日俱增。一部分人渐渐"觉醒",放弃了通过"正常改造渠道"求得"光明前途"的念头,不再抱任何幻想,公开发泄不满情绪而不顾其后果。例如杨路(原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百花学社主将,上大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现在是四川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著名的数学家)就公开地说:"我认为'右派分子'想通过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就像蚂蚁不论在地球上怎样爬,永远也爬不到太阳上去一样。"另一部分人数量比较多,他们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不取得"解教摘帽"的合法手续,跑到哪里都一样。他们出于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继续循规蹈矩地一步步走那不知道何时

才能走完、也许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改造之路"。还有一部分人,也许是真相信队长说的"你们还没改造好"的评语,总想用自己的"良好表现"来取得政府的信任,先于众人离开三余庄;也许队长有过"你们的表现比较积极"的评语,鼓励过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功亏一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总之是这一小部分人以"积极分子"自居,想采用"踏在别人的肩膀上爬出去"的战术,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右派分子"中间,依旧可分左中右三种人。极"左"的,队部称为"积极分子";极"右"的,队部称为"反改造分子"。当然,极"左"的"积极分子"是少数,极"右"的"反改造分子"也是少数,多数人总是处于中间状态。

不论是左是右抑或是中间派,大家所最最关心的,都是"前途"问题,都热衷于打听、传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何变化的小道儿消息。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主要是以前陆续解除教养在别的中队就业的"摘帽右派"们;此外,住在后院的"就业小队"虽然大都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老反革命",但是处的时间长了,彼此混得不错,居然也有人跟他们交上了朋友,有了"共同语言"。所不同的是:"反改造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是用来琢磨、研究自己的出路,"积极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除了自己心里琢磨之外,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拿到队部去,以出卖"同类"来换取政府的更加信任。

那时候,当局为了缓和"右派分子"们"过了教养期不解除"所造成的不满情绪,实行了一条"土政策":只要表现良好,

不犯错误,家在北京市的,允许每月回家一次;家在外地的,允许家属前来探亲,队部提供简陋的住处。这样,可就大大增加了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了。

小道儿消息综合起来,不外乎如下几条:

"团河农场的京剧团被大兴县看中了,点着名儿要。弄得不好,恐怕要连团河农场一起接管。"

"社会上的右派,根据'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原来是由统战部门管的,现在统统交给公安部门管,和地富反坏同样对待了。"

"农村在开展'四清运动',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交待问题,哪儿都有'四不清干部'。"

"关于右派问题,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公安部门只好暂时'维持现状',即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已经摘帽的,就算了;没摘的,暂时不再摘。一切等待中央的决定处理。"

小道儿消息,特点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不过人人心里都明白: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出路与前途,凶多吉少!

不久,团河农场也开始搞起"四清运动"来。运动主要在干部中间开展,对于就业人员和教养人员,则名之曰"拔白旗运动"。

所谓"拔白旗运动",就是在"三类人员"也就是犯人(包括少年犯)、教养人员、就业人员(包括"少年职工",也就是刑满释放的少年犯)中开展的一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换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发动"左派积极分子"揭发检举打击少数的"右派反改造分子",争取最大多数的

中间分子,求得在劳改单位的相对安定。其中当然也包括动员“反改造分子”们主动坦白、投降起义。

这个运动在别的部门进行得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仅就七中队的教养小队而言,战果并不辉煌。因为这一批人长的已经在公安局呆了七八年,像我这样的“后进分子”,也已经呆了五年多,经过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各样的运动,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体会得最深刻的一条,就是“坦白”必然“从严”,知道历次运动,向来都是前紧后松,开始的时候雷厉风行,似乎一场暴风雨立刻就要来临,最后大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何况这“七十二贤人”中,大多数人都对政府说话不算话、到期不解除心怀不满,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这种“反改造”的因素。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认识,使得这一批人“抱团”抱得很紧。因此,除了像刘佛生这类极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想在这场运动中“立功”,也曾经粉墨登场,积极检举揭发、坚决打击斗争之外,很少有人主动坦白,更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去伤及同类。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令队长们大失所望。

这里,有必要插空介绍一下刘佛生这个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这不单因为在以后的多本连续剧中,都是他唱的主角,而且在“人”这种动物当中,很少有他这样厚颜无耻的,似乎也很值得“人类学家”们认真研究一下。

刘佛生本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助教,湖南人,据说父亲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后死在监狱里。他身体单薄,一副病容,说话轻声细语,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总是把“杜高”叫成“豆糕”,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楚楚可怜,但是心地的歹毒、为人的阴险、个性的凶残,却与他的外貌完全相反。他可能得过肺

病,原来在病号队学习,不出工。1962年的时候,杜高也因为患有肺病,集中到三余庄以后,一直在病号队呆着。后来队部发现杜高不但是个"著名作家",1950年他还只有20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所写的战地通信,居然有两篇收在高中语文课本里,而且还是个剧作家,曾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过专业编剧,教养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就把他请出来当中队宣传员,每天早上帮助值班员扫干净院子以后,就夹着铁皮喇叭筒到工地去作宣传鼓动工作,下午提前回来,把一天中各班组及个人的"突出事迹"用黑板报的形式写出来。他出工而不干体力劳动,不但粮食定量提高了,肚子吃饱了,身体也逐渐好起来,而且成了队部最红、最信任的红人。刘佛生看了眼红,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走湖南同乡杜高的路,也争取一个出工不劳动,甚至取杜高而代之。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靠拢政府",也就是充当队部的耳目,到处搜集甚至不惜伪造同类们的"反动言论",向队部汇报,从而取得队部的信任,终于在1963年年底把他从病号队里调出来,到值班室值班。

说到值班室,这里又不得不特别交待一下,劳改队的值班室,是一个很特殊的部门,权力很大。队长平时坐在队部,很少到教养大院来,所有院子里的杂务,包括看守院子大门清扫环境卫生、出工收工敲钟、统计出工人数、传达队部命令、购买日用杂物、分发报纸信件、接待探亲家属、处理临时事件、照顾歇工病号甚至帮助食堂卖饭……等等等等,都由值班员承包。更主要的,每个值班员也都是队长的耳目,看见某人有越轨的行动或听见某人有不妥的言论,都必须及时向队部汇报。

那时候，七中队值班室的两个值班员，值夜班的一个叫程志雄，安徽人，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早在1950年他还在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调查部看中，毕业后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翻译兼团总支书记，真正的任务是监督部长们的一言一行，定期向中调部汇报。由于他出身富贵人家，受过高等教育，风流倜傥，仪表非俗，舞跳得也漂亮，终于跟哪位首长的夫人勾搭成奸，这不但违犯了秘密工作纪律，在当时"通奸"还是犯法行为，为明暗两面所不许。总算部里看在他"工作积极"的情份上，没给严厉的处分，而是开除党籍，一撸到底，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又从劳改处分配到团河农场来，月工资36块5角。团河农场不好分配他工作，就让他到二大队七中队来当专职的值班员。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就业人员，这在劳改单位又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外雇职工"，在形式上不受管制，也不参加"三类人员"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与队长们"平起平坐"。

值日班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吴越，他是个语文工作者，原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方言研究和汉字拼音化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所有语文研究资料被洗劫一空，改行写小说，愣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儿写成了一部长达1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落实政策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近70万册，80年代后成为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他是个好好先生，不但跟谁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还很愿意帮助别人，自从1963年"五一"节进入值班室以后，跟程志雄的关系搞得特别好。俩人合着把值班室变成了教养队的"秘密联

络站”:按规定,教养分子向外发信是要经过队部检查的,但是只要把信交给吴越,他就能够让程志雄送到大兴县县城甚至市里去发;按规定,教养分子的家属来探视,所带食物,不能超过1公斤,但是来访家属的登记接待工作是由吴越做的,整口袋的食物可以先藏在值班室里,只拿出1公斤左右来装装门面,家属走了以后,被探视的教养分子可以不慌不忙地把食物转移走。1963年11月吴越解教摘帽以后,更其变本加厉: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只要城里有亲戚朋友,他可以在星期日进城去帮你去取回食物来。杜高就是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一个,但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有许多“哥儿们”,吴越就常常到青艺宿舍去找那些导演、演员们,给他背回来面包、饼干、香肠、油饼之类。北京城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只要通知家里把钱汇给吴越,他就可以进城去帮你买到各种食物…… 当然,他的服务对象,是有选择的,像刘佛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不但谢绝服务,而且还要对他讳莫如深。

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值班室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有刘佛生之类的积极分子汇报到队部。队部先是找程志雄了解,程志雄的答复是“绝无此事”;接着找吴越谈话,吴越也坚决不承认;队长就批评吴越:“值班员应该是队部的耳目,你值了半年多班,没向队部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不是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我们快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根据动态分析,队部快要撤换值班员了。程志雄是专职值班员,来头大,撤不动,吴越的值班员可是队部任命的,看起来,吴越的地位岌岌可危矣。

果不其然,不久,就以加强力量为由宣布刘佛生到值班室

来值班了。总算还好,没有立刻撤销吴越的值班员职务,而是“同时值班”。

值班室里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什么“秘密行动”就都不能进行了。吴越与程志雄商量,想一个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程志雄手拍胸脯:“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不出半个月,我准让这小子滚蛋!”

计谋当然是在暗中策划进行的。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就业职工,程志雄专值夜班,而上夜班做早饭的炊事员只有一个人,必须由值班员帮他搭笼屉蒸窝头,所以俩人关系也非比一般,半夜里俩人炸油饼、下面条吃是常事。这在当时多数人还饿肚子的情况下,就算是很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候教养队买饭采用的是卡片制:早中晚各吃几两事先登记,印在卡片上,吃一顿划一格。程志雄跟夜班炊事员商量好:第二天早上开饭,故意忘了给刘佛生划卡片,且看他是不是来打第二趟饭。

罗网张好了,就等他自己往里撞。

程志雄下了夜班,本该去睡觉的,但他要守住罗网,等待猎物。刘佛生当然不知道有人设下了陷阱,打回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来,发现卡片上居然没划那一道杠杠,高兴极了,来不及先吃这一份儿,拿上另一个饭盆,又去打第二份儿。炊事员说他已经打过了,他指着手中的卡片说没打,俩人戗戗了起来,程志雄是等在旁边的,立刻出面作证,不但指出他刚才打的一份儿还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放着没吃完,还把他拉到队部去。人赃俱获,刘佛生就是再能说会道,也无法给自己开脱,结果队长当时就宣布撤销刘佛生的值班员,让他搬回病号

队去。

刘佛生进值班室没几天，就被撤职。值班室这个“秘密据点”，就这样保住了。

“拔白旗运动”期间，又从别的劳改单位陆续调来了36个同是3年教养期到期未曾解教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前，我们只以为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各劳改队的右派都已经在1962年集中到三余庄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漏网之鱼”！于是，三余庄的“七十二贤”变成了“一百单八将”，一场腥风血雨的连台好戏，就要在这里演出了。

三余庄原来的70多人，反改造情绪高涨，抱团儿抱得很紧，积极分子太少，运动开展不起来，这些情况，队部其实也很明白，只是力量不足，无法改变罢了。这一回从外地又调来三十多个人，趁他们刚刚来到，不了解情况，与原有人员也不熟，队部计划要在这些人中发现“新生力量”，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些人一到，队部就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动员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要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暗示运动过后，政府将根据各人的表现好坏重新处理。

新来的这些人中，确实有几个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们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过去靠努力劳动应得而未得到的东西，如今想通过运动，重新争取，想趁三余庄“老号儿”们意志消沉、思想抵触、有抗拒改造情绪的“大好时机”好好儿表现一番，以求在教养所这口深水井中觅得一个“干松”的庇护所。尽管他们事实上已经居于亿万人之下，却以为还有可能成为“百人之上”，一旦政府开恩放人，自己就有可能成为“首选者”。他们不了解政策只能由中央制订，如果能放，绝不会只

留一个,如果不能放,也绝不会只放他一个人。可惜这样的话没人能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想不到。

简单地说,队部还果然在这些新来的人中发现了几个“生力军”。在这些新上任的“积极分子”们积极配合之下,带动了已经处于疲惫状态的“老积极分子”,“拔白旗运动”立刻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开始遭殃了。

首当其冲的是朱维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教授)。他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西洋名画欣赏课的教师,工于油画和素描。他母亲是个留美又留法的大律师,1957 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里蹬缝纫机,替里弄办的缝纫部加工小孩儿围嘴儿,两个妹妹,一个弹钢琴,一个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家子全不务正业”。他自己从小由法国保姆带大,没上小学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划了右派以后,本来并不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递了三份出国申请书、交了 15 元人民币,要到法国去开个人画展,公安局才把他“请”了进来,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教养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他是“三余庄八大怪”之一,每逢星期假日,他身穿破大衣,腰里系一根草绳,在背风向阳的墙角一靠,津津有味地读着巴尔扎克原文版小说。“积极分子们”指责他和思想极端抵触,但却沉默寡言、不论大会小会从来一言不发的电气工程师王京结成了“联盟”,是抗拒改造的典型,多次进行批判,还把他在劳动工地上画的速写出拿出来作为“罪证”展览。

接着挨斗的是曹克强(落实政策后出任河北省清河县第二中学地理教师,因被毒打落下了癫痫后遗症,1994 年发病时无人照顾而故去)。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父亲是

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本人长得其黑无比，戴一副白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外号人称“黑皮”。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消极混泡，干什么活儿都磨洋工，从来都完成不了劳动定额，但是一到工地，干了不到十几分钟，就脱光了衣服，满脑袋流汗，装出一副干得十分卖力又十分狼狈的样子，谁看了也无法说他没出力气。斗争会上，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辩论，弄到后来连队长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送进一天只喝两碗玉米面稀粥的禁闭室，用“饥饿疗法”来治他的“顽固症”。

接着进禁闭室的，是被队部认定“言论反动到够枪毙的程度却又极善于检讨”的杨路，以及被阎麻子定性为“专门在背后策划鼓动、煽风点火、特别阴险的黑帮头子”赵筠秋（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落实政策后回北京日报社工作，现已退休）。

还有一个李泰伦，四川成都人，教养前是北京九中的语文老师，父亲是国民党的川军少将，还是个袍哥大爷，尽管解放前夕奉命组织过民革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川西，但是解放后仍作为“叛匪”被镇压了。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反改造情绪特别嚣张，写了许多“反动诗”。被谢自渝等“积极分子”揭发以后，又拒不承认，被关进禁闭室后进行“绝食斗争”，饿着肚子大唱革命歌曲，大呼“毛主席万岁”，以禁闭室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为由，要求增加放风时间，表现得相当突出。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连路都不会走了。落实政策后工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劲松五中副校长。

在无数“蹲小号儿”的人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定一（本是一名兽医，“文革”中被捕，下落不明，有传说已经被“镇压”）这

位老兄。因为别人进禁闭室都是因为“反动言论”,独有他是因为“打击报复”造成“伤害”关进去的。

那时候正值“龙口夺粮”的麦收大忙季节,日夜苦战,白天晾晒,夜间脱粒,人人都忙得连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一夜,李定一在场院脱粒。这活儿,是人跟机器比速度,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得跟着机器转,谁也别想偷懒,只要一个人或一个环节稍许迟缓一下,就会供不上料。李定一白天干了一天活儿,晚上接着上夜班,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借口大便,到厕所去蹲着抽口烟,喘口气儿。

脱粒机前面少了一个人,供料登时紧张起来,干活儿的负担增加了。人称“宋老二”生产组长宋有余见李定一上厕所一去不回,就去找他。进厕所一看,见他还在那里蹲着悠哉游哉地抽烟,就说他有意磨洋工。李定一当然不服,顶撞了几句,宋老二火儿了,不跟他多罗嗦,挥手就给了他两拳,要他赶紧回到岗位上去。

李定一挨了打,本想还手,转念一想,队长多次讲过:别人打你,要向队长报告,由队长处理,不要还手,不然,就变成打架斗殴,双方都没理了。于是他出了厕所,没上脱粒机,却跑到队长那里去告状,要求队长伸张正义,为他作主。

队长正在指挥脱粒,也忙得一脑袋热汗,刚听他说了几句,就不耐烦了,斥责他不该停下生产来纠缠这些鸡毛蒜皮,命令他立刻回到脱粒机前面去干活儿。

李定一挨了一顿打又吃了一通批评,回到脱粒机前,越想越有气,绝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挨打。正好宋老二就在他前面,他一时按捺不住,就用麦叉子狠狠地给了宋老二一下。宋

老二猝不及防，一声惊叫，伤并不重，却震动了全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看热闹。队长闻讯赶来，先吆喝着让大家继续干活儿，一面吩咐宋老二到医务室去上药，一面立刻派人把李定一送到设在一大队的禁闭室去反省。这一来，李定一倒可以真的躺倒不干了。

宋老二的伤并不重，第二天还是照常出工。像这种小小的“伤害”，队长为了杀一儆百，虽然把李定一送进了小号，但只要他肯应付性地写一份检讨，特别是在麦收大忙季节中，人手紧张，不难很快就放出来。偏偏李定一是个认死理儿的“杠头”，咬住了是宋老二先打的他，队长又不给他作主，所以他才“以牙还牙”的。他拒不检讨，队长也没台阶好下，总不能承认自己关错，于是倒楣的李定一，尽管躲过了大忙季节的黑白班连轴儿转，却躲不过一天只喝两碗棒子面粥的命运，而且没想到后来还有更好吃的果子在等着他。

## 5.4 不久讨还血债的“革命者后代”果然行动起来

拔白旗运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夏天，其间虽然“你刚唱罢我登场”，“运动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但是斗争方式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大字报批判，小组会揭发，大会批斗，自己交待，拒不检讨的送进禁闭室，如此而已。

这时候，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还没有打出来，但是社会上的“红卫兵”们却已经打着“革命”的旗号在横

冲直撞，而且来势凶猛，远非往日的政治运动可比。三余庄庄员中多数人感到来头不对，忧心忡忡，生怕运动会搞到劳改队来，横遭不测。而少数积极分子却以“革命派”自居，感到形势可喜，如果在混乱中认准了苗头，伺机出击，一旦投机成功，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至于相信政府还在“办手续”的书呆子，到了这个时候，恐怕连一个也没有了。

没过多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终于光明正大地打出来了。

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广播中“林副统帅”的讲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搬掉一切绊脚石，要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要让他们的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不知道自封的“积极分子”们作何感想，反正三余庄的多数人个个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

尽管我们身陷囹圄，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过那年月小道儿消息满天飞，也许早已经是旧闻的“最新新闻”仍能听到一些：

“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天真而无知，到处破四旧、打击封资修，见了古物洋货统统都砸，见了披肩发喇叭裤一律都剪，大姑娘连花裙子都不许穿，长辫子都不许留。谁还敢穿西装、旗袍，就给撕成一条条；穿高跟鞋的，就给脱下来扔掉。”

“城里的街道、商店都改了名，苏联大使馆前面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协和医院改名反帝医院，天安门广场要改名东方

红广场，还要把陕北民歌《东方红》定为国歌。"

等等，等等。

不久，指导员正式通知：以后对外写信，不要写大兴县，而要写"红旗县"，不过后面要加一个括弧，注明"原大兴县"。

改名之风也刮到了三余庄。这时候，刘佛生已经调到了我所在的第四组，并且混上了一个学习组长兼中队宣传员的名份。他感觉到自己的名字中带着个"佛"字，迷信的色彩太强烈了，主动改名为"刘复生"。另一个中队宣传员王祖德也闻风而动，立刻宣布改名为"王左德"。他们不但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也改。例如队里有个史镇华，他们就说："右派分子"，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也太嚣张了，立刻改掉！可是史镇华却说：我的名字是父母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有人感叹说："现在刮的是改风，什么都要改。"一组组长刘乃元(原新华社记者，落实政策后任新闻学院教授)听了反驳说："什么都要改？我的脸型能改么？"

有人把他的这句话汇报上去了，指导员在点名的时候公开说："脸型怎么就不能改呢？要想改，那还不容易？且看红卫兵能不能给你改脸型！"

果然，很快就传来了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城里的五类分子全挂了黑牌，上街也不许摘，有的还游了街、挨了打。"

"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毒打，气得跳湖自杀了。"

"北京六中的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校内毒打，一面打一面问：'这是无产阶级

穿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下去,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

这种传闻,不久就由队长来加以证实。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候,中队长宣读了一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印发的传单,标题叫做《告浑蛋书》,一开头就给"牛鬼蛇神"们当头一棒:"前一阶段,红卫兵出于革命义愤,打了你们的人。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虽说这份传单总的精神是打着幌子表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投在人们心灵上的巨大阴影,是无法抹去的。中队长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为了本单位的平静,用劝告的语气说:"大家要小心一些,千万不要私自外出。要知道,红卫兵可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呀!"这位公安局的干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威风,而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了。

我和同类汪介尘反复研究了《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句话的含义和作用,一致的看法是:口气太轻,纯系劝告的口吻,而不用"严禁"、"禁止"或"不准"之类的字眼,这且不说,只提"用"与"不用",已经点明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用了武斗,并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只不过"不能触及灵魂",效果不佳罢了。我们不能只看其结论,还要看它的理由是什么。如果红卫兵说:"我们就是要触及皮肉,不打算触及灵魂",或者说:"先触及其皮肉,打掉其威风,然后才能触及其灵魂",因此必须"用"一下武斗这个方法,反对者岂不是就失去了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么?

不久，一个更其可怕的小道儿消息传来：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都集中起来，然后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的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部是替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的犯人都突突了……

虽说传闻的小道儿消息不太可靠，有夸大其辞甚至纯系编造的可能，但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谣传，至少是个不祥之兆。

人们的心越缩越紧，那个可怕的魔影，似乎越来越近了。

三余庄院墙外面，贴出的红卫兵传单越来越多。所有传单，开头都写着"十万火急"或"勒令"的字样，署名多半是大兴县各学校、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有一张传单上写着："勒令！商业部门统统搬到农村去！"内容说：原来的商业部门大都在城里，为城里人服务，可是住在城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坏蛋。还有一份传单的标题是"剿灭天主教"，开头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传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最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是一张对"牛鬼蛇神"发出的"最后通牒"，大字标题印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

内容说："你们的父兄在旧社会剥削压迫我们的先辈，多少革命先烈被你们的父兄屠杀了。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人民的血债，我们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

三个巨大的惊叹号，像三枚扔进了人们心中的炸弹：

血债！屠杀！偿还！

魔影已经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

不久，魔影果然来了，讨还血债的“革命者的后代”，果然行动起来了。从就业队传过来的消息，千真万确：就在大兴县，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革命者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把敌对阶级统统消灭，革命就彻底完成了！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

大辛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100多的，有说八九十个的。最近看到《传记文学》1995年第六期《“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透露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可见“复仇的魔影”并不是大辛庄一处有。也许别处的魔影，正是在大辛庄的“带动”之下“群起仿效”的吧。

不过事后听说，也有两个大辛庄的地主子女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部技术员的老婆，她是地主的女儿。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抓回去批斗，场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知道地主的女儿一被抓回去，准是挨斗，就编了个谎言，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中，等本场批斗过以后，再押送回籍不迟。这一个，是场长做了好事，无意中保下来了。

另一个是黄村一街农民周广银的老婆，也是个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要抓她，赶巧她丈夫周广银是本村革命造反派的

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多少,于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是在贫下中农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的。那时候,从三余庄出去的"摘帽右派"张永贤和吴越都讨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他们就租住周广金、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他们带来的消息,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绝不会传闻失实。

我听见了这样的传闻,简直像五雷轰顶,有如天塌地陷;所有听见这一消息的人们,个人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那种恐怖的气氛,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

不久,就有一批大兴县的红卫兵到团河农场来造反,他们问干部:这批牛鬼蛇神中,哪些人表现最坏?这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当然是关在禁闭室里的人表现最坏。于是红卫兵们打开禁闭室,把关在里面的"反省号"全拖了出来,拳打脚踢,往死里打。那时候,三余庄的李定一因为死不检讨,还被关在禁闭室里继续反省。覆巢之下,必无完卵,这一次,他也难逃浩劫,被打了个半死。

也许是为了对付外来的红卫兵,也许是外面的红卫兵到处造反,也激发了干部们的"革命热情",总之是就在大兴县红卫兵冲击了团河农场之后不久,一批年轻的干部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年纪大一些的,则纷纷成立各种造反、革命组织,也戴上了名目不同的红袖章。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们见是这样的架势,不明所以,吓得心惊胆战,不知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些自封的"积极分子"们,却蠢蠢欲动起来,显得格外活跃。他们认为:农场内部既然有了红卫兵和各种革命派组织,外面的红卫兵大概就不会再来冲击了。队长人数

本来就少，如今农场内部也在闹革命，也在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教养分子中间，尽管“拔白旗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队部只有依靠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才能镇住“反改造分子”，保持教养队的“革命正气”。于是，他们到处找碴儿，想仿效外面红卫兵的做法，在三余庄掀起一股“横扫反改造分子”的热潮来。

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先是得到队部的许可，甚或就是队部授意、布置的。

事情还是从杨路这个“薄弱环节”开始。自从“拔白旗运动”开展以后，“积极分子”们揭露了杨路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几乎已经被认定是个“拔了尖儿”的“反改造分子”，比起谭天荣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几乎已经认定他是必然要“坐小汽车”被送走的了。之所以至今没有“荣升”，可能是“革命形势大好”，“革命派”和“走资派”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这种区区小事。因此，杨路成了死老虎一头，简直人人都可以充一下“打虎英雄”了。特别是还没有当上“积极分子”而又很想“积极”一下的人，都想整他一下，咬他几口，借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已经转到了政府的一边。再说，杨路身材矮小，文质彬彬，尽管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面对膀大腰圆的打手，还是没有自卫的能力的。于是，“积极分子”和“准积极分子”们就经常突然地对他发起进攻，谩骂、侮辱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动手打人的地步。

这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间，有三个“积极分子”寻衅找碴儿，借故打了杨路一顿，相对而言，打得不算太重，杨路不敢也没有力气还手，打算忍一忍就这样过去算了。

但是杨路肯忍,别人可不肯忍。消息一传开,"反改造分子"们被激怒了。

三余庄自从 1962 年夏季右派集中以来,虽然也经常开批斗会,并不时有人进禁闭室,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可还是第一次。大家认定:此风断不可长。要是任其发展下去,特别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被划为"反改造分子"的人,还有活路吗?

怀不满情绪者起初不过是个别交谈,传播消息,后来火气越来越大,竟三三两两地聚在院子里大声议论起来,以发泄不满。其中以高作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因为为铁托鸣不平而划为右派,又因为与陈独秀的孙女儿谈恋爱不肯割断联系而被送来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在秦皇岛某中学当教员)的嗓门儿最大,情绪也最激昂:

"凭什么打杨路?有问题可以批判,问题严重可以由政府处理,同是教养分子,凭什么动手打人?"

缪光谦(电影出版社的助理编辑,落实政策后回电影出版社任编辑,现弃文从商)同声附和:"《十六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他们为什么要武斗?"

曹克强一个劲儿地重复:"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就是不对!"

我没做声。我意识到"积极分子"们这次动手打杨路,决不是他们"革命热情高涨"之后的一时感情冲动,更不是单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做出来给队部看的,其中必然有后台,说不定就是队部放的一个试探气球,是一次火力侦察,目的是为了"引蛇出洞"。

"积极分子"们有队部作后台,气焰才会如此嚣张,才敢于动手打杨路。打了人之后,自以为这是干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露脸的勾当,气焰更加嚣张了,简直好像他们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似的。"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竟敢在院子里面大声疾呼,他们一则是怒,一则是喜;怒的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居然还有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反改造分子"杨路鸣冤叫屈喊不平;喜的是"蛇"一出洞,他们这些打手们可就有了再一次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了。于是"积极分子"们也纷纷走出门来,对反对他们打人的"反改造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围攻。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双方全都非常激动,当然不可能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恳谈,吹一阵和风,洒儿滴细雨,尽管一方是据理力争,另一方却是辱骂恫吓。"积极分子"们故意用"失控的语言"来刺激"反改造分子"们,希望他们中有人受不了这种刺激,也会"语言失控",于是他们就有理由像打杨路那样大打出手了。在那个年代,"革命派"打"反革命派",是一点儿没事的,但若挨打的竟敢还手,这可就是"阶级报复",甚至是"反革命行凶"!这是只许我打你,不许你打我,与社会上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两派武斗可不一样。

"积极分子"中,最猖狂的是赵家仁。这小子本是北京市粮食局的小干部,大概是个粮仓保管员之类,长得其丑无比,皮肤又黑又粗,大嘴巴,厚嘴唇,很像非洲的黑猩猩,说起话来,好像嘴里总叼着个什么东西,含混不清。但是却膀大腰圆,力气很大。今天就数他跳得最高,扯着破锣似的大嗓门儿,唾沫星儿四溅地高声狂叫:"你们他妈的都是跟杨路穿一

条裤子的反改造分子。我操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的十八辈祖宗!”

赵家仁虽然“积极”,但是解教后仍被发配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劳改矿务局所属的劳改矿)继续改造。这期间他在山西农村找了个“老板子”,进门就当“爷爷”。1979年落实政策,他因为在当地有老婆而不得回京,只好到“老板子”的原籍万荣县落户,在国家储备粮库看大门,既无权,又无钱,懊悔不迭,见人就痛哭流涕,诉说“不平”,真可谓“天有眼”也!

其余的“积极分子”也气势汹汹地大声叫骂,唾沫溅到对方脸上,手指点着对方的鼻子,一面还捋胳膊,晃拳头,竖眉立目,跃跃欲试,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来打算据理力争的人,一看对方又要动武,感到来头不对,有的赶紧到队部先告状,有的只好躲进宿舍内暂避其锋。只有曹克强还在发挥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嘛!”

赵家仁装出一副不屑于理会曹克强的傲然神态,腆着个大肚子,堵在房门口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正在这时候,队部的几个队长来了。“积极分子”们恶人先告状,有的摆出一副“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气慨,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继续破口大骂。郝队长听了“积极分子”们的诉说,也不再问问别人,怒气冲冲地下令:把高作纯等三个“带头闹事的反改造分子”送进禁闭室。事态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第二天开大会进行批判,刘佛生在批判中将这一事件称

为“骚乱”。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我相信也绝不是半文盲的队长们所能想得出来的。

队部在初战告捷之后，又乘胜追击。有一天，全队在宿舍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儿。临近中午收工之际，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由伙房送饭来吃，饭票晚上统一收。饭后就在工地休息，不许回宿舍去。

不久之后送饭的小车就推来了。饭菜非常简单：每人一律三个馒头、一块咸菜，这样，就可以不必使用碗筷；要喝水，反正有共用的水筲子。

既然离宿舍这样近，为什么不让回去吃饭？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带碗筷和饭票？

很快就有人根据情况作出了分析：刘佛生等四个“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出工，一定是队长带着他们在宿舍里进行突击搜查！

刘佛生是我们第四组的学习组长，但因为他兼任中队宣传员，大家出工他被留在队里写写黑板报或标语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开头谁也没注意；但是中队里一下子留下四个“积极分子”的事儿却不多，何况今天又有这样的“异常举措”呢？

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没有私藏武器，也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日记”，但我在几年前写过一首诗，是写在一个本子上的。我暗暗叫苦：如果真的进行搜查，我的这首诗一定会被搜走并被扣上强加的罪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但又不敢露出焦急的神情来，只能在心里盘算：万一小本子被搜走了，队部找我谈话的时候，想个什么主意遮掩过去。这时候，我恨不得能分身插翅飞回宿舍，抢先把我的小本子收藏起

来。

下午收工回到宿舍，果然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有大大小小的包袱都被打开了，有的人用锁锁着的小箱子，也被野蛮地撬开，杂七杂八的东西摊得满炕都是。大家噘着嘴刚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买饭的哨子就吹响了。按规定，教养小队的人要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门口去排队买饭的。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刚到伙房门口，就佯称忘了带饭票，跑回宿舍去拿。这时候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抓紧时间赶紧翻开铺盖寻找我的小本子。这本子，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的，现在是怎么也找不着了。我的心凉了一半儿。

买饭回来，各人坐在炕头闷声不响地吃饭。尽管我不知道吞进嘴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滋味儿，但我必须尽量装得镇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然，就是我心中有鬼了。我一边味同嚼蜡地吃着饭，一边偷眼去看刘佛生，只见他那双老是眯着的三角眼，正在不怀好意地瞟着我，嘴角分明还带着一丝冷笑，意思似乎是在说："我看你还能稳多久？"

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来。再一想，又后悔自己太大意了，其实汪介尘早就提醒过我，要我把"碍眼"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我那时候偏偏没有想起这首诗来。现在小本子已经落到了队长手里，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了。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说的就是"想想不要紧，说说有被揭发的危险，可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白纸上落黑字呀"。既然我已经形诸于文字，想不承认是不行的了。该怎么办呢？是主动检讨？还是先置之不理？

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哪怕我跪下求饶，也没有用，队长也和红卫兵一样，是不会大发慈悲之心的。本子既然已经被他们搜走，事情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也琢磨透了：我越软弱，他们就越认为我可欺。反正我写的是诗，不是什么宣言，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是我写的诗，至少应该先听我的解释。强加于我的，给他个一概不承认！

那首诗写了些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到了三余庄以后，我先是被编在另一个小组，组长是郑光第。他是浙江象山人，北大学生，有过一个女朋友，1957年他划右派以后，和他"划清界线"了。但他对"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人民队伍，还有光明前途"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通过努力劳动积极改造就可摘掉帽子，摘了帽子就算是回到了人民队伍，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地位和生活。

那时候我就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种想法前半段符合实际，即表现好的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由第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但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史反革命一样，你将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所谓党内右派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里来，最多不过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回到人民队伍，则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总之，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决无第二条路可走。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话，不少人认定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没有听信党组织的话，以后必须反其道而行

之，坚信党的改造政策和党组织所说的一切。他们把我的“反动观点”汇报上去，得了教训以后，我就不轻易对人说了，自然也不曾对郑光第说过。

郑光第为了和昔日的女友重温旧好，努力改造，干活儿简直像拼命，带伤带病也坚持苦干，终于在1963年摘了右派帽子，从劳教队搬到了就业队。就业人员是人民还是敌人？摘帽右派是公民还是国民？他和其他就业人员、摘帽右派一样，自作多情地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前者。于是他兴冲冲地找到过去的女朋友，说明来意。其结局自然不出当日的我和今日的读者所料。至于那不知该属于悲剧还是属于“喜剧”的场面细节，郑光第不愿对别人细说，也只好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转眼到了国庆节，照他想：虽然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穿着节日盛装参加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了，晚上进城去看看烟火总可以吧？这自然只是他的主观愿望。他不知道，每逢五一、国庆以及外国贵宾莅临首都，各单位的“暗管”分子、“内控”分子和街道上各种有问题的人，都早已被严加监督，更不必说彰彰在目的牛鬼蛇神了。队部对他提出的这种忘了自己姓什么的妄求也不婉言相劝，干脆有话直说，免得以后再来罗嗦。现在我想当时如果队部对他好言相慰，说明摘掉帽子只是走了改造的第一步，今后只要再如何如何就可以完成“由右派到人民的转变”，也许他还会鼓起勇气走上那无尽头长征的第二步的。然而就业队的队长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是什么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个把牛鬼蛇神，算得了什么？何况是个沉溺于反动幻想而执迷不悟的家伙！

国庆之夜，郑光第溜进了北京城，正当天安门广场上火树银花不夜天，革命群众载歌载舞，彻夜狂欢之际，他在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必须说明一句：那时候的北海公园，一者因为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二者因为江青的死党们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密谋策划，“文革”初期就关门大吉，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估计郑光第是从北海大桥上跳下去的。当时北海大桥只有一米高的石栏杆，由于在这里“自绝于人民”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改建加高，想跳也跳不成了也。

死讯传来，人们开始震惊、叹息；事过境迁，又逐渐淡忘了。想争取有个较好前途的，仍然在争取；存有幻想的，仍然用幻想安慰自己，免得失去活下去的意义。在无可奈何中，且让渺茫的希望继续掩饰自己因求生的本能、因对死亡的恐惧而苟延残喘吧。听到郑光第死于非命的消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其实我和他相处不久，接触并不多，更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什么，说不上是朋友。但当时我想了很多，感慨万千，要说的话汹涌而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诗。由于原稿被抄，至今没有下落，仅凭记忆，大致如下：

写在心中的诗
你死了，我……羡慕你，
从此，你再也听不见
那恶毒的咒骂和刺耳的吼叫，
你再也不必耽心

那饥饿的手会紧紧地扼住你的咽喉。
灼热的阳光
再也不会烤焦你的背，
刺骨的寒风
再也不会扎痛你的脸，咬烂你的手。
肩头不会再出现勒红的印痕，
腰也不会酸痛得直不起来。
再也没有人用恶狠狠的目光
和鄙夷的冷笑抽打你。
你终于得到了宁静和休息，
那是对于终生苦役的报答。

你是渺小的，
在屈辱中活下来，
又在屈辱中死去。
当你的苦汁滴在土上还未晒干时，
你已被苦难的人们忘记，
也被制造苦难的人们忘记。

但是，谁肯相信
在那弯曲的背影里，
在破烂的衣衫下面，
也有一个人的灵魂？

你在悬崖上拼命地爬呀爬呀，

爬向云雾遮盖的山尖，
终于看见了
那山尖，只不过是坟墓。
于是茫然地松开了握住荆棘的手……

谁肯相信，
你也有自己的感情，
这样一个奴隶！
你可知道
那横亘在你们中间的冰山
也早已冷却了少女热烈的心？
那湖水是多么透明，多么透明啊！
那里有美好的回忆
有过去的身影，
什么都清清楚楚，都还和过去一样。
现在，湖水变得温暖了，
冰冷的湖水，变得温暖了……

湖水散开了，又合拢来，
掩盖了最后的悲哀。

我的笔，你在哪里？
我的纸，你在哪里？
我的泪，你向哪里流？
我没有写，没有写，我不能写，

这是一首写在心里的诗呵!
只能永远永远地写在心里。

最后三段记不确切了,和被抄没的原件相比,字句上肯定有些出入,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 5.5 周末之夜的"俱乐部",转瞬间变成行刑室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紧扣在大地上,锅里面没有一丝风,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人的心情也像铅一样沉重。树叶差不多快落尽了,露出了鸟巢,间或有一只乌鸦飞过,带着难听的叫声。我们埋头给麦田放水,冰冷的水无声地流进褐灰色的土地,涌起灰色的泡沫。柔弱无依的麦苗,在水面飘摇着。

1966年11月19日,又是一个周末。现在是"狠抓革命"阶段,还没提"猛促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可人们干得还挺积极的。这,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用干活儿来暂时麻痹自己也可以。收了工,今晚干什么?照惯例,周末晚上是不学习、不读报,也不开会的。

可是你能在院里到处走动么?——你想进行什么活动?

到别的宿舍里聊天?——你想搞反动串联?

或许你想下盘棋?——你对现实斗争抱什么态度?怀着什么鬼胎?

不约而同，大家都默然地在铺位上半坐半靠地歪着。这是劳教右派们的一种特殊坐姿：把被子叠成厚厚的方块，靠墙斜放，人倚在上面，两腿伸直，或把叠好的被子略微打开些，一半铺在炕上，另一半靠墙，背部紧靠着软和厚实的棉被，颇有点儿像是靠着沙发的味道。有吸烟习惯的，再点燃一支劣质的廉价纸烟，缕缕青烟遮盖了四周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自己与现实暂时分割开来，掩护自己进入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是当时劳改队基本上统一的生活方式。

众人都这样坐着，只有刘佛生的位置空着，他又上队部开会去了。周末召集组长开会，会有什么事儿呢？开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仅是四组的学习组长，直接管着十几号人，还和外号王癞皮的王祖德一起当中队宣传员。现在的宣传员很少像以前的宣传员杜高那样上工地拿起铁皮喇叭筒大声喊叫了。大家出工，他俩多半留下来整理各种揭发交代的材料、撰写批斗会上的发言稿，或按照队部的意思写批判大字报，完成批斗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有时候剪报，分类贴在一间被队部叫做“俱乐部”的空房子里。然后组织这些早已看过报纸的劳教右派们去“参观展览”。他俩说得上是队部的助理和参谋，是名副其实的高等犯人。

刘佛生的父亲是个资本家，50 年代不知为什么关进了监狱，1960 年死在里面。刘佛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他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唯一的反应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背这沉重的家庭包袱了，不是背更沉重的“有杀父之仇”的包袱，而是没有包袱可背了。

刘佛生终于从队部回来了。他的脸色铁青，喊了一声：

"大家注意!"脸上一副十分严肃的神情,可以预料他将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要传达队部的什么重要指示。他一边翻看小本子,一边瞟视各人的表情变化,慢慢儿地说出一件事情来。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天,大家都在宿舍里休息,在一组宿舍里,闲得无聊的郭允德坐在炕上,在一个翻过来的旧香烟盒儿上瞎写。烟盒是阿尔巴尼亚进口的(改革开放以后方才知道,这种所谓的进口烟,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LUX牌。这种烟是硬盒精装的,价格却比国内产的中下等烟还便宜,只是烟味儿不太正,一般人都不爱抽,却被穷劳改犯们认为是价廉物美的最受欢迎的品种,因此那时候三余庄到处都是这种烟盒儿。也许是那时候大会小会报纸广播上"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许是宿舍墙上到处贴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之类的标语,所以他就漫不经心地在烟盒儿的背面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字句。凑巧坐在他旁边同样闲得无聊的王玉琦和他闲聊起来:

"老郭,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钢铁学院的学生。"

"钢铁学院?哪个系的?"王玉琦饶有兴趣地刨根问底。

"轧钢系。"

"轧钢?这个'轧'字,怎么个写法?"

郭允德怕说不清楚,于是顺手就把"轧"字写在烟盒上给他看,说来也是凑巧,这个"轧"字,正好写在"毛泽东"三字的上面,不过明显偏在一边,并不在一行上。

当时他们俩谁也没注意这件事情，写完了，就把烟盒儿顺手一扔。但是王玉琦的冤家对头董立，却早在一旁密切地注视他们。没等郭允德、王玉琦反应过来，董立就把这个烟盒儿拿了过去仔细端详。一见有这样四个字，如获至宝，当时就举着“胜利品”冲向队部。那时候七中队的指导员换了个姓于的，他虽然也很“左”，不过中队里几次发生打人事件以后，他倒是明确表示过今后不许随便打人。但他最近外出开会去了，中队工作由新调来接替郝中队长的盖某主持。董立就把缴获的“罪证”交给了盖中队长。

董立是琉璃河小学的音乐教师，个子矮小，文化水平相对而言也比较低。他干活儿不行，告密打小报告却是行家里手。王玉琦原是钢铁研究院的一名临时工，“反右”中因为凑不够5%的“定额”，只好拉他来凑数。他文化不高，但性格直爽，平素最看不惯董立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他的身材虽然并不高大，却也膀大腰圆，前不久就因为董立瞎汇报曾经用拳头“教训”过他，封了他一只眼睛。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因为董立这个坏小子报复引起的。

盖队长把“罪证”拿去给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看，要刘乃元先在组内组织批斗。刘乃元一眼就看出这四个字根本就不是连续写下来的，但是刚一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了盖队长的“驳回”。刘乃元无可奈何，只好不痛不痒地在组内开了几次会，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郭允德心知这件事没完，预料到将要大祸临头；王玉琦心里对董立更加厌恶、反感，当别的组有人问及这件事情的经过，王玉琦当然严词谴责了董立，最后还说：“等着瞧，不定哪

天我还要封了董立这小子的那只眼睛!"

这句话,又有人报告了盖中队长。今晚上组长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盖中队长布置了今晚开会斗争王玉琦以后,接着动员说:

"反改造分子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对靠拢政府的人行凶报复,就因为以往对他们的斗争太客气了,他们才这样猖狂: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有些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老找队部,说反改造分子如何骂他们,还要打他们。我说,你不用找队部,找队部也没有用。他骂你,那是你愿意听!他打你,那是你愿意挨!

"今晚开会,要狠狠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客气。他要打,咱们就打个样子给他看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检验每一个究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子一边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晚7点半第一小组在俱乐部开会斗争反改造分子王玉琦。因为他企图行凶报复。郭允德另作处理,今晚主要斗争王玉琦一个人。欢迎其他小组的人自愿参加。"

"自愿参加"!开斗争会居然还有"自愿参加"这一说,这可真是盖队长"主持中队日常工作"以来的新举措!连看电影都要集合点名"统一行动"的劳改机关,开性质如此严重的斗争会,居然不开全队大会而用小组会的名义!既要收敛"每一个人"却又是"自愿参加"!这种会,恐怕没有哪个人竟会糊涂到不"自愿"参加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批书呆子们,还是估计错了。

传达完了,时间也到了7点半,刘佛生率领全组走向俱乐部。范光斗、谢自渝、胡双来等"积极分子"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其他人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

范光斗是北京市政协秘书处秘书,山西人,大家都叫他"老西子"。他虽然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但是写起字来歪歪扭扭,真不知他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他划右派以前,因为与小保姆私通,夫妻关系本来就极紧张,一划右派,老婆就跟他离婚了,所以他也成了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之一。他干活没体力,老完成不了定额,可是饭量却极大。多亏吴越隔长不短儿地进城去帮他到一个姓郭的女人家里去拿烧饼、点心之类回来吃,一拿就是一面粉口袋。没想到喂出这样一个"白眼狼"来,吴越真是瞎了眼了。此人现已故去。

谢自渝更是一个突出的两面派。他是北京水利电力学校的毕业的技术员,湖南人,个子不高,肚子里并没多少东西,却傲得不行,自称是铁托的干儿子,曾扬言要写一部《续国家与革命》,要与列宁比一比高低。特别是后期,简直像一头疯狗,逮谁咬谁。胡双来是哈工大的一年级学生。划右派以后,并没有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积极争取:到新华书店去偷书,被抓住以后,才进了公安局的。不过落实政策以后,却数他本事大,如今已经有了两所住宅,还有自己的小车,在"右派"当中,堪称首富。

所谓的"俱乐部",前面说过,只是一间空房子,其实里面从来没有扑克、象棋之类的文娱用品。

我们走到俱乐部门口,其他各组也陆续来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木棍。我心里猛地一惊,尽管估计到今晚可能要动武,

原以为也不过像打杨路、缪光谦那样，不过打上几拳踢上几脚罢了，现在看来，他们是要学"红卫兵"的"大打出手"了。我不由得为王玉琦的处境担心起心来。

进入会场坐下，看见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100多人把不大的屋子填得满满的，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往日一开会就抽烟，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抽的，连咳嗽也只是偶尔有一两声。天花板上一支500瓦的大灯泡亮得刺眼，墙上贴着四张方方正正的大白纸，每张纸上写着一个斗大的黑字，合起来是：

斗　鬼　大　会

今晚上真的要把人斗成鬼吗?

两个队长早就来了，一个是王队长，另一个是新调来的高队长或岳队长，记不清他姓什么了。他俩一反常规，不进屋主持会议，却像牛头马面似的分别站在两个门的外面，满脸杀气，狠狠地盯着进入室内的人群。看那架势，今天的会场是只许进不许出的了。尽管今天的会是一组的小组会，别的组不过是"自愿参加"，但是这个"斗鬼大会"却不是由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主持，而是由中队宣传员刘佛生越俎代庖。后来才知道：刘乃元因为感冒大夫给假条让他休息三天，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他"躺倒不干"，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第一道程序，自然是援例恭读毛主席语录，众人屏声静气听他领读。平时开会，往往从队部所挑选的语录就能大致估计到斗争会的火力猛烈程度，这次选的语录却只有两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就是那段全国传诵，使用率极高，牛鬼蛇神们听了都会心惊胆战的著名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刘佛生接着介绍"事件"的经过，刚开了个头，王癞皮迫不及待地领头高呼口号："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人伸直胳膊大声叫喊。在狭小的空间里喊声汇集在一起，显得特别响亮，真所谓"声震屋瓦"。

王癞皮又喊："把王玉琦揪出来！"

一群"积极分子"一叠连声狂喊：

"把他揪出来！"

"把他揪出来！"

"砸烂他的狗头！"

王玉琦默默地从人堆中站起来，走到会场中间。那里有一小块空地，是专门留给他的。他身材不高，却粗壮结实，选择他作为毒打对象，是盖中队长的高明之处，要是换了瘦小枯干的杨路等人，恐怕挨不了几下打就没命了。

几个"积极分子"站在他身后，按住他的脑袋用力往下捺。

稍稍平静以后，刘佛生以会议主持人的姿态站了起来说："现在，先由董立揭发。"身材矮小的董立，一听"主帅"发出了命令，立刻像出阵的战将似的挺身而出，耀武扬威地站在王玉琦面前，指手画脚地说了起来。按说，他的揭发应当属于"控诉"一类，应该以他受到王玉琦"报复"的遭遇激起人们对王玉琦"罪行"的愤慨。但是他又丝毫没有通常控诉者那种泪流满

面、泣不成声的样子。因为他实在无法掩饰立功后洋洋得意的心情。当他说到抓住了“罪证”跑到队部的时候,几个“积极分子”高喊口号:“董立做得对!”

“坚决支持董立!”

但是没有人响应,其余几个“积极分子”也不做声。

有几个早就不耐烦了的“积极分子”冲上来对王玉琦大喊:“跪下! 跪下!”算是对喊口号的呼应配合。他们见王玉琦没动,就上前把他推倒按住,并朝他脸上身上乱打乱踢。董立、刘佛生、王祖德也纷纷挥拳猛打。王玉琦不敢还击,只好双手抱头护住要害部位,一面“哎哟哎哟”地叫唤着。脑袋护住了,背上又“咚咚咚”地挨了几拳。几个打手早就有所准备,他们模仿红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狠狠抽打王玉琦的胳膊、脊背。但有棉衣护着,并不太痛,打手们觉得不过瘾,就一齐狂呼:

“他妈的,把他的棉衣扒了!”

“把衣服扒光!”

“叫他自己脱!”

王玉琦当然不会自己乖乖儿地脱了衣服请人家打。于是打手们立刻扑了上去,七手八脚地扒他的衣服。到了这时候,王玉琦想不驯服也不行了,他像一头任人剥皮宰割的羔羊,露出了光光的脊背,一个粗壮结实的胴体暴露在耀眼的灯光下!

蚊子盯住了血,恶狼看见了肉,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打手们争先恐后地抡起皮带向裸露的肌肉抽去,举起木棍砸去。鞭扑皮肉的噼啪声淹没在凄厉的惨叫中,一声声撕心裂肺。我觉得耳膜仿佛要被刺破,连凝固的空气也被劈开了。

"大会主持人"刘佛生想起了会议程序，喊了一声："大家静一静，让董立把话说完。"

董立三下五除二结束了显得过时的发言。积极分子又喊："把郭允德揪出来！反革命分子郭允德滚出来！"

所有的目光一齐转向蜷缩在人群中的郭允德，几个打手抢入人群伸出利爪，郭允德直往后躲，他身边的几个人满脸惊恐，一边小声地说："快出去吧！"一边轻轻推他。几双魔掌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从人群中拖到了王玉琦的身边。这个身体健壮的大汉，此刻像秋风里的一片落叶，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充满恐惧的双眼不知在向谁乞求。许多人不忍再看，把目光转过一边去或看着地上。我一转脸，看见杨路的脸色惨白，正转过脸来看我。

刘佛生因势利导，他似乎忘记了盖中队长"只斗王玉琦一人"的指示，竟把斗争矛头转向了郭允德。

一个"积极分子"厉声责问："你为什么要轧毛泽东？"

一群"积极分子"同声应和："说！快说！"

郭允德小心翼翼地哆嗦着分辩："我说的是'轧钢'的'轧'……"

"你是不是要造一架轧钢机轧毛泽东啊？"一个"积极分子"狞笑着问。

另一个"积极分子"揭发："他有个小本子，上面抄了一首诗，写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几个打手跳起来边打边喊："我叫你当鬼雄！我叫你当鬼雄！"

郭允德被打得摇摇晃晃，撞到了墙上，连墙上贴着的大白

纸也摇摇晃晃的。打手们又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几下子也把他的上身衣服脱得精光。

先是拳打脚踢，接着皮带木棍，暴雨似的向两堆血肉之躯猛抽猛砸。俱乐部转瞬间变成了行刑室，一幕幕地狱的惨景突然呈现！王玉琦发出痛彻心肺的高声惨叫。郭允德痛得大喊大嚎："妈呀！妈呀！"一个30多岁的强壮男人居然会像孩子一样哭喊，听起来特别可怕。

打手们狞笑："你妈也救不了你！"接着又是几皮带！

木棒和野兽的利爪一起狂舞，皮带刮起的妖风在横扫。一棍子下去，背上立刻一块青紫，一皮带抽来，赤裸的脊背上又添一道血印。墙在摇晃，地在震动，吊在屋顶上的灯泡也在震动，灯光在墙上映出了魑魅魍魉的幢幢鬼影，不断传来连虎狼也不忍心听的惨叫声犹如万箭穿心！

被人们称作没心没肺的武从德，外号武三蛋，即坏蛋、笨蛋、浑蛋。他充分发挥了他的第一个特点。他额上青筋爆起，张开大嘴，露出板牙，上面抡圆了皮带猛抽，下面用脚乱踢。嘴里像毒蛇吐信似的不干净地骂着。如果说红卫兵把"革命行动"作为毒打的代名词，他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就应该叫做"革命语言"了吧！

也有些打手不像武三蛋那样一味毒打，他们打上几拳又忙里偷闲地注视着人群的反应，看看他们有何表现。特别是刘佛生，两只小绿豆眼总是骨碌碌地满场上乱转，不知窥探些什么。

按住王玉琦、郭允德的人早已放开手，腾出他们俩的后背来，让更多的打手可以有"用武"之地。他们两个双臂护住头

部，身体本能地躲闪皮带棍棒的狂噬。他们的两腿被踢伤，已经站立不起来，只能在地上乱滚乱爬。布满伤痕的身躯爬到哪里，皮带棍棒就追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惊恐地退缩。

这时候，把门的两个“牛头马面”终于进来了。鞭扑皮肉的声音突然停止，尖锐的惨叫声也低沉下来，打手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他们冷冷地审视着趴在地上、两手抱头、不断唉哟呻吟的两个“鬼”，足有几秒钟的工夫，高队长突然厉声高喊：“张晓谦！”张晓谦是目前右派劳教队唯一的一名就业人员，担任仓库保管员重任，是个得到部队信任的高等犯人。为什么突然喊他？

张晓谦连忙上前答应，高队长吩咐：“上仓库拿两条绳子，把这两个家伙给我吊起来！”

“是！”张晓谦回转身，一溜小跑不见了。

高队长布置完毕就离开现场。一些纯属“表态型”的打手也逐渐住手了。剩下的武三蛋、范宝新、张晓蓁、赵家仁等“八大金刚”却更加疯狂起来，那隐藏在人性黑暗最深处的残暴因子也冲破一切限制，毒打早已超出了“表示自己立场有了转变”的范围，变成了兽性的发泄，打手们个个成了施虐狂！

受害者惨叫，打手们狂呼，拳头巴掌早已不过瘾了，木棍皮带轮番猛打，受害者拼命挣扎滚动，用尽全身气力叫喊，众人再也无法保持平静，都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拥挤着、涌动着，像一锅煮沸的开水，全场大乱。当人群涌到了门口，我趁势退出会场，门外已经有十来个被挤出来或被吓得退出来的人，个个脸上极度惊恐，这种场面对谁都是第一次！

高队长却往室内挤，他大概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趁没人注意，我快步走到厕所。我需要找个地方冷静一下，把快要跳出腔子的心捺回去。

冷静！千万冷静！厕所也不是久呆之地，一旦被队长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我定了定神，又赶紧回到会场门口。两个“牛头马面”正把退出会场的人往回赶：“都进去！都进去！”我连忙混在被赶的人群中，溜进了会场。

我出去了大约一刻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就在毒打高潮，杜高喊了一声：“在我们病号组，也有一个反改造分子，他长年泡病号，不出工。像这样的反改造分子，难道不应该也拉出来斗吗？”他说的“反改造分子”，指的是李泰伦。可是当时大家正盯住了王玉琦和郭允德，谁也没理睬他。要不然，李泰伦那夜晚也非被打烂了不可的。

毒打还在继续，丝毫没有放松。张晓蓁怪眼暴突，轮起皮带猛抽，一皮带下去，旧伤痕上立刻添上新伤痕。这家伙以前进过公安干校，还到北京市公安局设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著名劳改单位兴凯湖农场实习过。他打人特别凶狠，大约是因为受过特殊训练吧！赵家仁脸上的满脸横肉已经沁出了汗珠，他也抡圆了皮带。在“反骚乱”中，他只发挥了大嗓门的特长，其余的能量没有充分发挥。今晚这里是他们一伙儿的天下，他自然要大显一番身手。还有范宝新、陈平，更不用说武三蛋之类，个个挺胸叉腰、龇牙咧嘴、竖眉立目、威风十足。时光似乎倒流了十几年，他们俨然都成了“革命小将”似的，在500瓦大灯泡照射下，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吃人面目！

这里附带说一句：打手陈平，原是北京纺织公司干部，落

实政策后，爱人已经与他离婚，右派朋友也因为他是个打手而不愿与他交往，日子过得很苦恼。

看！杨学章（原政法学院助教）高举木棍恶狠狠地砸下来了。他以前对谢自渝说过："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除非中国也出个赫鲁晓夫。"结果被谢自渝立即检举了。他感到前途凶多吉少，今晚表现得这么凶狠，是想用别人的血来洗刷自己吧？

就连张开元，一个糟老头子，也得空就上前拧一把、打两拳，借以表现他的"积极改造"！

王玉琦、郭允德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了。他们已经没有挣扎爬滚的气力，皮带木棍打下来，再也激不起尖厉的叫喊，而只有微弱的呻吟、低沉的哀鸣。他们身上早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到处是惨不忍睹的伤痕。时间似乎已经凝固了，不再向前。不少打手已经累得不行，停下来靠墙喘气，有的还发出鄙夷的冷笑，不时用脚踢踢那两个半死不活的"鬼"，边踢边骂："他妈的，装死！"

大约是听到惨叫声逐渐微弱下来的缘故，高队长进来了。他仔细审视着两个"鬼"，那目光，纯粹是屠夫注视着被宰牛羊的目光，冷静得吓人。

这时候，出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张晓谦，不知从哪里突然钻了出来："报告队长，仓库的钥匙找不到了。"

保管员把仓库钥匙丢了，就好像做官把印丢了一样。我心里暗说："算你张晓谦还有点儿人味儿。"高队长却没有理会他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解释，看了两个"鬼"一眼，又看了看那群疲惫不堪的打手，居然什么也没说，竟匆匆地走了。

打手们一时拿不定主意：队长这时候走了，什么意思？可

别领会错了。何况大多数打手也实在没有继续再打的劲头了。

突然，八九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人：盖中队长气势威严中带有几分高深莫测的派头，目光咄咄逼人，“牛头马面”则紧跟他身后。这些大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个个手提长条木板，来势汹汹，一个劲儿地喊：“两个坏蛋在哪里？”人群赶紧让出一条通道。我听见有人小声说：“是后面就业队的组长。”哦，原来是队部调来的生力军！

又是一阵腥风血雨，木板狠命地砍下去，向两堆血肉模糊的肉体砍下去，本来已经微弱下去的呻吟声又变成了尖声惨叫，凄厉而嘶哑，惨不忍闻。伤痕上又摞上伤痕，已经不大能动弹的两堆血肉又猛然蠕动起来。这是生命在作最后的挣扎！看了看那两个似乎已经“死去”的鬼，在自己的安排下又受到强烈刺激而“活了过来”，盖队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欣赏了一阵之后，仿佛火候已到，他干咳了两声。

一切归于平静，只有盖队长的声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响：“今晚的会就到这里，各组回去马上讨论，每个人都要联系今晚自己的实际表现，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家要擦亮眼睛，看周围有没有谁对这两个家伙抱同情态度的。”然后又吩咐一组的生产组长：“今晚安排四个人轮流值班，防止他们行凶报复。”

支援队伍洋洋得意地走了。打手们带着喜悦和疲倦，其他人带着恐惧和悲愤，也陆续走了，灯泡还是那样亮，灯光下“斗鬼大会”四个字还是那样刺眼。离开实为“刑讯室”的“俱乐部”，外面的寒风吹冷了我燃烧着的血液。也许马上就要轮

到我了。我写的那首诗已经落在队长手里，今晚上我的"表现"又是这样，队部会放过我吗?

在劫难逃!

回到组内，大家都在炕沿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没有谁敢像往日那样靠着被子。刘佛生主持开会，先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这段语录较长，恕我不全文照抄了。

读完语录，他开门见山地说："今晚开会对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家对这两个坏蛋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想对检举的人进行报复的行为，都非常气愤，可是咱们组内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稍稍停了一下，他把脸转向我，然后喊我的名字。

我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时辰到了。自从听到"大辛庄惨案"的那一天起，我就随时准备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此刻，任何胆怯犹疑都无济于事，"事到万难须放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如果也把我抓进"俱乐部"，先把那只 500 瓦的灯泡砸烂了再说。然后在黑暗中混战一场，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人活百岁终须死，老子今天活够了。想让我跟他们俩一样白白地叫你们打个半死，门儿也没有!

刘佛生先问;"你对今天的会抱什么态度?"

"我完全拥护。"

范光斗抢先插话："拥护不能光凭嘴说，要有实际行动，看关键时刻敢不敢面对敌人刺刀见红。"

范光斗已经是个中年人，体态臃肿，步履蹒跚，没有多少

力气，在打手中也不过属于“表态型”。在“反改造分子面前”，他是挥过老拳的，算是“刺刀见红”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借用林副统帅的惯用词句来表现自己。

“那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刘佛生还是那副不快不慢冷冰冰的腔调。微弱的灯光下，那对绿豆眼像两粒闪烁的鬼火。

“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敢刺刀见红?”

范光斗又抢着问，这头蠢驴一门心思地只想突出自己“敢于刺刀见红”，竟不知道说我退出会场是对大会的抗议！

我立刻回答刘佛生：“我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我马上就回来了。”

“你早不上，晚不上，为啥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静过，立刻反驳：“我每天都这个时候上厕所的，你不是经常批评我学习时间不应该老上厕所吗?”

我说的实情，刘佛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中，忽然他看见坐在我旁边的王继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立刻把矛头转向这个曾说过“毛泽东连外语也不懂”的“反改造分子”：“王继俊，你为啥中途退出会场?”

王继俊吓得面无人声，坐在炕沿像初冬的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几个“积极分子”的喊声此起彼落：

“站起来！王继俊！”

“王继俊，站起来！”

王继俊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好像不离开炕还有最后一点

依靠,但他根本站不直,尽管两条腿紧紧靠着炕,全身还是轻轻地战栗。

"说!"

"快说!"

"说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

"我、我、我……"

"我什么!快说!"

"我害怕……"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看见鱼儿已经入网,刘佛生的声音顿时平缓下来,脸上还带有一丝笑意。

"你怕什么?"

"斗敌人,你有啥害怕的?""积极分子"们乘胜追击:"你为啥怕斗坏蛋?"

"我……我……"王继俊抖得更厉害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刘佛生还想继续"启发";胡双来已经不耐烦了,大喝一声:"跟他说不清楚!拉到俱乐部去!"

范光斗、谢自渝急忙附和,刘佛生一挥手:"走!"几个积极分子把魂不附体、两腿发抖的王继俊连推带搡地拖出宿舍,其余的人只好不声不响地跟了出来。到了院子当中,范光斗对着全院大喊:"都上俱乐部去,斗争王继俊!"

各组的人很快又都出来,一下子涌进了"俱乐部",把王继俊围在当中。他吓得全身发软,脸色青灰。刘佛生向大家略作介绍以后,经过短暂休息恢复了体力的打手们又都高举木棍皮带一拥而上,劈头盖脸一阵乱打。在王继俊哭爹叫妈求饶命的叫唤声中,突然又响起了打手们的嗤笑声:因为王继俊

吓得大小便失禁了，湿了一地。但是打手们仍然不依不饶，哭叫声又一次划破了三余庄的夜空。

刘佛生直接领导的四组揪出了王继俊，又立了一功。六组组长张晨光不肯放过这个突出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何况前些日子他老婆在城里挨过红卫兵的打，正一肚子气无法发泄。于是他也大喊："我们组有个反改造分子史镇华，大家开会斗坏蛋，他在一旁蒙头睡大觉！"（此人后来也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由于他有过这样一段颇不光彩的历史，见到当年的"三余庄庄员"们，居然比见到队长还要恭谦三分，连说话都是低三下四的，当年揪斗史镇华的"英雄气概"，已经荡然无存了。）

"怪不得刚才开会没有看见他！"

"他这是对斗争不满！"

"这小子一贯反改造！"

几个"积极分子"七嘴八舌地喊叫着，有人提议："把他抓来！"

一伙儿人放过了王继俊，由张晨光带领去抓史镇华。很快，史镇华被他们推进"俱乐部"来。他上身光着，下面也只穿条裤衩。直到这时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组里派他给麦田放水，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书呆子还像往日一样拼命地干活儿，搞得很累，又受了些风寒。今天是星期六，按以往规矩，晚上本该休息，何况盖中队长下的动员令说的就是"自愿"参加，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宿舍里"自愿"睡觉。哪料到"蒙头房中睡，祸从天上来"！一群凶神恶煞迎面向他扑来，他见势头不对，两臂又被几个大汉抓住，动弹

不得，连什么事都还没搞清楚，忙说："我认罪！我认罪！"

早已打上了瘾的这伙儿人岂肯饶过他？二话没有，上前就是一顿皮带木棍，不知是谁一棍子打在他额角上，顿时鼓起一个青紫色的充血肿块。史镇华的大声叫喊，立刻盖住了王继俊的哀嚎呻吟。打手们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睡觉！我叫你睡觉！"这时候又有喊："还有黄克疆，今晚上跑哪儿去了？"

打手们纷纷附和："对对，还有黄克疆，他也没有参加会！"

"这小子一贯反对毛主席！"

"找他去！"

"把他抓来！"

于指导员以前在一次会上透露：黄克疆曾向指导员说过，他对毛主席的某一段语录有不同意见，还真的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队部代为上交。至于内容，指导员没有说，他也从来不在下面散布，因而无人知晓。

几个人分头去找，很快都回来说："这小子跑了！"

"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抓回来好好儿收拾他！"

刘佛生、王癞皮，另外还有几个人赶紧上队部汇报这个新情况，暂时放过了王继俊和史镇华。

盖中队长很快来了，满脸惊恐的黄克疆跟在他身旁，后面是几个"积极分子"，向大家解释："原来这小子跑到队部去了。"

盖中队长咳了一声，打手们立刻安静下来，只等一个暗示，他们就又可以过足打人的瘾了。然而盖中队长心里明白：

逮捕黄克疆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万一打伤打残，不好向上面交代。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气说："都回去吧，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出工。"他只叫两个宣传员留下，其他的人纷纷走出"俱乐部"。路灯似明似暗地亮着，勉强能看见地面。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嗖嗖地吹，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有弥漫四周无孔不入的寒气，冷到了人们心里，直到走回宿舍，也没有人说话，都默默地脱衣，默默地上床。后来有个人低声问"山羊"："现在几点了？"

"11点过了。"

然后又是沉寂，死一般的沉寂，简直像一座坟墓。往日这时候早应该有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没有了。王继俊的呻吟声，却听得格外清楚。还有不知是谁的一丝轻微呼吸声，偶尔也有很轻的翻身的声音。但在这出奇的静寂中，细微的响动，都像狂风、闷雷似的，响得惊人。

我突然涌现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吸烟的欲望，虽然我从来不会吸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念头，而且这么强烈。也许我需要的不是烟而是烟雾，它可以遮盖那一幕幕显现在眼前的惨剧，使它不那么清晰逼人。

这是真事儿吗？真的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过吗？

这个漆黑的夜晚，在北京，有多少人遍体鳞伤，在痛苦地呻吟，还有多少人被极度的恐怖吓疯？……

王玉琦、郭允德，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无法想下去，我觉得我的神经已经疲倦了，麻木了，不能正常运转了。

一夜过去，天快要亮了，我才有几分迷迷糊糊，但恐怖感

一直紧跟着我。

我记得，今天是：1966 年 11 月 19 日，三余庄不寻常的一个周末。

头昏脑胀地迎来一个新的早晨，看见组内其他人也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大约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好。我想。

去伙房买饭，门口竖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贴着大白纸，赫然几个大字：

昨晚向反改造分子发起总攻击，获得巨大胜利！！！

买饭回来，正碰上几个打手从宿舍旁边的医务室出来，有的手腕上贴着胶布，有的手上涂着药水。他们"总攻击"时用力过猛，扭伤了筋，这是缺乏经验的打手"光荣负伤"了。

干活儿的地方就在宿舍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家不声不响地走着，到了地头，又不声不响地散开。往日，在出工路上，总有些人闲得无聊在叽叽喳喳地说话，或争论某一个问题以排遣心中的寂寞，或互相取笑以寻求苦中作乐，但今天只有沉寂了。

抬头望天，天还是深深的铅灰色，像倒扣的锅底。

低头看地，地还是那样浑浑噩噩，没有知觉。

王玉琦和郭允德，也都出来了，远远掉在队伍后面。他们想不出来也不行。他俩每人身边都紧贴着两个人，因为相距太远，看不清是挟持着还是搀扶着，只见俩人一瘸一拐地踉跄而行。

分给他俩干的活儿，就是在草堆上躺着。脸部已经肿得

变形，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身上脸上都没有纱布绷带之类。我干活的地方离他们很远，但是还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社会上红卫兵毒打阶级敌人不叫毒打而叫“采取了革命行动”，或者在“批斗”一词前加上“狠狠地”三字以别于一般批斗。三余庄的“积极分子”们鞭打“反改造分子”也从不说“打”，而是说“帮助”或“端正态度”。既然没有打，又何来的伤呢？被“帮助”的人自然没有理由上医务室包扎或在宿舍里养伤。他们只能照常出工，哪怕是躺在草堆里呢，总算是“出工”了。

城里被打伤打残的牛鬼蛇神，医院不是都“奉命”或自觉拒收，任其在死亡线上自行挣扎吗？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必须坚决批判！

不久之后又听说，就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是就业人员的一中队，也开始了类似的批斗会，毒打了一个闹翻案的摘帽右派白多明，据说打得比三余庄还厉害。这个白多明，是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美学的留学生，也是从三余庄解教、摘帽后“出去”的；而策划指挥这一场毒打的，就是在三余庄当过小队长、后来荣升为一中队副指导员的阎麻子。这两处的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先“串联”好了的？也许这是个永远的秘密了。

开“斗鬼大会”时于指导员不在三余庄，据说是外出开会去了。他回来不久，就宣布教养队大搬家，我们终于离开住了5年的三余庄，搬到原来的劳改大队、即一大队的大院子里。大院儿里原来的犯人已经全部调走，统统换成了就业人员，只有那高高的围墙和已经没有哨兵守卫的岗楼，依然每天对进进出出的就业人员显示往日的威风。

我们这批劳教右派住在大院儿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与就业中队之间砌有隔墙，真是院中有院，墙内有墙。这个小院儿，就是我们新的栖身之地。小院儿门口有值班员把守，收工时进了大院儿门再进小院儿门，门禁比以前森严多了。

搬家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就实行军管了。军管以后第一件大事，是召开逮捕大会，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队也有三名：一个是躲过了"俱乐部"毒打的黄克疆；一个是在禁闭室墙上乱涂乱写、"恶毒咒骂"红卫兵的李定一；还有一个是平时不言不语的邢劲松。这个邢劲松，1965年在小组会上，就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发言，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只是调门还没有"文革"时期那么高。他却居然发言说："自古读书要读百家之书，不能只读一家之书。"队部要他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材料，他也傻呵呵地立刻照办。召开逮捕大会之前，有人得到风声，劝他赶紧逃跑，他不但不跑，还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邢劲松被逮捕以后，被押往山西听候处理，"九大"胜利闭幕后，他又随同一大批"恶攻"要犯押回北京。这些人都是准备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的。只因为人数太多，要分批执行，还没有轮到他，就发生了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事件，枪毙一下子改成释放，他才幸免一死。这是后话。

这次没有抓郭允德。我还猜想：也许队部会本着"打了不罚"的精神放过他，可是到了1968年，当局还是按原定计划把他弄上小汽车，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该抓的抓了，不够逮捕资格的还得继续批斗，名单可以排一长串："老牌"反改造分子"曹克强；一贯坚持反对武斗的缪光谦；闹翻案说自己

在五七年就反刘少奇的原“积极分子”谢自渝……其中还有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的王玉琦。

这次斗王玉琦的起因很简单：队部给每个劳教右派，包括挨打的“反改造分子”在内，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挂黑牌而戴像章，本来是对正在服罪改造的右派以极大关怀，北京城里的右派如果知道了，一定会羡慕得要死。不过那时候像章热刚兴起，像章不大，做工也比较粗糙。王玉琦看了说：“远看像颗铜扣似的。”这句话成了不大不小的“新罪状”。按惯例批斗要联系他过去的罪行，于指导员在会上说：“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开会打了你，你就心怀不满……”

既然提到那件事，主持其事的盖中队长觉得有必要公开谈谈他的看法。他认为责任全在挨打者身上：“我们本来不想打你，但是你一定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给你捧捧场，不捧场好像不合适……”

奇怪的是，这次对他的批斗却很平和，连“喷气式”也没有用。而对其他“反改造分子”则没有那么客气。但也只是充分发挥“喷气式”的威力，并未重演“俱乐部”那一幕。据说这是因为于指导员回来“主政”了，而于指导员是反对“武斗”的云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批斗的人个个态度恶劣，公然顽抗。

曹克强一如既往，依旧坚持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虽不像以前挨斗那样高呼：“这事情竟发生在60年代！”但仍然死不低头，又一次被送进禁闭室。

缪光谦是大滑头，采取的是“小丑式”的“诙谐战术”。他一上台，“积极分子”就请他坐“喷气式”，他一面挣扎一面高

喊："这是桃园经验！这是桃园经验！""积极分子"发言，他又不间断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弄得发言者说不下去。于指导员踢了他几脚，叫他闭嘴，他又喊："过去我犯错误你不踢我，现在我喊'毛主席万岁'，你就踢我了。"弄得指导员也不好再踢，只得由他去，结果会开得一塌糊涂。

谢自渝在俱乐部打人立功以后，就以"造反派"自居，说自己在 1957 年就反对刘少奇，应该是"革命左派"。指导员说他闹翻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就说："你先前不是还表扬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他后来被关进禁闭室，又从禁闭室里提出来批斗，指导员刚说了一句："今天开会批斗反改造分子谢自渝，……"话还未说完，他就喊："大家不要听他乱说，昨天《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派人来看我，要为我翻案。""积极分子"们听了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又犯了攻击"革命造反派"的大罪，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指导员才说："来人了解确有其事，但只是了解情况，不等于为他翻案。你们继续发言，有问题我承担责任。"会才得以继续开下去，但气势大减，匆匆了事。

谢自渝后来出了禁闭室，案也没有翻成，但他仍以"劳教所里的革命左派"自居，时刻不忘表明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到"斗鬼大会"，他说："我认为郭允德出身贫农，不会反对毛主席，所以那夜晚我只打王玉琦一个人，对郭允德我没有碰他一指头。"时刻不忘表现自己的范光斗，又有他的一套，他对我说："对俱乐部那件事，我分析队部现在的态度是：不能说打错了，但也不提倡，以后也不再搞了。你以后发言如果涉及此事，要掌握这么个火候。"后来斗争其他"反改造分子"，他总

是把喷气式搞到极端程度，好给队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以此沾沾自喜，作为傲视其他"积极分子"的本钱，说别人不能像他那样做到"刺刀见红"！

"斗鬼大会"的主持人刘佛生则不同，他从不提此事。他知道队部对他的"表现"了然于心，不用像范光斗那样念念不忘。有一天，"反改造分子"章亚航悄悄儿对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是我从地上捡来的。"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我接过来一看，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一看笔迹就认得出是刘佛生写的，内容大意是："昨晚开了斗争王玉琦、郭允德的大会，大反多年来对反改造分子的姑息迁就，大反了斗争中的温情主义，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改造气焰，真是好得很！"

打手们既然是对反改造分子敢于"刺刀见红"的英雄，理当论功行赏，至少也应该将今日毒打之功，折当年右派之罪才是。可是这"赏"却姗姗来迟。绝大多数打手不论是表态型的还是残忍型的都有足够的耐心，相信队部对他们在"俱乐部"的立功表现，尽管嘴上不说，但必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极个别的人，如杨春泉（本是北京单店砖瓦厂工作人员），则耐心不足，功败垂成。他在"俱乐部"之夜也曾挥棍猛击，颇受队部赏识，后来委以"值班"重任，不出工专司门卫之责。但他觉得老不解教摘帽，未免功大赏小，似乎靠政府有点靠不住，不如脚踏两头船为是，于是又主动找一些"反改造分子"联络感情，对他们说："队部对我还比较信任，你们要搞"秘密集会"的话，可以在值班室里进行，我这里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个点。"

1969年右派队撤销人员分发之际，他的两面派被揭发出来，结果虽然从宽处理，毕竟只能解教而不给他摘帽。他也被

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不过此人生存能力极强，不但对反改造分子曹克强、王玉琦等人赞不绝口，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似的，而且在王庄10年，外逃五载，利用10元钱一大瓶的兽用性激素，配置"祖传秘方神药"，居然成为"神医"，在张北一带（当地生活困苦，男性中患性无力者颇多）专治"阳痿早泄、举而不坚"之类的性功能病，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子过得满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周盛雨，他属于纯粹的"表态型"。事后他发表高论："我打他们是很轻的，如果我不打，我站的位置就要被另一个人所占，就会打得很凶。我站在那里别人就无法靠近，实际上起了保护他们的作用。"

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为代价，既保护了挨打者，又表现了自己的"积极"，这个账应该怎么算呢？

再看看另外一方面。

蔡辉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人，后来对我说："俱乐部那晚上，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看见打人会打成这样。原来我和董立私人感情不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反感，还来问我为什么跟他疏远呢。"

张志华在工地向武三蛋借工具，武三蛋有不允之意，张志华就以此为由，突然打了武三蛋一拳，武三蛋猝不及防，连连退让，张志华穷追不舍，后来被人拉开，但武三蛋已经挨了好几拳。事后我问张志华："你从来不跟人打架，今天为何如此反常？"他说：我哪里是为工具的事，这小子在俱乐部打人是最狠的一个，下手特别毒。我打他就是为了这个，工具不过是借口。"

张志华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四年级学生，文笔在三余庄

堪称一流，许多人都说：比起杜高、从维熙等"著名作家"来，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个同班的女同学，上海人，是个大资本家的女儿，也是个右派，是按"退学自谋生路"处理的。回上海后，还时常通过"地下渠道"给他来信，估计是他的恋人。她那文笔，可比他还高一筹。后来当然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了。他本来是二小队的小队长，不知为什么忽然逃跑了，仅靠一水壶从火石厂廉价买来长短不一的"下脚料"火石，在新疆逛了大半年，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流浪到江南，终于在杭州"落网"。因其"主动认罪"，态度好加上检讨书写得好，既没有关禁闭，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只不过把他的小队长抹下去就算了。看起来，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进了劳改队，也不吃亏的。后来他写了一部逃亡新疆的回忆录，但被别人检举，终于作为"罪证"被队部没收了。落实政策以后，从维熙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他曾经有一篇小说寄来，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部回忆录的二稿，但被从维熙否定了。从此他看穿了世态炎凉，不想当作家了，只热衷于追求"财色"二字。好在他有"两手空空跑遍中国"的本事，干起贩运走私物品来，倒也能够驾轻车而就熟路。1980年，他提着一旅行包走私的手表和电子计算器，带着一个不是他老婆的女人，到北京来跑单帮，住在王长琦家里，东西却寄放在从维熙家中。结果事情败露，"赃物"被公安局搜走，连从维熙也吃了挂落(此事曾上过《北京日报》)。他说：做走私生意，哪怕十次中有九次失败，只有一次成功，也有钱可赚，何况跑十次买卖失败九次的可能性终究比较小，所以他也就乐此不疲了。他有这样好的文笔，却没走上中国文坛，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不过这也是右派中的另一种类型。人各有志嘛。

6 吴 越

# 殉情自杀者的遗书

## 6.1 有一个人的自杀，令人难忘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被中央肯定是"扩大化"了的，原因是后来复查平反的情况，552877个右派中，99%以上是错划了的。

但是这55万多名右派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等到复

查平反这一天的。其中有许多人，在平反之前就死去了。其中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饿死的，还有不少是自杀身亡的。

那年月，自杀的人相当多。我因为见得多，有些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是有一个人的自杀，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永远难忘。这个人叫敖乃松。

1962年夏天，被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大都集中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共有四百多人，在农场北头的“三余庄”新组建一个教养中队，等待安排处理。

这些右派分子们在各劳教单位劳动，经过大大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强挣扎着勉强活了下来，个个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谭天荣；有几个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就要埋葬了，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如吴弘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都已经到了‘鬼门关’前面了，可是阎罗王不肯收，只好回来继续受这受不完的罪！”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劳改农场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当时只有犯人大队、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大队和少年犯大队。把这些右派分子们送到这个没有教养队的劳改农场来继续教养，当然是一种宽大与恩惠。人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中央没有“宽松”的政策，北京市公安局是不会对右派分子们如此“错爱”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而来的“中苏关系恶化”，不但为右派分子们重返工作岗位设立了一道高墙，甚至连三年教养期满，也不宣布解除教养。于是一颗颗沸腾的心全都进了冰窖，一下子冻结起来了。

由于看不见前途和出路，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右派分子们情绪极度低落，1964年国庆节的狂欢之夜，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郑光第勇敢地从北海公园的大桥上跳了下去，开创了团河右派"自绝于人民"的先例；紧接着清华大学的学生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兔死狐悲，缺乏自杀勇气的"同类"们暗暗落泪，却不知道自己他日怎么个死法。

1966年，这些改造了近十年的右派分子们不但无望重返岗位，由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发动，极"左"思潮也在团河农场泛滥，对右派分子的监督管理从此加严，于是三余庄又发生了第二个右派厌世自杀的"消极抵抗"事件。

事情是从"抄书"引起的。

"三余庄"集中了几百名右派，是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农业单位。但是管理干警们的水平大都很低，与被教育的右派们绝不成比例。特别是右派们满嘴的"外国典故"，管理干警们连听也没听说过。开头一些日子，由于干警们都知道这些右派分子不久都将重返岗位，执行的是"管理从松"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改善生活上，一心只希望这些骨瘦如柴的"活骷髅"们尽快恢复体力，好身强力壮地从公安局大门走出去。

右派们的"业余活动"有三多：看书的多，写作的多，高谈阔论的多。右派们的行李、铺盖不大，书箱却很重，这是与别的劳改犯们截然不同的区别。每逢星期假日，"三余庄庄员"们有的手捧大部头书，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许多人看的还是原文版；有的人写诗歌、小说、论文或翻译外文著作；有的人

则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胡侃神聊，天文、地理、数学、历史无不涉及。对这些"文化活动"，管教干部们并不制止，因为既不妨碍改造，也不惹是生非，再说，干部们即便想过问，也没那水平。

一进入"文化大革命"，情况大变：首先是原来的那批管教干部因为对"阶级敌人"太仁慈而被"革命派"轰走了，换了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却又自命不凡的"铁拳头"们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铁拳头"们采取分化瓦解、"以右制右"政策，把右派们分为"积极分子"、"反改造分子"和"中间分子"三类，口号是依靠"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并打击一小撮"反改造分子"。所部署的第一个回合，就是抄检右派分子们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书，然后结合高谈阔论的内容，揪出几个典型的人来，进行批判。

这一"小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敖乃松。

## 6.2 敖乃松逐渐与我谈到了他写的那部愿为之"同归于尽"的"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有研究古汉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在写《续国家与革命》的。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

“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什么。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透露出来，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来。吴弘达就连夜把他的《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活动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开，包袱被解开、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不但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归于尽呢？

我是1962年夏季集中到团河农场的，敖乃松却是1965年才从别的劳改单位合并到三余庄来。我和他以前不认识，合并后也不在一个组，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平时沉默寡言，

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不问别事。直到他的稿子被搜，对他进行批判，我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口中得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敖乃松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开他批判会的两年以后。1968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犯统统搬迁到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去，1959年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疏散令，这些教养了十二三年的右派分子们除了少数几个“顽固派”被送到邯郸地区继续改造外，绝大部分都摘了帽子，解除教养，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就业”，我和敖乃松等20多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有幸被留在清河农场三分场，住在远离分场四五里路的“北砖窑”干一些杂活儿。这里以前是犯人烧砖的地方，如今不烧了，但习惯上仍叫“北砖窑”。

敖乃松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的时候多，很少跟人聊天儿，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办什么事情总是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买了辆旧自行车，车子从来不上锁，还当众宣布说：“我的车，谁有事儿出去只管骑，骑坏了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自己会修。”

但就是这样的老好人，也为“积极分子”们所不容。不知道他跟谁说过“我的岗位不在这里”这样的话，被人汇报到队

长那里，于是中队开批判会批判"反改造逆流"的时候，把他这个问题也捎上。不过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并不多，除了专职的中队宣传员之外，只有一个赶大车的老张头牛头不对马嘴地胡侃了几句。这个人以前给地主当长工，不识几个字，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是队部培养的打手之一，每逢开批斗会，有哪个不肯认罪的，就由他上前摁脑袋、挥拳头。批敖乃松没人发言，指导员直给他丢眼色，他无可奈何，又不到打人的火候，只好胡说八道一通。他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说："敖乃松，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告诉你，凡是犯过罪的人，都是三等公民，都是被打入另册的。三等公民只配种田，不配干别的，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清河农场，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很长时间被传为笑柄。不过敖乃松接受了批判，从此更加沉默寡言，更少与人说话了。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我有把小提琴，没事儿了就自我陶醉，加上我们两个都爱写，有这样几个"共同点"，我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通过点点滴滴的交谈，我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恩洪老先生是《中国画报》的摄影记者，共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古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

1955年，敖乃松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即将分配工作，毕业体检的时候，忽然发现患有肺结核，好在是初发，并不严重。他母亲有病长年卧床，平时靠他父亲照顾，如今他也病了，母亲既无法照顾他，更不能增加父亲的负担，商量的结果，

只好申请暂缓分配，回到常州的外婆家去休养治疗。

他外婆家在常州乡下，有一所老式的木结构房子，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住过。常州是个美丽而富庶的鱼米之乡，他外婆家的前面是一条小河，常有帆影在门前慢慢儿移过，河水清澈，游鱼可数；屋子旁边种有桃李果树，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养病的好去处。老外婆虽然年事已高，但很健康，也很勤劳，自己养得有鸡，蛋是天天有得吃的，还常常给他炖鸡汤喝，生活过得很舒服。那年月，肺结核已经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一面有雷米封、P.A.S之类的特效药，一面有老外婆的悉心照料，他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疗养生活，无非是早晚到户外去散散步，白天在家里看看书，偶然也和姨表兄妹们聊聊天儿，日子并不难打发。

在他住房的前面，是一条通往乡村小学去的路，每天早中晚，他都能够看见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从他窗前嘻嘻哈哈、跳跳蹦蹦地走过。小学生嘛，一般只有八九岁、十几岁，但是他在这群孩子中间，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明显地要比别的孩子高出一个头，真有点儿"鹤立鸡群"的样子。说她是小学生，年龄似乎偏大了点儿，说她是老师，年龄似乎又太小，何况她与同伴们走在一起，从神态言语中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样子来。她嗓门儿大，嗓音儿甜，远远地看去，长得还相当美。由于情况特殊，故乃松不免多注意她一些，时间一长，他不用看，单听声音，就可以判断这个姑娘是不是在这群孩子中间。

有一次他正在凝神望着这个姑娘，外婆正好进房来，他就问外婆：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和这群拖鼻涕的娃娃在一起上学

呢？外婆告诉他说：这个姑娘叫蕾蕾，今年16岁了，算起来，跟敖家也带点儿亲，可以算是乃松的表妹。因为家里穷，加上她母亲有病，家里要靠她这个"长女"支撑，只好让她弟弟一个人上学，这样一耽误，就耽误了好几年。如今家境好转，母亲的病也好了，这才开始上初小，结果姐姐比弟弟的班级低，功课还赶不上。她父亲听说乃松回来养病，正想求他帮助辅导蕾蕾的功课呢。乃松一听是这样，笑着让外婆把蕾蕾领来，他要看看这个小姑娘是否值得造就。

第二天，外婆果然把蕾蕾领来了。她见了乃松，像小学生初见老师那样，两脚跟站得齐齐的，先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然后怯生生地说："敖老师，我很笨的，您当我的老师，可别生我的气呀！"

敖乃松笑笑说："别叫我敖老师了，我不是你的表兄吗？你就叫我海龙哥吧！"海龙是敖乃松的小名儿，当地人都这样叫他，极少有人叫他敖乃松的。

这次面对面近距离观察，他发现蕾蕾是个极美、极可爱的姑娘。她纯真、甜美、善良、聪明、懂事，具有农家姑娘全部的优点而没有乡下姑娘任何一种粗俗的言语神态。她浓眉大眉，面如桃花，五官端正而秀丽，一笑两个酒窝儿，两条大辫子又粗又黑。尽管她见了生人非常腼腆，问一句答一声，一说话脸就红，低着头坐在那里，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但仍掩盖不了她那一副美在天然的丽质，而且透着很聪明，绝不是低能儿。

这样可爱的姑娘，敖乃松当然很愿意辅导她，当时就答应了，还定好了每天什么时候来，都辅导哪些功课。外婆笑着

说:“小龙啊,你能帮她把功课赶上去,你就功德无量啦！不过你也得注意不要累着了自己哟!”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蕾蕾就成了他的学生,天天要到他这里来补习功课。

聪明的蕾蕾,从外婆的一句“不要累着了自己”,就猜到了乃松有病。或者也可能是从她父亲那里听说乃松是回家来养病的。总之是稍许熟悉一些以后,蕾蕾忽然问起乃松得的是什么病,乃松当然不会瞒她,就说自己患的是肺结核。一个乡下姑娘,哪儿知道什么叫肺结核？等到乃松给她解释明白了,她睁大了眼睛,惊讶而惶恐:“这不就是痨病吗?”她也许听说过,得了痨病,是要死人的。等到乃松给她解释清楚:痨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已经有了特效药,不会死人,她又高兴得跳了起来,纯真可爱的言语神态,溢于言表。从此,她常常给乃松带鸡蛋和新鲜蔬菜来。乃松知道她家境不好,靠积攒几个鸡蛋卖了给弟弟交学费,婉言地谢绝了。于是她就让弟弟下河去摸鱼,做好了,送来给乃松补养身体。

一个大学毕业生,辅导一个初小学生,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蕾蕾的功课,很快就赶上了同班的同学。这里面,当然也有蕾蕾自己的努力。乃松布置给她的作业,她都按时完成,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而且成绩不错。他下决心要开发她的智力,利用她的聪明和过人的理解力,把失去的时间都找回来,让她在短时间内达到与她同年龄的姑娘应该具有的知识水平。

过了半年,蕾蕾的功课和知识大有长进。这期间,她不但跟海龙哥学了语文和算术,唱歌和画画儿,还从他那里借读了

大量的小说。但是她那善良的心地,怎么也不能理解什么叫邪恶。她不理解日本人作为一个邻居,为什么要出兵来攻打中国,而且对中国人这样狠毒;她不理解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为什么要妒忌她嫁给王子。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人,都像她父母那样勤劳,都像海龙哥那样多才,都像老外婆那样善良。特别是她的海龙哥,尽管有点儿金鱼眼,不是标准的美男子,但他学识渊博,简直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是她所见过的人中最有学问的。她恨不得从海龙哥那里学会所有这一切,她也知道海龙哥会教她她想学的一切。

又过了半年,她读小说入了迷,乃松手头再也没有书可以借给她读,不得不经常为她进城去买书。一天,蕾蕾看完了《简·爱》,很动情地对乃松说:"我真佩服简·爱,她敢于去爱罗切斯特。"乃松说:"也应该佩服罗切斯特,他敢于接受简·爱的爱。"蕾蕾反问他:"如果你是罗切斯特,你会接受简·爱的爱吗?"乃松说:"我当然会的。如果你是简·爱,你有这样的勇气去爱罗切斯特吗?"蕾蕾没有答复,却扑进了乃松的怀里,用热吻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年的时间,蕾蕾的知识长进了,青春焕发了,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儿萌发了,成熟了。

乃松把他与蕾蕾相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本来就很喜欢蕾蕾,当然表示全力支持。外婆去与蕾蕾的父母提亲,他们受宠若惊,当然是求之不得,一口答应。得到了双方家长的点头,他们就把事情半公开化。下一步,只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就可以把事情合法化了。

1957年初,乃松的肺结核终于痊愈,决定返回北京,一方

面去接受分配工作，一方面也为了争取婚姻的合法化。

离开常州的头一天晚上，蕾蕾在乃松的房间里坐着话别，两人相依相偎，又哭又笑，难分难舍，说不完的山盟海誓，诉不尽的离情别绪。蕾蕾紧紧地抱着她的海龙哥，在他的耳边低低地倾诉。她说她能够得到像他这样一位好丈夫，真是她的福气，她感到自己非常非常的幸福。可她又预感到这种幸福好像是一场梦，一旦她从梦中醒来，一切都是空的。她说她预感到今天的分离将是他们的永久诀别。乃松当然不信这个，他说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不会反对他们的婚姻，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幸福的生活，灿烂的前途。

这一夜，两人谁也没睡，整整说了一夜的情话，把各自心中沸腾的热血都喷发出来了。天亮以后，蕾蕾送乃松上路，她拿出一个亲手做的、绣有"海龙"二字的布书包，里面装着卤鸡蛋和烙饼，还有一个姑娘火热而赤诚的心……

敖乃松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如实地汇报自己这一年多来与蕾蕾相爱的经过。母亲是看着蕾蕾长大的，知道她美丽、善良而且勤劳，打她小时候就很喜欢她，既然儿子自己选择了她，并没有什么意见。父亲则认为蕾蕾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双方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要儿子认真考虑。乃松说：文化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何况蕾蕾这样年轻，接受知识的能力极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母亲又担心结婚以后户口迁不来。乃松说：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如果政府居然不允许合法夫妻在一起居住，还叫什么人民政府？再说，如果户口实在迁不来，他愿意到常州去工作，哪怕当一个乡村教师。父亲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

也就不再反对。当天晚上,乃松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和极为轻松愉快的笔调给蕾蕾写信,告诉她父母这一关已经顺利通过,他们的婚事,至少在家庭中已经合法化,也可以说是已经正式订婚了,最后就等她年满18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了。

接着乃松又办了两件可心的事情。第一件是到派出所去询问:妻子家在常州农村,是不是允许把户口迁来北京。户籍警的答复是:只要有结婚证和单位证明,国家允许女方把户口迁来。第二件是与学校取得联系,由学校出面,把他的工作落实在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设在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内,房屋都是清代的古建筑,地方宽敞,环境清幽,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故乃松肺病痊愈,工作满意,妻子可心,真是三喜临门,踌躇满志,一身轻松。他上班伊始,任务不重,工作不忙,就坐在办公室里一封接着一封给蕾蕾写信,讲他的春风得意,讲他的心情愉快,讲首图的工作环境,讲他们今后共同生活的计划,日子将会过得比蜜还甜。蕾蕾尽管还是第一次写情书,但是出于她纯真的爱,信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她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如何为丈夫调理饮食起居,如何抽时间继续努力学习,以便得到工作的机会,她甚至连10年8年之内暂时不要孩子的事情都考虑到了。

如果没有突然发生的18级地震,他们的婚姻肯定将是美满的,生活肯定将是幸福的,前途也肯定将是光明灿烂的。

但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18级地震,终于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地发生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地动山摇,天翻地覆,55万知识分子惨遭灭顶之灾——别忘记,那一

年正是历史上难忘的1957，敖乃松还是个刚出校门上班才几个月的小青年，但是出于他的赤诚和对党的忠心，就自己的所见所想给领导人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划为右派，等待处理。

敖乃松先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接着一声霹雳，风云骤变，又从半天云雾中一个跟头折进了十八层地狱。大起大落的突然变化，使他从温柔乡、黄粱梦中清醒了过来，尽管他平时并不太注意政治，却也知道政治的可怕，知道自己一卷进这个政治漩涡中，将永远得不到解脱，再也没有自己的前途了。卧病在床的老母，有父亲和弟弟们照顾，天真无邪的蕾蕾，年纪太轻，经历太嫩，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人生旅途的坎坷艰难。自己如果一帆风顺，是不难与她同舟远航的，如今自己不幸落水，惨遭灭顶，说什么也不能把她拉下水来，与自己同归于尽的。痛定思痛之后，他洋洋洒洒、恳恳切切地给蕾蕾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从此将没有前途，今后连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得而知。因此，他不能连累她，不能害她一辈子，不能让她这朵还没有开放的花蕾在风暴中折断，千句话并作一句话，那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今生今世，尽管海龙哥还像以前那样深爱着她，但是交情只能到此为止，今后海龙哥只能做她的海龙哥，再也不能做她的丈夫了。他鼓励她继续努力学习，求得一个适合于她的工作，然后另找一个适合的对象……

但是这样的信，对一个只有17岁半的农家姑娘来说，是多么难于理解呀！首先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右派”，更不懂得什么叫“前途”，她只知道自己要把一切都献给世界上最

好的人海龙哥，可海龙哥现在却不要她了，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可他一回到北京，有了工作，就看不上她这个年龄幼小、知识浅薄又是农村户口的乡下姑娘。离别之夜她所最担心的那件事情，果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她哭着给海龙哥写了一封情绵绵意切切的信，谴责他的变心，又盼望他不要变心。即便今后真有什么苦要受，她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保证永不变心，永不后悔。

接到这样的信，敖乃松真是啼笑皆非。他的小爱神确实太幼稚了点儿，不能责怪她对自己的不理解。他再给她写了一封信，尽一切可能解释什么叫右派：用当时的话来说，右派就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尽管蕾蕾生长在农村，也还是知道的，懂得的，接着又解释什么叫没前途，简单地说，没前途就是不能再在首都图书馆工作，今后很可能要到农村或者工厂去从事体力劳动了。因此，他不能连累一个纯洁得像透明的水晶玻璃似的姑娘与他一起受罪，一起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以致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这封信发出，很快就得到了蕾蕾的回信，她说：只要海龙哥不是找借口要抛弃她，她不怕当反革命家属。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农村，不能在一起生活。既然没有前途就是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那她欢迎海龙哥回农村去，两个人一起种地，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她们村子里就有受管制的反革命，只要老老实实，不为非作歹，一样下地种田，一样出门拜年，村里人也不特别歧视他们。为了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北京来，上车之前再给他打电报。

刚看完信，电报接着就到。敖乃松倒真佩服这个姑娘办

事的痛快。看样子,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得到海龙哥,是死也不肯回头的了。

当天下午乃松到前门火车站把蕾蕾接了回来。见到了小别三月的爱人,蕾蕾先是笑,后是哭。不管乃松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只要海龙哥不变心,她永远跟着他,哪怕讨饭或者当囚犯。为了表示她的心迹,她要求立刻就结婚,又说:只要两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吃粥也香。

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决,一家人都很感动。但是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女方也要年满18周岁,才能登记结婚,她只有17岁半,又没带村里的介绍信,这婚怎么个结法?更何况敖乃松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在是等待处理阶段,究竟怎么个处理法,谁也不知道。按最好的估计,是下放劳动,去种田或者做工,按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向单位提出来要结婚,即便女方年龄合格,也不合时宜呀,何况女方还不满18岁?

既然女方态度如此坚决,在特殊情况下,老太太做出了特殊的决定:年龄不够,干脆不登记,先把婚事办了再说,连单位也不通知。一家人藏起了烦恼,强颜欢笑,急忙买菜打酒,举办婚宴,来一个苦中作乐。此情此景,真正应了"黄连疙瘩当萧吹"这句古话了。

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国画报》社工作,住在阜城门外二里沟文化部宿舍三楼。那是一座老式的住宅楼,楼梯在墙外,那所房子现在早已经拆除了。不过敖家住的是一套三居室,在住房普遍狭窄的当年说来,面积还算是大的。三间房间,老俩口儿住一间中不溜儿的,四个儿子合住一间最大的,小保姆住

一间最小的。既然是娶媳妇儿，哪怕十分仓促，非常草率，也不能让新娘子在客厅打地铺吧？于是老太太与小保姆商量，请小保姆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将就几夜，她的小房间，让给乃松作新房。

敖乃松以"待罪之身"在家里等待"处理"，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其实并没有几天。当时他们所做的最坏打算，无非是送劳动教养。而根据当年8月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过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时间也不会太长，只要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好一些，就会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单位工作。所以当时他们两人对于处分的恐惧感倒并不十分强烈，令他们伤心断肠的，正是那如胶似漆的燕尔新婚，难分难舍！

几天之后，这一谁也不希望它到来的场面，终于到来了。一辆小吉普，开到宿舍楼前面停下，下来两个警察，叫开了敖家的房门，取出一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要敖乃松签字。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全家人都没有慌乱。敖乃松镇定自若地签了字，与父母、妻子、弟弟们告了别，拎起家里早就给他准备下的铺盖行李和洗漱用具，在警察的押送之下缓步走出了家门。这样的场面，尽管颇有几分"风萧萧兮"的悲壮感，但在当时说来，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敖乃松跟家里有话在先，一旦出现预料中的事件，全家人第一是要镇静，千万不要慌乱，不要号哭；第二是谁也不要送行，只当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上班一样。今天事情既然"不幸而言中"，家里所有的人也都能够克制自己。与蕾蕾道别的时候，尽管她眼

眶中充溢着热泪，但是紧咬着嘴唇，没有发作，表现得十分坚强。她似乎想扑过来与丈夫拥抱一下，但是一只手被老母亲死死抓住，只能用泪眼目送着丈夫转身出门而去。

当敖乃松走出家门，走下了一层楼梯，刚走到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龙哥，你要保重啊！"

敖乃松一抬头，只见蕾蕾就站在三层楼梯的转角处，披散着头发，泪流满面，分明是为了挣脱母亲的控制反抗过一阵子的。这一眼，是敖乃松有生之年看蕾蕾的最后一眼。他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此情此景，就是钢铁汉子、石头心肠，也难免要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的。他知道，这时候只要他也喊她一声，甚至只要稍一迟疑，蕾蕾肯定会冲下来。为了避免出现令人看笑话的一幕，敖乃松用最大的自制力克制了自己，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仅仅一眼，就狠起心肠，提起铺盖卷儿来，加快步伐走下楼梯，唯恐来不及似地钻进了小吉普。

直到车子开动，他都没有再看蕾蕾一眼。他怕看到意外的情景，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

1966年在三余庄被队部抄走的"反动小说"，写的就是这一段"情史"。作为一部小说，当然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不像我说的这样粗疏而笨拙。至于教养以后的故事，可能还来不及写，或者说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写，稿子就遭到了浩劫，被作为"罪证"装进他的档案袋中去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的。敖

乃松也和所有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是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劳动教养所里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员们睡的是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整整齐齐，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却穿着拖鞋出工，到了工地也是懒洋洋的，一副待干不干的样子，比起50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50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蕾蕾恪守自己的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去。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1957年深秋到1962年的初夏，时间一晃过去了5年，改造了四五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好”，因为事实上连

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1962年5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宣布了教养期：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三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从1962年5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四五年的劳动，不容易呀，说不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还讲法律吗？可是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朕即法律"，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有意见没意见，执行单位坚决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敖乃松罪大恶极，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1956年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村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成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了"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早一刀两段，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有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嘶"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认定了已经嫁给了海龙哥。到了1964年，蕾蕾已经25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中早就已经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龙哥就要回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只有家在农村的，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

己身在农村，不然，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1964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打成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轻人。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25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筋。他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的人。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决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面直接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抗；但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大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同情她，反而说她鬼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命劳改犯！

自从1962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允松合并到团河来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柱从常州回来，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是想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哥一听这个消

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能理解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唯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安局还不放他们,他万念俱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64年到1966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间,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用血与泪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的东西被“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那时候,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想活了。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又一次崩溃了。倒是被批判以后,他来了倔劲儿:你不是不让我写么?我偏要写,转入地下,更秘密地写!困难增加了,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儿地写,一点一滴地写,写得更加认真、更加投入,也更加精彩、更加有水平了。

前面说过,1968年我们从团河农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到了1969年,我们这批教养了十二三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除了十几个“死硬分子”之外,大都摘去右派帽子,解除教养了。我和敖乃松等20多个人被分配到“北砖窑”打杂,管理上比教养期间松得多。北砖窑以前烧砖,曾经住过好几百号人,如今只住几十个人,空房子比较多,敖乃松就自己开了一间空房子,一个人住了进去,队长知道了,也没有坚决制止。

他这个人什么苦都能吃，大冬天的屋里没有火，他也能够忍受。我知道，他之所以要忍受寒冷躲开大家，除了性情孤僻，图个清静之处，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关起房门来，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写他的这部“绝唱”！

两年之后，这部另起炉灶的“绝唱”终于又写成了。这时候我已经成了他的好朋友，他的稿子，几乎是他写出一章来就给我看一章的。不过这部“新版小说”依旧只写到敖乃松被送劳动教养为止，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还没有继续写下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感情上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他总觉得，对于像蕾蕾这样纯真的女孩子，给她这样一个结局，太不公平了。如果照实写来，简直是对蕾蕾的一种亵渎。因为她终究是又哭又喊，反抗过一阵子的。但她终究又是个弱者，在强大的“无产阶级”面前，她无力反抗，反抗了也没用。“别人已经损害她了，作为最最爱她的人，我怎么忍心再损害她呢？”敖乃松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这样对我说。

“你怎么就不写她死了呢？”我脱口而出。

“对呀！她的结局，即便后来没死，其实也跟死了差不多。你真聪明，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从此，他又奋笔疾书起来。不过所写小说却再也没给我看过。也许是他觉得这种空穴来风的东西不值得给我看，也许是他觉得把蕾蕾往死里写也是一种痛苦，总之是他再也没给我看，就算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吧。

## 6.3 前途渺茫，消极厌世，终于导致他下决心告别这个世界

日子难过也得过，好不容易挨到了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6年，如果从1957年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政府对于这批被关押改造了15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依旧没有一点儿“放”出去的消息。

党员开除党籍，不再是党员，而右派摘除帽子，却依旧是右派，依旧是专政的对象，而且经过“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们居然成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偷儿流氓的专政对象，没去过劳改农场的人，是无法理解这里面的“逻辑”的。

许多在戴着帽子劳改期间表现得颇为积极的右派分子们，一旦摘了帽子，强制留场就业，等于改判“无期徒刑”，根本看不见出路，于是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种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逆境搏斗，积极争取；一种人则屈服于环境，走消极甚至沉沦的道路，毁灭自己。

积极争取的人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来硬的，与环境抗争，走逃亡的路，或偷越国境线，到海外去，试图彻底摆脱困境，或逃亡到新疆、内蒙，做个自由的流浪汉，过一天算一天。

有个原外贸部的英语翻译，香港有亲戚，就与老婆离婚，解决了财产和子女问题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结果在国境线上被边防军开枪打断了腿，抓了回来，后来被枪毙了。还有个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老婆是西藏的贵族,已经逃到印度去,他正在联络几个人打算逃到苏联去,案发被捕,也被枪毙了。有个北大新闻系的学生,逃到新疆去,靠卖火石维持生活,几年以后,才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拘留,最后押送回劳改农场来。好在此人善于写检讨,倒没有受到太重的处分。

另一种人是来软的,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可奈何中,只想尽到做一个人的责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后人留下点儿什么,也以此来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出路。

有一个《光明日报》的专刊编辑,利用一切点点滴滴的时间,在偷偷地写一部长篇小说,工地的休息时间,坐在树荫下写;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工具房里写,只愿像《红楼梦》一样,死后30年能有出版机会,即于愿已足(上帝没有辜负这个苦心人,1984年,他的小说终于出版了,共五卷150万字)。当然,这一类人中,能够始终如一地完成使命的人并不多,能够真正做出成绩的就更少了。

至于消极者,则因为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因人而异,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里面,又可以分为若干种。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种人,变成了"酒鬼"。

有一个右派分子,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的科员级干部,初到劳改队的时候,西装革履,谈吐儒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然是一介书生,劳动倒也相当卖力,确实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决心。但是10年之后,右派帽子摘了,他也确实"脱胎换骨"了,甚至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了:他失去了家庭,对一

切都不感兴趣，唯独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绝不酗酒，每次只喝一小杯，大约一两左右。但却每餐必喝，三餐都离不开酒。当时最便宜的二锅头酒也要1块7毛钱一瓶，他三天喝一瓶，每月喝10瓶，总价就要17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但他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只有27元，17元用于喝酒，吃饭、抽烟、买日用品等等就只有10块钱了。这当然是不够的。他一不会偷，二不会骗，父母已经故去，老婆已经离婚，除了随带服装，更是身无长物。于是，他的料子裤子呢大衣，就一件件地变卖出去或直接用来交换二锅头。劳改农场周围的村子中，有许多人家是兼做这种"贸易"发了小财的。

到了70年代，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千"窗"百孔，只怕连白送给人家也没人要的了。饮食则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但是一日三杯的嗜好绝对不变。早饭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半块臭豆腐，也要喝一杯。

过了国庆，天气冷下来，待收割的稻田里已经有了薄冰，可他还穿着带窟窿的单衣。二锅头也断档好几天了。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铺位上"天天读"，突然刮起了北风，天气更冷了。他捅捅我说："你能借给我五块钱么？我想买件棉背心。今天的风特别大，要是没有棉袄，我只能躲在房间里，出不了工了。"我说："只要你真买棉背心，我给你五块钱，不要你还。不过你可别拿上钱又去买酒哇！"他当即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我要是拿这钱买酒，我是你的儿子！"

下了"天天读"，他拿着我给他的5块钱快步跑到供应站，不一会儿工夫，就一手提着一瓶二锅头跑回来了。我一看气儿不打一处来，责问他为什么不买棉背心，他却笑嘻嘻地向我

解释："我买的这叫'内棉袄'，是穿在肚子里面的。只要穿上这种'内棉袄'，我就不冷了，就可以出工了……"

他终于扛不过冻饿的威胁，没等到落实政策，就死在清河农场了。

第二种人，是变成了"色鬼"。

我这样说，也许太过份了一些。因为孔老夫子也说过"食色性也"这样的话，一个正常的人，有食欲与性欲应该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劳改农场一关就是十几二十多年，使得许多青年步入了中年却还婚姻无着。正常的婚姻没门儿，那就不得不走歪门邪道了。

劳改农场女性极少，只有少数就业人员从外地贫困农村带来的妇女，按政策可以把户口落在农场，当一个"合同工"，每月挣三十多元工资。两口子一月60多元钱，勉强还能维持下去，一旦有了孩子，这点儿钱当然是不够的。因此有少数家属出于"挣钱贴补家用"的目的，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相好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甚至连丈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清河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却把他们的老婆都留在清河农场，于是另一部分家属出于"难耐空房寂寞"而招"野汉子"，或曰禁不起"狂蜂浪蝶"的引诱而"失身"的，也大有人在。

有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某研究院工程师，"就业"后一个月只挣27块钱，但几乎每月都要送十块钱给家属，以换取偷偷摸摸的"春风两度"，还自圆其说地声称："我这是可怜她的那两个孩子！"

除此之外，还有变成小偷儿的，也有变成诈骗犯的。总之，是在“看不见出路”的情况下，每个人潜意识中的脆弱部分，就逐渐抬头了。

消极情绪到了顶点，必然变成悲观厌世，最后走上了“自戕”的绝路。

在劳改农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自杀的人多了去了。那年月，由于自杀的人太多，身在清河农场的人，都有点儿见怪不怪了。

敖乃松爱好音乐，会作曲。1972 年年底，他拿来一首新谱的歌曲给我看。曲名《蝶恋花》，本是一首宋词，是写一个妓女在自杀之前的心态的，词曰：

不是爱风流，
是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是东君（本指东风）主。

去也终需去，
住也如何住
待到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去。

曲子谱得哀怨而凄凉，分明是敖乃松他自己心情的写照，说明他早就已经有了“归去”的想法。可惜当时我只注意曲调的优美，一口气就把它唱会了，却没去注意他的言语神态。因

为当时清河农场悲观厌世的人很多，自杀成风，这种客观环境，也对他起了“加速剂”的作用。没过几个月，由于环境的又一次改变，终于导致他下了决心与世界再见了。

他自称是“以身殉情”。

1973年的3月，有确实的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在北砖窑的这20多个人，都要合并到六分场西村去。

六分场西村，是个有名的“严管村”，因为“文革”中期那里办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个叫郭斗的队长，以善于使用各种酷刑整人而出名。现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计划从各分场调人去组建就业中队。既然有这样一个“酷吏”在那里当队长，依旧是专政对象的“二劳改”们日子还能好过得了？因此闹得人心惶惶，都生怕这消息是真的。

那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去替班喂马，住在马号旁边一间有火的房间里。在劳改农场，能够一个人住一间带火的房子，那可是不得了的“特权”。

3月27日，农历是2月23日，虽然已经开春，但是天气还很冷。河里的冰白天化开了，到了夜里气温一降低，早上又会结上一层薄冰。那天晚上，我正在炉子上煮料豆吃，敖乃松突然提着一个大塑料包找我来了。他从塑料包里拿出一大扎粉丝、一包黄花菜、半瓶酱油和一小包味精，说是天气冷，要在我这里煮点儿宵夜打个“牙祭”。有粉丝吃，当然比我这盐水煮料豆强。我当即洗干净脸盆，烧开了一盆水，把他拿来的粉丝和黄花菜全都煮上，满满的一盆，足够五个人吃的。煮熟以后，加上酱油味精，我又添上点儿猪油和五香面儿，两个人就围着炉子坐了下来，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粉丝，一面瞎聊调到六

分场去的消息。据敖乃松说，六分场的房子已经撤空，调人过去也就是这几天内的事情了。反正这是近来我们的老话题，我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那年月，我们的肚子都很亏，吃什么都很香，食量也很大。但那一夜晚敖乃松却吃得并不多，至少没我吃得多。吃饱了肚子，时间已经很晚，他站起来告辞要走，忽然又从塑料包里取出一本《龙江颂》的总谱来递给我说："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这是一本精印的五线谱总谱，厚厚的，定价很贵，几乎相当于我们就业人员半个月的工资，平时他爱护备至，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轻易不让别人摸一下。我虽然也爱好音乐，有一架破小提琴，但却并不喜欢京剧，特别不喜欢《龙江颂》中的那个江水英，连个家都没有，单身一人，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日子的。今天他突然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送来给我，而且明说是"留个纪念"，这是什么意思？我突然醒悟过来，冷丁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

没想到他却并不掩饰，只是淡淡地说："我想结束，留着它没用了。"

我愕然，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劝他说："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吧。他们不承认咱们，咱们可要承认自己。不瞒你说，面对这样的现实，活不如死，我也想到过要自我了断，可是想到上有老母，下有幼女，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他惨笑了一声："我和你不一样。我的老母已经故去，妻子已经被别人所霸占，老父有弟弟照顾，我想伺候也伺候不着。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可顾虑

的，我可以放心走了。”说完这一句，他似乎不想跟我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拉开房门管自走了。

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夜，我怎么还睡得着？我在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他不想活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去队部报告么？不能。报告的结果，无非是派人把他看起来，防止他自杀。而一个决心要死的人，是谁也看不住的。本来我是他可信任的朋友，这样一来，连我这个朋友最终也失去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更大的痛苦。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另几个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劝阻他呢？再想想，还是不行。他能够把他要死的打算告诉我，说明我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他相信我不会去报告，所以才把这意思透露给我。如果我去告诉了别人，别人难保不去队部报告，这样一来，结果反而会更糟。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一整夜，最后做出的决定居然是：谁也不告诉，就当我不知道。既然他决心去死，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去死是他最好的归宿，那就让他去走自己认为最应该走的路吧。

第二天一早，队部果然通知大家打铺盖，还开来一辆拖拉机作为运输工具。我刚把东西整理好交代完，见敖乃松用他自己的那辆自行车先后三次驮了一个铺盖卷儿和两箱子书，装上了拖拉机，招呼大家帮着照顾一下，他说他不坐拖拉机了，他有自行车，可以自己骑车到六分场西村去。

这话是合情合理的，谁也没有起怀疑，就连我这个知道他想死的人，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永久告别。

出发前点名，队长见没有敖乃松，问大家他到哪里去了，大家同声回答：“他的东西在这里，他自己骑车先走了。”

但是等我们到达六分场西村，还不见他的影子。搬家之前，顺路去买点儿东西或看看朋友，也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仍没有怀疑。等到天色断黑，还不见他的踪影，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好，但我不能声张，只能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我和许多人都出去找他，几乎找遍了各分场他所认识的朋友，都说没看见过他。第三天，我们返回北砖窑寻找，果然一找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有个叫李衍德的，是个很忠厚的苏州人，他被指定留在北砖窑喂马，我们返回北砖窑，第一个就先去找他。据他说："大家都搬走以后，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敖乃松又回来过一趟，车把上的书包里装着许多东西，看样子是酒。他交给我一个纸包，要我转给刘德明。又问我要一块塑料布，我把我的塑料床单给他了。"

刘德明不是右派，而是"内矛"，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这个人是个小偷儿，好朋友的东西都偷，连敖乃松的东西也不例外，但却很讲"义气"，朋友们托他办点儿什么事情，只要跟"钱"字不沾边儿，他舍命也要办到。敖乃松利用他的"内矛"身份和讲义气的性格，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跟他成了好朋友，目的是把写的稿子都藏在他那里，以防稿子第二次被抄。我要李衍德把那个纸包给我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来了。纸包没有密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他写的小说手稿，有一寸多厚。这时候，我当然没工夫看稿子，随手一翻，这几章写的是蕾蕾的死，都是我没看见过的。也就是说，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刘德明本来就是他的手稿的"窝主"，在调往六分场之前，为避免郭斗之类的"无产阶级

铁拳头"找碴儿生事,赶紧把手稿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不见得就是想死。

我们再问李衍德:敖乃松离开他这里,往那个方向走了?李衍德用手向养鱼池一指,我的心立刻就凉了。

北砖窑葡萄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养鱼池,据说那是以前砖窑烧砖的取土坑,最深处有6米。这时候葡萄还没有出土,荒凉的野外,很少有人会到那里去的。敖乃松一个人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急忙跑到养鱼池去寻找线索。只见在养鱼池岸边的杨柳树上,靠着他的那辆自行车。车子的后货架上,夹着一张包装纸,上面用钢笔潦潦草草地写着:

朋友们:

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因为失恋而自杀的,与政治无关,更与这次调往六分场无关。我选择这样的时间离开你们,真不是时候。湖水太冷了,要你们下水来捞我,我实在不忍心。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为我收尸的时候,只要拉一下这棵杨柳树上的绳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过眼下冻土还没有开化,挖坑要打镐,很累的。我向为我挖坟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特地为你们买了两瓶二锅头,算是我对你们的慰劳吧。另外还有一瓶,是给替我换衣服的朋友准备的。大冷天的帮我换湿衣服,我知道那滋味儿也很不好受。按理说,我应该多给你们买几瓶酒的,但是我的力量达不到了。我这辆破车,留给大刘,作为纪念。我的铺盖卷儿里,有一件棉大衣,留给老张,他要赶大车,棉袄已经很旧,一定用得着的。毛衣、毛裤之

类,还有几双鞋,给谁都可以。那两箱子书,最好通知我家里运回去。尽管都不怎么值钱,可要买却难了。最后,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们,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极乐世界。

别了,朋友们,一切恩恩怨怨,都没有了,都了结了。

敖乃松

1973.3.28. 下午

遗书中提到的大刘就是我;提到的老张,就是曾经以“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农场”的论点批判过敖乃松的大车把式老张头。他听说敖乃松临死之前还想到他的棉袄破旧,留给他一件棉大衣,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车子旁边的杨柳树下,铺着一块塑料床单,上面放着三瓶没开封的二锅头和一个空葡萄酒瓶——他的酒量不大,能一次喝干一瓶葡萄酒,已经是拿出“赴死”的勇气来了——此外还有些吃剩下的糕点、奶糖,一块手绢儿里,包着钢笔、手表和一些零钱,估计是赴水之前从兜儿里掏出来的。

杨柳树的主干上,拴着一根全新的麻绳,不很粗,却很长,另一头在养鱼池里。用不着说,那一头拴着的,就是他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拉那根绳子,很快就把他拉了上来。他穿着黑棉袄,鞋袜整齐,面色如生,两手蜷缩在胸前,似乎在向大家拱手作揖。在他的腰间,拴着他那个绣有“海龙”二字的布书包,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烙饼和鸡蛋,而是五六块半截儿砖。那是他为了加速身子的下沉特地给自己增加的份量。

善良的敖乃松,与世无争的敖乃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敖

乃松,失去了生活乐趣的敖乃松,他就这样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窝着一肚子冤屈走了。

## 6.4 队部按惯例果然召开了一次批判大会,批判敖乃松"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但应者了了

北砖窑有个怪人叫马文才,他不是戏曲舞台上强娶祝英台的那个阔少,而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他的体力和文化来说,他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能看个堆儿打个杂,一个月挣27块钱。别看他的工资最低,却是全中队最最富有的人。那时候,我们身边谁也拿不出三五十块钱来,但他手头却随时都有两三百块钱。不过要向他借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活脱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谁要向他借钱,先得拿东西抵押,借十块先扣两块钱利息,到期不还,抵押品就没收,他还有本事把没收的抵押品卖出去,价格绝不会低于他借出去的。任何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向他借高利贷。敖乃松的尸体捞出,看守的任务就落到了马文才身上。据他自己说:3月28日中午,敖乃松去找过他、要把自行车卖给他。敖乃松要价35元,马文才说这车很旧了,连挡泥板都没有(清河农场的土路,一下雨粘极了,无挡泥板的车根本没法儿骑),只肯给20;或者拿车子作抵押,借他16元,一个月后拿20块钱来取。敖乃松摇摇头,没有答应。

看起来,敖乃松在临死之前,确实想给朋友们多买两瓶酒,可是以20元的低价把车子卖给这个夏洛克又实在不甘

心，最后才决定把车子留给我。

对于这个“大好人”这样悲惨地死去，人人都很痛心。湿衣服换下来了，坟坑也挖出来了，挖得很深。但是尸体一直停放在水泵房里让马文才看着，没有下葬。有人说是要开现场批判会，有人说是要等家属来看过以后才入土。

4月2日，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来了。看过哥哥，整理了遗物，也与我们见了面，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敖乃柱也是右派，不过他没有被送劳动教养，而是下放在东北监督劳动，比他哥哥早些摘除帽子，而且允许回家自谋出路。据他说，4月1日那天，他老父因为心脏病复发，正在床上躺着，忽然来一警察，推门就进，进门就嚷：“谁是敖恩洪？”敖乃柱急忙迎上前去说：“我爸爸病了，有事您跟我说。”可是那警察不理他，径自上前把老人推醒，然后大声宣布：“你的儿子死了，自杀的，他要与人民为敌到底，这都是你平时缺乏教育的结果……”老父一听，当时就晕了过去。

敖乃柱看了哥哥的遗书，除了把两箱子书运回北京之外，根据哥哥的遗愿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我知道敖乃柱经济也很困难，就拿出我的全部积蓄20块钱，又向朋友们借了15块钱，凑足35元交给他，算是我买下了敖乃松的那辆自行车。

敖乃松入葬以后，敖乃柱就回到了北京。第二天，队部果然按例召开了一次中队批判会，批判敖乃松“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但是这一次批判会，除了队部豢养的专职宣传员不得不写篇稿子读一读之外，全中队没一个人主动发言的，连最善于胡侃的老张头也默不作声，弄得指导员下不来台，大发一通雷霆，才草草收场。

我曾经找刘德明把敖乃松最后的“绝唱”要过来读了一遍，内容写的是敖乃松解除教养，回到常州与蕾蕾团聚，但是蕾蕾不幸得了重病，敖乃松衣不解带地尽心伺候她好几个月，可惜已经病人膏肓，药石罔效。最后蕾蕾大口吐血，死在敖乃松的怀抱之中。敖乃松埋葬了爱妻，一个人流浪到秦皇岛，终于跳进了茫茫的大海。

文章写得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但是杜撰的故事，与历史背景全不合拍。我很后悔怎么会给他出了这样一个“歪点子”，以至于把一部原本也许很有价值的小说，愣给糟蹋了。

对于这样的写法，可能他也很不满意，所以一直到死，都没把这部“绝唱”拿来给我过目。

刘德明现在已经故去，敖乃松的这部“绝唱”最终下落何处，也是一个谜。我很惋惜：他把稿子交给刘德明，简直是一大错！他根本就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从“哥儿们义气”出发，他能够暂时把稿子掩护下来，时间一长，他很可能会把稿子撕下来卷烟炮、擦屁股的。如果从手稿的长远安全着眼，真还不如把稿子交付给我呢！

7 萧 克

# 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

这场斗争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遭受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

## 7.1 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由元帅刘伯承任部长、叶剑英任代理部长，上将李达、我、张宗逊等任副部长

话得从1956年说起。

这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和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我军也开始了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检查纠正。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军便进入了一个建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战争年代我军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作战指挥也不集中、不统一且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不可避免的，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有客观必然性。建国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军的建设也由低级、中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第一届政协开幕式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加大炮，不只是装备的更替，更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的前进。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第二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3年提出建设“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些提法虽然有些不同，但基本意思都一样，即要求人民解放军这支革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正规化、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正规化、现代化，因此培养大批具有丰富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军政素质很高的领导人才，展

并严格的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尤为重要。为此，1951 年成立了以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的军事学院（设在南京），到 1957 年全军陆续建立了 125 所军事院校。1955 年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因为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便由叶剑英代理部长，李达、萧克、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并分别兼任下属各二级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军委对军训工作的重视程度。1957 年末，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备工作，由我接替他担任训练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从 1952 年到 1956 年，我军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完成由过去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制定和颁布了共同条令及一系列规范，实行了正规化建设所必须的"三大制度"，即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

当然，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同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开始就学习苏联一样，我军建设一开始也只能向苏联学习。50 年代前期我军正规化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从苏军学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同样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了许多有益经验，也机械地照搬了某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同我军优良传统结合不够。例如，有的人对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传统一度有些忽视，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错误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缺点和偏差逐渐被察觉，并开始得到纠正。1953 年 12 月至 1954 年 1 月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

高级干部会议,并批评了以单一首长制来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的偏向,提出要纠正军训中指标过高、过急及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提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亟需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光荣的战斗传统。刘伯承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这些意见也很快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 7.2 我给彭总写的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了国防部了"

在学习五个文件、检查教条主义偏向的过程中,军内在对建国以来的军事训练的估计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训练总监部在回顾学习苏军经验情况、总结全军训练工作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但同时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习苏联的,因为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从苏联引进,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就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起来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支流。

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

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也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应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有的学员还给上级写信，反映学院“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一个工作组在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工作组有的人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有的人甚至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段时间还传出“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说法。

种种分歧，种种说法，引起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亲率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向中央和军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肯定了军事学院工作的成绩，又特别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分歧没有弥合，反倒因为这份报告加重了。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肯定学院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缺点错误只是写有“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彭德怀“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我当时在北京参加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的对这个报

告的讨论。我明确表示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估计,对把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更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不能说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黄克诚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报告的评价是适当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认为,报告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似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错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这样一讲,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怎样看的问题。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就连训练方针甚至建军方针都否定了。

1958 年 2 月,彭德怀送来一篇庆祝苏军建军 30 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其中说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

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就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还引证了政协《共同纲领》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彭德怀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认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事情到这时，也只是认识上的分歧。谁知，这些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 7.3 眼前的一切，真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上

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会议由我主持。反贪污浪费，大家认识都一致。讨论到反右倾和反教条主义时，又发生争论。大家对前段传说"训总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等不满，认为应当肯定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原在训总工作、批评军训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一位负责人，大家意见很大，一时言辞比较激烈，说了一些过头话。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事情起了变化。总政治部派来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一来就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还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会议风向急转，基调变成了反教条主义。

这时，一场政治斗争的风暴突然降临。

我接到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暂时休会。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 1958 年 3 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议的。当时，"大跃进"势头已起，毛主席想借此促一促军队工作，以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会议开始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变成主题。

我起初对这个变化感到纳闷，但一年后，1959年8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透了底，原来从中作祟的是林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我刚回京时，×××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不仅变了主题，而且把反教条主义上升为"路线斗争"，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有人说，8年来"军队的建设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和中央军委的路线相违背的、教条主义的、军阀主义的、违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建军路线"。并且说这个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期间，6月23日、29日，毛主席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

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他还不适当地批评了刘伯承。

毛主席讲话以后，批判的温度又上升了。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赴京，一下火车就要直接到会场上作检讨，结果因身体不好，特别是因眼病加重，眼压升高，住进了医院。住院之后，刘伯承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仍继续写检讨。7 月 10 日，他在别人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讲台作检讨。在检讨中，他既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违心地作了自我批判。除了迫于压力，刘伯承更多地是想尽快平息事情，保护一批同志。言者话音沉重，听者为之动容。看着这位年近古稀而又疾病缠身的老帅，许多人潸然泪下，以致听完他的检讨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苍天有眼，也会为之垂泪。然而，斗争的火力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逾来愈猛。会上竟编造出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给彭德怀的上书，是只要正规化、现代化，不要革命化。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斗。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

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逼着我承认“反党”，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罪名”。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明。

然而，在那种气氛下，不容你接受不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最后作了决议，给我的定性是：“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对我们的处理，则如本文开头所述。

## 7.4 运动中开了建国以来军内大批判的先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仍未停止。总政治部派了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领导批判斗争，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进行揭发批判。他们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采取隔离、禁闭、监视的手段，威逼利诱，以使我们认罪。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以逼迫我就范。从5月到8月，我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判，身体精神疲惫不堪，心中窝火，加上时值夏季，正当酷暑，在一次批斗会后从礼堂回办公室时，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医生见状，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

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

我心中的痛苦难以名状。入党30多年,历经艰辛,我在长期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但绝不会“反党”。我还想为党做工作,还想继续干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再承认一个“罪名”也不过是打倒。“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将以我毕生的言行,证明我对党的忠诚。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这才算过了关。

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军队团一级党委和地方的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李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降职降级,有的被调出军队到地方安置。对陈绪英处理最重,因为他拒绝揭发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被赶出军队,送边疆劳动改造。

同军队的磨难比起来,个人的不幸还算什么。由于反教条主义斗争开了恶劣的先例,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都指责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从此以后,部队不敢抓军事训

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这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那场斗争也开了建国以后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不到一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犯了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冤狱遍地。

“文革”结束以后，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受这场错误批判牵连的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这桩公案得以澄清。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还在“文革”前，彭总被“罢官”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我听了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的话，既是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1958年的那场风波过去快40年了，回想起来总不免感到痛心。但回首沉痛的历史能从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以为今天和未来的借鉴。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善于从历史错误中学习许多东西啊！

8 李 锐

# 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指定的通信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作出的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发表的崇论宏议。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 8.1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着重反映了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这封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当时的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

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到 1958 年 11 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在会议的一天晚上，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1952 年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里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 1958 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

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来经核实，1958年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中，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 8.2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他的心态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

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一阅,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

要,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然是不以为然的。

我同毛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自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是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的计划有很大的

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大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季的订货迟了，影响到一季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订货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项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交通内部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按：指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大下。

（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的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负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经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

样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鼓足干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负作用";讲了人民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 8.3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在讲话中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 16 个问题，说古道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 14 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在讲到第 15 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又点我的名说：

"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为什么不好?"

接着讲第16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40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杀头,以为是要杀

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一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毛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引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自然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却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

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机械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机械工业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出小高炉,突击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年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机械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同我谈到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他们的困难,我是很同情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以直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到杭州后,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

预算,保证了工程质量,一直安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成为东南旅游胜地。

我这三封信及其引起的一些故事,伴随着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对大跃进运动的节节退却和降温,只是这股纠"左"潮流中的几点浪花,谁知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遇到巨大的反弹,被更加"左"倾的逆流完全淹没了。我个人也从此在政治上陷于20年冤屈的灾难之中。这对个人和党来说,都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9 王 定

# 亩产13万斤"大卫星"的幕后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其详数是130434.14斤)，轰动了神州，震惊了世界。这颗一般明眼的人都可看得清楚的大假卫星，在当年它给环江县带来了一场长期难以解脱的巨大灾难。整个县的财力、物力遭到巨大的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 9.1 新县委书记号召大家"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

我是自1949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原为思恩县和宜北县,后合并为环江县),就任为环江县的县委书记(原为思恩县与宜北县的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7年底因提出包产到户和到组,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职等打击,县委也被改组。我有责任就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看到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将这一事件公布于众,供后世查寻、借鉴。

县委改组后,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为极右,副书记陈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8个区4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受株连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在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在狂热的错误的思想指导下,不着边际地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新任县委书记曾扬言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争取在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思考和策划,选用了并蔸的方法来创造奇迹。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为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具体地为放卫星指出了方向,他们这样暗

示“……湖北3万斤1亩的卫星是把6亩移到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 9.2 水稻密植到连小孩爬上都掉不下去，竟引得越南、苏联专家也前来“取经”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一些干部，于8月22日前后召开了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研究，决定于8月23日开始行动。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然后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入田中后，将泥肥耙融耙烂。于8月28日至30日内不分昼夜地动员了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只用了两天就将那块一亩一分田并蔸完成了)，密植到小孩子在禾苗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以防倒伏。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他们还故做姿态地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装竹管等办法由十多个人负

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已成熟的禾苗在收割前是不需要施肥的,但是无知的人们像煞有介事似的,装模作样地不断给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倒了禾苗,虔诚的人们竟用自己的蚊帐将粪水过滤后,用洒水壶喷洒。就这样,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便布置就绪。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言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乃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了检查验收团,成员有自治区、地区党政领导、自治区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技师,以及有关水稻专家、技术人员,风尘仆仆地专程来到环江参加现场验收工作。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环江县委书记向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地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开镰仪式。特邀来的各级党政领导、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当地奉命到场的社员共6千多人参加了开镰仪式和参观了整个现场收割过程。400多男女社员参加了现场收割。

为了达到亩产10万斤以上的产量,他们精心策划了以下过程: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长长的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行示威似地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

时，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他们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成群结队地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的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即使这样布置，估计还不能达到预计数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便又施展魔术，指挥在运粮的人群中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挑起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过秤一次或几次，如此循环反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小时的折腾，直到当晚深夜才收割完毕，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尚余0.055亩未收割，留作今后供人参观之用。在这1.075亩的试验田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工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的数据，纯粹是在团团转转、循环往复的过秤之中创造出来的。

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策划者在收割完后，要求来参加验收的自治区领导干部以及院长、教授、水稻专家、技师、技术人员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可叹的是大多数人员都违心地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有领导在场，专家教授作证，谁还去过问和怀疑这一个弥天大谎。

在验收喜报上签名时，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就没有签名。事后环江县林业局一位干部以“广西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在1959年3月7日向毛主席写信说：“这样做我认为

13 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环江中学一名教师覃有华也说:"13 万斤 1 亩是不实际的,这是环江的耻辱。"县委干部张联元在私下里说县委书记吹牛皮,结果被拿去劳改,并受到了打屁股的惩罚。连在柳州农业中专的一些教师(如翁德齐、陆万佳)和一些学生也因怀疑 13 万斤的产量,结果被划为右派和开除学籍送回农村管制劳动。

收割后的第二天,1958 年 9 月 10 日上午,县委书记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 16 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 1.13 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 1.075 亩,实收干谷 140217.4 斤,平均亩产 130434.14 斤,尚有 0.055 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县委书记的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三天,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第一大报在头版头条用特大号字套红制版报道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 13 万斤的消息,同时登载了"小孩在(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等三张照片,还发表了为环江县夺得水稻高产的特写一篇、社论一篇,以及区党委、区人委于 9 月 11 日给柳州地委、专署、环江县委、人委发的贺信,共占去了第一版的整个版面和篇幅,还不够用,在第二版上又发表了 13 万斤的来历等两篇专题通讯。随后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环江亩产 13 万斤的消息。

1958 年 7 月 25 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环江县早稻产量翻四番",并配发了短评。报道中是这样总结的,"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上半年,在'反冒进'的歪风邪气笼罩下,环江上空

乌云弥漫，鬼怪横行，特别是以前县委书记王定为首的右派集团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实行三包到户，作物下放……农村中资本主义昂首阔步，生产萎靡不振。”短评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在党的教育下，环江人民认清了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粉碎了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的进攻，在思想上插上了红旗。因而生产飞跃前进，今年早稻空前大丰收。”“环江人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政治挂帅的重要，体会到政治挂帅是思想解放，革新创造的动力”，“……跃进是无止境的，思想解放，革新创造是没有限度的。”

大量的宣传报道，自治区、地区、县都组织了大量的现场参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将小小的县城挤得人山人海。随后越南也派来了代表团到环江参观考察，苏联专家也拿着刊登这一消息的报纸询问中国留学生出现这一奇迹的奥秘。就这样一个荒谬的弥天大谎不仅欺骗了全国人民，连世界上的一些善良的人们也受到了欺骗。而且如此荒诞的怪事，居然发生在20世纪人类科学智慧已能放卫星上天的时代，该是多么可耻。

## 9.3 县里粮食全面紧张，四五月间出现饥荒，饿死人现象加剧

环江县放出一颗荒谬绝伦的“大卫星”，荣誉也接踵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成了战功显赫的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他出尽了风头，除

披红挂彩外,还领到了一面特大红旗。县委书记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有人统计过他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共领到过96面红旗。在虚假的荣誉面前,他处处以党的化身自居,以英雄自居,在大小场合都要人们去拥护他,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威信,使他在环江的所作所为谁也不敢怀疑,谁也不许反对。在环江县他要到哪里去,必须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他去山川公社巡视,预先便通知指示,要社员准时到公路边夹道欢迎,使得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赶到公路边,为了不错过迎候时间,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迎接县委书记的到来。全公社1.8万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万多人,欢迎的队伍从头到尾共有5里路之长,他似乎成了小国君王了。

因为放"卫星"有功,一批制假干部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地区级提到了省里,县一级提到了地区,县委书记当之无愧地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又不断地吹嘘和浮夸,似乎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其中还含有水份。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在总产量

3.3亿斤中,国家只征购0.71亿斤就不算过多过重了,但是这一任务数却是环江县1958年实际产量1.05亿斤的70%,这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水稻试验田亩产13万斤,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万斤的假卫星是自己放出去的,牛皮是自己吹响的,上级任务下来后是一定要如数完成的,一担担粮食过秤上交,一车车粮食向外调走,老实的农民已竭尽全力了,到后来农民们实在交不出粮食了,但还是不能完成征购任务,县委领导们便采取强迫手段要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并扣以瞒产私分的大帽子欺压群众。为了达到强迫交粮的目的,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在这次会议上就逼出完全是虚假数字的2.4296亿斤"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报了数字接着要粮食来兑现,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全部上交了,征得的所有粮食又都上交外运了。催交征购粮一天都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又吹到环江县,掀起了反瞒产运动新高潮,环江县委书记自

告奋勇,力争当上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比1958年的任务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没办法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县委书记为了夺取红旗,在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为此环江县又扛回了一面红旗,而实际入库数才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便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在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争,受批判。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斗争批判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也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还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和挨饿竟死去13人,他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们,也有人出来对这样的做法提出批评,在会上当众指责县委书记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分别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

死。

为了想方设法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粮食作为征购粮任务一起并入国家仓库。为此环江县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就这样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了国家仓库,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则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县委书记听说后火冒三丈,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气势汹汹地大吼:"哪个是崖日坚,给我站出来!"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了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随后便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斗争后还不给饭吃,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就这样在一次斗争会后走不到二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县委书记还宣布,凡是偷仓库里粮食的可开枪击毙。在环江县仅为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人就有几十人之多。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度日谋求生路。对此,县委又下令对这些人进行追捕,追捕回来的人,集中关押接受教育,在关押之中,将几十人拥挤在一个小房间内几天几夜,不要说睡下休息,拥挤得连坐也坐不下去。连闷带挤,用这种方法就折磨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曾按照县委书记指示

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生杀予夺草菅人命竟到如此地步。真是惨不忍言！

浮夸的数字没办法完成，反"后手粮"运动愈演愈烈，农民家的粮食被强行搜走，集体、国家的仓库统统封死，还提出就是死人也不能动摇，绝不准开仓放粮。社员家中无炊烟，公共食堂也长期揭不开锅盖，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130多天，最短的也有一个多月以上。饥饿造成各种疾病出现，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人数不断增多，死人现象到处可见。

## 9.4 对敢说真话者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一大批耸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面对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现象，稍有良知的人们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抗争，但在当时狂热的气氛下和县委领导独断专行下，人们的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初期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信中说："自古以来人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今年这样苦，今年人民的苦头是空前历史之所未有的。"此信后来被县委书记截获，便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翻印原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绍儒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最后

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面对一封封为民请愿,上访控诉的群众信件,为了严加防范,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县委书记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对写信上访请愿的群众,对正面向他汇报工作和反映情况的同志,他又是怎样对待的呢?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断粮而引起疾病和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县委书记听说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7月,永安公社党委书记覃恢汗回家乡水源公社和平大队龙门屯,看到有一家三口死了无人埋葬,有一妇女横尸路旁,父亲也被送去公社劳改至死。回到永安公社后,便向当时在那里下乡工作的县长和一位县委委员汇报,同时向县委也汇报了非正常死人现象,后覃竟以恶意攻击水源公社为罪名,受到县委停职反省处分,拿去小劳改。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进行反复批斗,每天规定捡三担牛粪进行处罚。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县委书记汇报此事,县委书记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仁忠在反右倾中戴上了"右倾分子"

的帽子。

上述在假卫星放出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还有更多的为反对假卫星、为受灾人民申冤，说实话的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县委书记主持下的环江县委欺下瞒上的做法将环江县搞得乌烟瘴气，饿殍遍地。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县委书记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现象严重，想将有关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县委书记手中，为此他大怒，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径自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并说死人是一些传染病引起的，并横蛮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宏基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那里，你敢签名盖章吗？”使得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由于环江县灾情日趋严重，自治区检查团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下去。

县委书记在环江的所作所为给环江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治区党委经调查核实后对造成这一惨痛事实的当事人进行了处理。

1960年元月县委书记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走马上任,经调查团调查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真相后,于6月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揭发和批判,被揪回环江批斗,于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1963年10月31日以违法乱纪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造假者罪有应得。

10 李 新

# “四清”札记

## 10.1 “谁要是不下去，就把祂赶下去！”听完刘少奇的报告，各单位立即组织工作队下去“四清”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做报告呢？这么

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刘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周总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也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王光美到各单位去做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做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各单位立即组织工作队去“四清”的地方，最后决定在

甘肃省的张掖县(古甘州)。

黎澍和我都没有参加去张掖的筹备工作。黎澍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让青春发出光辉》,遭到带全国性的批判;我则因1963年到四川讲学,被《宣教动态》糟蹋一番,因此我们俩人都被排斥了。主持筹备工作的是刘大年、张崇山和祁式潜。

一天,近代史研究所要我到会议室参加"四清"动员,我去了,会上发的"四清纪律"真严格,其中有一条是"四清"期间不许谈恋爱,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便信口说道:"中央说'四清'要分期分批地搞,要搞好多年,不许谈恋爱,行吗?我们这些年近五旬的人,倒没有什么,不过也难说,也许还有人憋不住呢。至于年轻人,要等到'四清'完了,恋爱才开禁,这样的规定合适、合法吗?行得通吗?"本来会场空气十分紧张,我这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纷纷议论起来,当讨论得莫衷一是的时候,刘大年忽地向我问道:"李新,你说怎么办?"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很好办嘛,到甘肃去,听甘肃省委的不就得了吗?何必另搞一套,多此一举。"我的话一说完,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所里自订的那许多条纪律便被搁置起来了。

刚过了国庆节,我们就启程赴甘肃了。在这之前,我和黎澍送陈旭麓回上海,在车站遇下雨,北京的天气顿时冷了下来,时值黄昏,一种凄凉的感觉袭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们去甘肃时,是大队人马共同"开路",送行的人也不少,倒很热闹。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大家都不肯多说话,人们的心头都很压抑,那种滋味也很令人难受。汽笛高鸣,火车缓缓开动,车上车下的人挥手巾,我听见孩子们在高声喊叫"爸爸再

见"时,心中感到无限的凄楚,我一生中经过多少次别离啊,但那些都是壮别,只有这次与家人离别和几天前与陈旭麓的送别,才使我领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别离滋味。

无怪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

上车后我即倒在卧铺上,想把情绪稳定下来,但天气是阴沉沉的,山是光秃秃的,田野是茫茫然的,我时卧时坐,心中仍是烦燥不堪。于是便想作诗词以解闷,开头还有些灵感,凑成了几句:

"挥手登车从此去,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冷落关河秋色暮,行行行过山无数。"

后来灵感不继,写不下去了,随着轧轧的机车声,我也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凭窗一看,入眼俱是沙漠,于是又返身上铺,直至兰州才下来。

从北京到兰州,一路上都是祁式潜在那里指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在队伍即将从北京出发时,刘大年向大家宣布:这次参加"四清"的队伍由一个临时党支部领导,支部委员三人:刘大年、祁式潜、李新。由刘大年任书记,祁式潜任副书记。由党支部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根本不符合我党的建党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但从反右派以来,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党支部委员会,竟有一个支部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显然也不合乎党章的规定。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我也不能说话,因为谁说话谁就要挨克,搞不好还要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 总之,不是右派,也得是右倾。到兰州后,祁竟然在一次大会上指责王思玉给陈铁健缝被子,陈和王是一对公

开的恋人，怎么不可以互相帮助？即使是一般的男女同志互助，也是正当的，无可指责呀。对此，我实在难以忍受，尽管陈是我的研究生，我还是不避嫌，在支委会上对祁式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却解释说是在“维护纪律”，我当时质问道：“哪里有不许男女同志互助的纪律？”他回答说：“四清期间。”我说：“难道四清期间男女互助就犯了法？”他说：“‘四清’期间是不许讲恋爱的”，我说：“这是谁的规定？谁做出这样荒唐的规定？”刘大年见我很生气，也很认真，便出来打圆场。他对祁式潜说：“所里那些规定暂不执行了，等着执行省里的规定好了。”我于是又问刘大年：“所里又有什么新规定吗？”他连忙说：“哪里，哪里，我是说等着省里的规定嘛。”随后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在兰州，我碰到了副省长王孝慈，抗战时期他和我在太行分局同事，他即将调离甘肃，向我介绍了不少甘肃的情况。他说：甘肃的灾情很严重，饿死的人不少，省里对你们来参加这里的“四清”很重视。李友九（省委书记）担任“四清”工作团总团长，汪锋（省委第一书记）也要去参加。现在大家的情绪都很紧张，凡事谨慎一点为好，好在你和老九（指李友九）很熟，有事可以找他。几天以后，王孝慈就离开了兰州，从此以后再未见面。

在兰州，我们“四清”定的地方是张掖的乌江公社，由甘肃省永靖县的干部和我们近代史所的一帮人共同组成一个工作队，永靖县委书记担任工作队队长，刘大年参加领导。我被分配到乌江公社的东湖大队担任工作组组长，这个工作组也有永靖县的干部参加，他们的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工作组副组长。

## 10.2 群众起初哪里知道，我们是来搞阶级斗争的，是专门整“四不清”的干部的

从乌江公社到东湖大队不过十多里路，由于我们是吃了第二顿饭才起身，加之逆风而行，路又不熟，所以走到东湖，已是掌灯时分了。根据工作团的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和村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属的家，工作队员都不能住，结果能住的贫下中农一时又很难找到，只好住进牛棚了。东湖大队（从前的乡）共有十二个小队（从前的村），我们把工作组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住进四个小队，我带一个小组住在大队所在地东湖村，除女同志外，我们集中住进退伍军人李富祥的家里，没有墙，是临时搭起来的，能挡雨而不能挡风。李富祥光棍一个，住在这房子里倒很宽敞，我们去则显得太小了些。我们一到，李富祥就要把外屋让给我们，自己住灶房，我们则争着住灶房。最后决定大家一起挤住外屋，灶房不住人，这么一来，外屋炕上炕下都住上人了，刚安顿好，李富祥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盘油饼请我们吃，这油饼和北京的不一样，也不像南方的油条，因为那些都是油炸透了的，这里所谓的油饼，只是把一些粗面捏成团，下油锅里滚几下即捞出来，而且因为油太少，外面全是糊糊的。即使这样粗糙的东西，在当时当地也是美味呢。但我们因有严格的纪律，大家都坚持不要，这样推来推去，李富祥很不高兴，我见此情景，觉得如果辜负了他的一片诚意，以后必不好相处。于是拿了两个油饼出来，分给每人一

片，并对李富祥说："您当过解放军，我是老八路，咱们军队的纪律你是知道的。何况我们今天是吃了饭来的，肚子并不饿，现在我们一人吃一口，领你的情，以后咱们就都是好同志。"大家全都笑起来，又谈又笑挺欢畅。等李富祥端着盘子出门以后，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可违犯纪律了，是不是要把这情况向上报告一下呢？"大家都说："干吗要报告？一报告准会倒霉的。"我又说："既不向上报告，那就谁也别往外说。"大家齐声："好！谁往外说谁就是混蛋。"人心如此一致，我也就放心了。

进村后我们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便知，何待访问？每个家庭都一无所有，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北墙根就有一群"日光浴"者，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悲惨的景象呀！汪锋、李友九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后，才把省里的救济物资集中往这里投放。但灾情太重，灾区太大，分到每家每户的东西也就少得可怜，哪家能分到一条被子、一两件衣物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经初步了解，这里受"大跃进"灾难很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很多，几乎每户都有，中监委书记钱瑛曾在当时带领工作组来做过调查，并发了些救济品。群众对中央工作组印象很好，敬若天神。我们这次从北京来，而且也叫工作组，群众就以为中央工作组又来了，对我们希望很高。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来搞阶级斗争、搞"四清"的，是专门整那些"四不清"干部呢？由于群众对我们多怀好意，所以我们了解情况比较容

易,访贫问苦效果也很好。但我们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并不满意,我们要的是村干部"懒、馋、占、贪"的材料,谁如果不反映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就认为他是包庇村干,受了村干部的收买,慢慢地,群众见我们爱听假报告,不听真情况,一些老实人就和我们疏远了。

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必须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每天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吃饭,三餐都是稀的,一大盆粥里稀稀疏疏地只有几根面条。老乡们有经验,用勺子一搅,就能把面条和米粒捞上来;而我们这伙洋学生出身的干部却毫无本领,拿着勺子拼命地在盆里搅和,可盛到碗里时几乎全是清汤。老乡们肚子大,能吃三四大碗;我们男同志也能勉强吃上三碗,只可怜我们那些女同志,吃上两大碗就把肚子撑着鼓鼓的,但连续两三次小便后肚内就空空如也,饿得不行,当大家饥肠辘辘、唉声叹气时,我便把"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念给大家听:"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大家听了,开始笑了一阵,但随后还是打不起精神来。这首顺口溜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舒天巩 1959 年参加人民公社考察团回来偷偷告诉我的,随后便是庐山会议,反右倾,这类顺口溜谁也不敢说了。我虽然爱说笑话,但还是能掌握分寸的,这次在大家情绪低落时,为了能安慰大家,我才说出这首顺口溜。谁知到"文化大革命"时,竟成了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污蔑"三面红旗"!

由于吃不饱,还要参加劳动,同志们很快都"掉磅",体重普遍下降,女同志们全都变得很苗条,但绝不是秀美,面是面

黄肌瘦。我常给她们开玩笑说:"你们可真是'关山飘泊腰肢细'呀。"黎澍过去长期在白区大城市工作,没有经过小米加步枪的锻炼,哪能经得住只喝稀粥的考验呢?于是他一天天瘦下来,连脸型都变了。姜克夫对我说:"老李,黎澍不像咱们是在解放区过来的,他的肚子没有经过革命,顶不住呀!你可否向总团反映一声,解决一下他的问题。"我就去找李友九,不久总团就把黎澍调进张掖城,负责编写张掖新志,并且还把喻松青(女,黎的研究生)等人调去当助手,黎澍进城后,能吃饱饭,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看那里的地方志。现在黎澍在编新志,我便从他那里看到了许多旧志,例如《甘州志》、《张掖志》等,使我增加了不少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知识。河西是汉代为对付匈奴而开辟出来的,这一条通往西域的走廊,形势非常重要,张掖之名也是这样取来的,张掖后来又称甘州,由汉以至唐宋都很发达。隋炀帝曾经西巡到此,对西域使者大吹牛皮,说什么洛阳吃饭不要钱。范文澜写中国通史,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从旧志书上,我看到甘州过去是个很美的城市,引雪山(祁连山)之水灌溉农田,城外农产丰富,城内市场繁荣,无怪《八声甘州》成了著名的词牌,但现实的张掖却破败不堪,这使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张掖的景色也别具一格,尤其晚上的月亮,显得特别高,特别清明,从而使我对高适的诗句"高高秋月照长城"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同时,对杜甫的"月是故乡明"的

理解也更深刻了,它不仅是感情使然,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一般说来,河南的月亮确实比四川的要明亮些。在张掖,我还领略过一次黑旋风的奇特景象,那可真是大开眼界。黑色的旋风自西而来,先沿走廊的南北两面山麓向前飞奔,如同两路大军包抄一样,形势逼人,老乡们都拼命往家跑,边跑边喊:黑旋风来了,快回家呀!这时两股风合围一处,其势之猛,不但能摧枯拉朽,更会使房倒屋塌。没来得及跑到家的人,必须马上就势卧倒,否则风会把人卷得很远很远。有的小羊被风刮到河滩,摔死在石头上。有了这次亲身经历,我才明白用黑旋风来形容李逵的性格,是再贴切不过了。

## 10.3 工作组权很大,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惨案屡屡发生

"四清"像历次运动一样,一开始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对所有的村干部都要大胆怀疑,用各种方法搜集材料来开展斗争。尽管是捕风捉影来的材料,也都信以为真。还在北京的时候,中央文件就已指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党手中,到了张掖以后,各处传来的更为严重,似乎绝大部分的村干部都烂掉了。例如西北局的试点长安、北京的通县,还有安子文在山西某县的经验介绍,都是按照《桃园经验》的看法,把农村看成一团漆黑,这和1947年"搬石头"颇为相似,只是对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包括进去罢了。而对村干部却看得比"石头"还不如。正因如此,所以"四清"以桃园经验为榜样,不但不相信

村干部，而且也不相信群众，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像在白区工作一样。工作组因为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干部，偏听偏信，只要得到一点“四不清”材料就穷追不舍，已成了工作方法。这样也就自然会产生逼、供、信的错误。和历次运动一样，开始不防“左”，只怕“右”，一定要等到出了无数乱子以后再来纠偏。工作组的权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村干部是不少的，即以乌江公社而论，人命案不下十余起，我们东湖大队也死了一个人。我身为工作组组长，未能阻止这种惨痛事件发生，心中确有愧疚。但仔细想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个人又怎能阻止得了呢？附近有的大队已突破大案，一天之内全村主要干部都已交待，虽然我听了不相信，但总团已作为经验通报表扬了，我们有的工作组队员为此加紧逼供，因而发生了惨案。

我当时分工负责对支部书记进行审查，我曾到他家看过，根据观察所得，我认为多吃多占，他肯定有；但若说有多大数量的贪污，则很不像。因为除炕上有一领席子一床被子外，他也是家徒四壁。我跟他谈话多次，都是说明政策、鼓励他交待，并希望他能动员全支部的党员，特别是村干部中的党员交待问题，他问我还可以由他召集党员开会吗？我不敢答应。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已有人说我右了，若答应他召集党员开会，我必定是个“大右倾”无疑。但若以党章论，他是党员选出来的支部书记，现在又没有撤销他的职务，他怎么不能召集党员开会呢？可是历次运动形成一种惯例：只要运动一来，什么

党章,什么国法,全都不要。这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四清"和"三反"、"五反"、"反右派"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寻常事,不足为怪。至于在张掖,"大跃进"饿死那么多的人,现在"四清"死几个人,更没什么稀罕了。但是对东湖大队死人事件,我还是认真追问了一番,并要大家引为教训,尽管永靖的干部比我们近代史所的人更"左"一些,但我对本所的干部要求更严,我要他们未经向我报告不得隔离审查村干部,更不得任意设法逼供、诱供,要调查研究,注重事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逼供的现象少些了。当然,因此战果也就不那么辉煌,也不能得到表扬,但等到后期进行甄别时,我们的工作也就比较好做了。

对待村干部如此,对待"民主补课"也是如此。所谓"民主补课",就是找出漏划的地主富农来斗,或是对斗得不彻底的地富再拉出来斗争。我们没找出一户漏划的地富,只得把对贫下中农不服的一家地主又斗一次。事前准备批斗时就宣布我们的政策不许打人,所以斗争会上,只动口,未动手,斗争对象认了错并保证以后"口服心服"了,也就完事了,现在想起来,这样做也很滑稽,但当时若不如此是怎么样也过不去的。

## 10.4 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四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至于如何搞,大家深感迷惑

我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黎澍,因为在他那里可以知道"四清"全局的消息,也可以知道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和党中

央对文教方面的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指示，我是更为关注的。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范老和翦老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要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毛主席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和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更发展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黎澍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我也说过：“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堂也不坚持了。世界上天天都有斗争，天天都有让步，这是事实呀！谁也无法否认。”我们俩人对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更感到忧虑，因为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些，岂不要绷断了吗？我们当时已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情，但谁能想到后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运动呢？

刘大年这时从北京回来，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四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刘大年对主席的指示很崇敬，更欣赏，但对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因为在张掖，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以及村史和公社史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历史要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地写出来吗？刘大年对此也是一筹莫展。"四史"中还有工厂史，对我们近代史所来说就更生疏，难度也就更大了，所以对于搞"四史"，大家除表示完全拥护外，只能空议论一阵。当然，我在私下里和黎澍、蔡美彪等人还是要说真话的。但不论我们有多少意见，仍就只是背后议论

在黎澍那里，总还是比较轻松些。因为还有人可以开玩笑。喻松青这位女才子，博学多识，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好对象，他们在修张掖新志，自然要研究乌江的地理和历史。一次，她颇有心得似地说道："乌江即黑河，我看这黑河就是《木兰辞》里的黑水，'朝辞黄河去，暮宿黑水头'，这黑水不是离黄河很近吗？"我听罢不觉好笑，这才女竟然把诗词作为考古的依据，因而随即回答她："这黑水离燕山更近呢，'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能听见马叫，当不会有一天骑马的路吧？"这一下把她倒难倒了。但她始终不服。

同志间的谈笑纵能带来短时间的欢愉，终不能消除人们心中无限的惆怅。一天下午，黎澍对我说，咱们到外面走走吧，何必老呆在家里耍贫嘴。于是我们便登上了甘州著名的定远楼。登楼远眺，与华北平原相比，另有一番景色。我不是文学家，无法描绘出这景色有多么迷人，多么别致。不知怎么的，我们在城楼上徘徊许久，自薄暮至黄昏以至皓月升起，既不多说话，又不忍离去，有时相视苦笑，但更多的时间是各人想各人的心思。直到夜色渐深，天气凉了，才缓步回去。回住所后，忽有所得，便伏案提笔，写下了一首《水龙吟》，记下这次

登临的感慨：

甘州南北皆山，祈连山上千年雪。
长城何在？残垣废垒，若连还缺。
更上层楼，临风极目，地长天阔。
望胭脂山麓，黑河水曲，斜阳里，如凝血。
又是西风萧瑟，望高高一轮秋月。
阳关千里，黄河九曲，寒光四射。
雁渡江楼，鱼通黄浦，莫伤离别。
但君心耿耿，余怀渺渺，视浮云白。

注：当时黎澍和我住的地方，前面都冠红楼之名，陈旭麓住上海，故称黄浦。

第二天，我把这首词放到黎澍的书案上，便匆匆地回东湖去了。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赵世利带着一个工作组在那里搞“四清”。赵是我受范老的委托经过吴老（玉章）向四川省委交涉刚从四川调来的。1963 年我到四川讲学，他当时是四川省高教局的教学处长，我的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并陪同，因此对他《宣教动态》上那些诬蔑我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驳，因此也引起某些人对他的不满，受到排挤，后来他离开了近代史所，调到语言学院当教务长去了。他在平原大队搞“四清”，我们近在咫尺，所以时常来往，关系较为密切。

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

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军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原来1936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进行了东征，但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阎却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不得不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西征，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举行了宁夏战役，结果没有成功，已经渡河的四方面军的两万红军便称为西路军。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象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与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及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怎么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帐都挂到张国焘头上去呢？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

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

## 10.5 "四清"年过得如此欢快，至今难以忘怀。却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把青年引错了方向

时光迅速地流逝，很快便到了1965年春节。节日前夕，总团把所有的老干部都召集进城，名为开会，实际是改善生活，让这些老干部增加点营养，借以恢复日渐瘦弱的身体。我当然与会了，但到年三十那天，我感到自己在城里过年，却把工作组的同志们丢在乡下，于心不安，于是便到商店里买了许多肉食、糖果、烟酒，不顾旁人的挽留，搭车回到乌江，从乌江到东湖只能步行。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顶着西风赶路，谁知半路上又下起了大雪。我背着沉重的东西，冒着迎面而来的大风雪，奋力前行，身上不住流汗，终于在晚上10点过后赶到了住处。当我推门而入时，大家都很吃惊，谁也没有想到我此刻会回来，他们都知道老干部在城里过年，所以在吃晚饭时，虽也念叨我一声，但随即也就过去了。大家围坐炕上"守岁"，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枯坐着颇觉得无聊，正在此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带回来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怎么能不兴奋呢？曹大个儿(振中)赶快把东西从我背上解下、打开，女同志们连忙把烧鸡、熟食拿到厨房切好、放进盆里，然后和花生瓜子等一齐摆在炕上，酒瓶也已打开，酒香肉香同时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大家兴高采烈，高声喊道：我们要趁"四清"过个好年啊！

这个"四清"年过得真不错,开始是举杯庆祝,随即行令饮酒,划拳之后,继以猜谜。人们酒酣耳热,激发出各种天才。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跳舞的腰肢也特别灵活,猜谜语的更是各显所能,自己编出许多独出心裁的诗谜、灯谜。我也兴致勃勃,用同志们的姓名编成谜语,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我记得一个谜语是"宋太祖贪财,唐明皇好色",前者射赵喜宝,后者射李瑚,他们俩人都很老实,听了这个谜语也笑弯了腰,我针对钟碧容和姚宝珠的谜语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们被我逗得又乐又恼,假装要打我,被邻坐的人给止住了,我还记得吕景琳打的谜语又多又好,他真是个出谜语的奇才,可惜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吕景琳是一个很好学的学生,来搞"四清"还背着一部《辞源》。他的教条主义味道因之也较重。一天,大家谈论起胡麻,因为我们当时吃的都是胡麻油,吕一听便高声说道:"胡麻有什么奇怪,不就是芝麻吗?"大家都笑话他,他不服,赶快取出《辞源》,翻到胡麻那一条,指着向大家说:"你们看,这里明明白白说着'胡麻即芝麻'呀,有什么错?"我把书拿来一看,果然是这样写的,而且还附着一幅小图。很显然,《辞源》的这一条错了。于是我对吕景琳说:"回头吃饭的时候,你拿几根胡麻杆看一看,看这里的胡麻杆和你们山东的芝麻杆一样不一样?"饭后他走来对我说:"胡麻和芝麻很像,但不是一个东西,仅仅是同科的植物,《辞源》的编者大概没有亲眼见过胡麻,所以搞错了。我呢,也跟着错了。"我通过这件事对大家说:"一个人应该发奋多读书,但多读书不能全信书,书不一定都可靠,只有符合实际的才是真理。"吕景琳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习不错,而且从此以后,既注意读书,又注意实

际，在研究工作中进步很快。

继猜谜语之后，我们还做了各种游戏，做游戏时，有人故意把灯吹灭了，然后把碗中的酒点燃，在酒光下，人们的脸呈蓝色，有如鬼脸一般，有的女同志吓得叫起来，大家乐不可支，一直狂欢到黎明。

这个“四清”年过得如此欢快，至今难以忘怀，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却有人据此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把青年们引错了方向。我想，过了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贴大字报的人总会有新的认识了吧。

旧历大年初一，永靖县的同志请我去吃抓羊肉，把一只羊砍成几大块，煮在锅里，等煮得差不多了，每人抓一块拿着就吃，这里的羊肉很嫩，不用煮多长时间就熟了，看着好似很生，可放到嘴里一咬就烂，而且没有膻味，实在鲜美得很呐。我是第一次吃抓羊肉，开始还有些犹豫，吃了几口以后，兴致高涨，和大家谈笑风生，居然把一大块肉给消灭了。很快，几个人便把一只羊吃得干干净净，他们有人还带来了糌粑和酥油，糌粑我凑合能吃两口，一闻酥油的腥味我就反胃，只好辞谢了，糌粑是青稞麦面做成的，很耐消化，是藏民的主要食品，藏民所以能耐寒，能登山，据说与吃糌粑很有关系，酥油是牛羊的脂肪制成，但制作不精细，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初吃却让人难以下咽，他们还带来很多酒，其中也有青稞酒，味道倒还不错，酒兴一来，划拳声如雷震，好不热闹，我直到傍晚才尽兴而归。

大年初二雪停了，天气放晴，我清晨出去“蹲点”，就是出去大便，张掖的农村没有厕所，人烟又稀少，所以男同志都到野外去解手，因为时间长、要蹲着，便戏称为“蹲点”。那个时

期，许多领导同志下农村，找一个村庄长驻，叫“蹲点”，同志们把大便叫蹲点，颇有调侃之意，实在是大不敬，可见无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多么紧，人们有牢骚，总是要发泄出来的。

蹲点时四望，景色实在迷人，那雪落满枝头，宛若梨花，而春天的梨花哪能满枝皆是？眼前确如“千树万树梨花开”呀，尤其是远望南面耸入天际的祁连山，在浮云的掩映下，一个个高峰相连，时隐时现，幻如琼楼玉宇，把阳光化为异彩，反射到大地上来，其美妙之处实非文字可表述，我看呆了，忽然想起去年10月起程来甘时，还有一首词没有写完呢。一时灵感所至，便把那首词的下阙拼凑成功。原来的上阙是：

挥手登车何处去？
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
冷落关河秋色暮，行行行过山无数。

现在凑成的下阙是：

雪后边城如画幅，
山拥琼楼，林拥梨花树。
欲步岑高才力蹙，斯人不在何人赋？

我这时确实想起岑参、高适来了，他们的边塞诗写得是多么好啊！想想陈旭麓不在此地，他若在，一定能写出好诗来，因为在我的好友中数他的诗最有唐人风格，但他现在景况如何呢？不禁心向往之。

## 10.6 多数认为《二十三条》中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

1965年的春节，虽然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过得还是挺高兴的，就在节日期间，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也就是《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

我们东湖大队工作组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争论非常热烈，永靖县的同志们多数思想不通，认为我们原来那一套搞法，也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因而成绩很大，现在中央来了新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用不着大张旗鼓，大肆宣扬，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的做法，就受到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对干部情况的估计，《二十三条》没有提多大比例的干部烂掉了，而说“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村干部一律打倒的做法显然就错了。《二十三条》中还明确规定：“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我们实际上与此相反，违背了这些规定。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明确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勇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我们便不能使东湖的“四清”工作得到较好的收场。

因为我是工作组长，不便于和永靖的同志们在会场上公开争论，便推举了两三个同志根据《二十三条》的明文规定，针对永靖县个别同志明显的错误言论展开严肃的批评。永靖县的干部大都是农民或小知识分子出身，哪里顶得住近代史所这些人的攻势？何况发言者上有中央指示，下有村里的事实，有理有据，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我们的曹大个儿，平常并不大爱说话，在这次辩论中却大出风头，他几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讲得有声有色，并能抓住要害，使对方无言以对。我为了缓和会场空气，常常在适当时机，出来总结一下，让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见就停止争论了，所以讨论的结果还不错，思想上基本按《二十三条》统一起来了，同志之间又没有伤了和气。

经过深入的讨论后，我们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比较顺利，隔离审查的村干部都放回了家，为了定案，进行了细微的调查了解，然后根据事实，为所有被审查的干部做了结论。凡是没有证据的条款都取消，只把证据确凿的一条一条地定下来，这样，真正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占少数，多吃多占的虽然比较多，但数字大大地减少，不但比原来搜集到的数少，而且比本人承认的也要少，可见有些数字是逼供出来的。根据《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们让每个确有问题的干部，自己做出了退赔计划，经审定后按计划退赔，在我们离开以前，退赔计划大部分实现了，有些则暂缓到以后退赔。

27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事情仍记得清清楚楚，为了写这段回忆录，我特地把《二十三条》的文件借来重温了一遍。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现在看来，问题很

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机体已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

不久,"四清"就要结束了。已经先行回到北京的刘大年和张崇山(近代史所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来信说,凡有劳动锻炼任务的青年研究人员都留在乌江劳动一年,其余的人由李新负责带领回所。当时,因副支书祈式潜弄出了件桃色丑闻,刘大年回京前委托我把近代史所支部的工作管起来。我接到信后,即找姜克夫并一同到张掖城里去和黎澍商量,我们都认为甘肃太苦,青年同志们在这里才只有半年多,身体就已经瘦弱不堪了,若再在这里劳动一年,谁还受得了?非把大家的身体拖垮不可。于是决定由我回信,让大家都回京,青年们可到山东劳动去。但所里的回答是:青年们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件事要我不必管,我的任务只是把其余的人带回北京。

要青年们在张掖继续劳动的消息,我们虽然还在保密,但被所里的青年人传出来了,于是,一个个青年人找我谈,希望我把他们带回去,他们保证以后到山东锻炼时一定好好干。听了这些人的要求,我心里很难受。这些大部分是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都是我们所里派人到各大学挑选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学习做研究工作,而一定要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受折磨呢?什么"滚泥巴"、"劳动锻炼",根据我个人经验,对于研究工作并无多大益处,但这些话是无法说出来的,怎么

办呢？我又去找姜克夫，他是一位经历丰富并看透了世情的老同志，他坚决对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老李，对青年人行行好吧！不管所里怎么说，我们还是把所有的人统统带回去，看他们怎么办！谁有权让年轻人在这里挨饿。"于是，我便请黎澍出面（因为他有副所长的名义）向有关方面辞行，然后把全体人员一齐带回北京。

在离开张掖城之前，我和黎澍、姜克夫商定，近代史所内部的事情不必向甘肃省"四清"总团报告，只把我们在乌江"四清"了解到的情况向总团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使家丑不外扬，也为祁式潜保全了面子。但祁却不领情，还抓住我没有把青年同志留在张掖这件什么"李新擅自行动"，并提出质问：黎澍凭什么能代表近代史所在甘肃出面活动？为此，回到北京后，在我的提议下，召开了"四清"支部的扩大会议来总结这次"四清"工作。除"四清"支部的全体支委和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参加会议外，所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的人员也参加了，同时，凡参加"四清"的同志，也都分小组总结工作。

在会上，刘大年、张崇山也批评我不执行所里的指示，擅自把该劳动锻炼的青年全部带回北京。姜克夫挺身而出，指着刘大年说："你刘大年在乌江一共待了多久？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张掖，就这样你还不是常在公社里病歪歪地躺着吗？青年同志们也是人呀！人就要吃饭，'食不饱，力不足'，饿着肚子干活儿，这叫什么锻炼？山东有我们的劳动基地，到那里锻炼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叫青年在乌江锻炼饿饭？这次青年们回来是我向李新建议的，有错误我愿意承担责任。"这时各小组、尤其是青年们都提出意见，对要把他们留在乌江

劳动非常不满，于是刘张只好把此事放下不提了。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对祁式潜的批评。因为他在“四清”中表现极左，对人狂妄无礼，犯了众怒，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展开了进攻。不仅批评了他现在的表现，而且揭露了他的历史，说他是公子哥儿投机革命，以后又背叛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又投机回来，因而在解放后的运动中故意极左，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并且巴结领导往上爬，祁这个人确实是不好，历史上也确有错误，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说他“一二九”时期参加抗日运动是投机，则未免过分了，我当时对这种批评不仅未加以纠正，而且推波助澜，现在分析起来，确有报复思想在作怪，“文化大革命”掀起后，祁式潜立即跟着造反派来整我们，这又是对那次总结会的报复，可是不久，“文革”进入揪叛徒阶段后，他也被当做叛徒揪了出来，随即自杀身亡。多么残酷的斗争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多少人？跟着这条纲走的人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这又是谁之过？这难道不应该深长思之吗？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是盲目的，因而也犯了错误，也有一定的责任。人老了，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想明白，才能对现在的事情看明白，不然糊里糊涂地在世上走一场，岂不可惜？为此，特地把这次“四清”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为后来者之鉴。


林 牧

# 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

从1964年12月1日到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做过200天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耀邦在陕西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一系列观点、政策、措施,进行了100天的超前改革。但那一场改革起步不久就被扼杀,耀邦及其支持者受到持续数年的批判和打击。直到1979年1月,陕西省委才遵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出决定,给以平反。作者当时在耀邦身边工作,基本上经历了那个事件的全过程。

## 11.1 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东西样样俱全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耀邦受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16日，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病危，中央派胡耀邦代理张德生的工作，第二年5月才正式任命。

当时面临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向"左"发展的严峻岁月。而在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东西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他们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以上这三个人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后来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

举一些例子来说，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几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

后最多的一年。以上这些处分,大部分集中在当年的第四季度,社教试点是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人122元多61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社教试点的一般地区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南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父、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作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上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投人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那就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和一些县、市,都发生在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9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生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

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干部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刘志丹》小说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等陕甘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案材料。似乎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阵》、《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干部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政治课教学骨干都受到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出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份,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陕西省委的"左派"领导人在1964年冬季进行过两次排队,第一次的结论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百分之四十几。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几。

本世纪50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属于中间

偏上的序列。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88亿元，农业总产值18.35亿元。棉花总产量6.64万吨，粮食总产量87亿斤，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总之，三秦大地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这就是胡耀邦初到陕西时面临的一幅紧张、贫穷、凄惨的图景。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到西安上任的，他初来时，并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4年12月3日他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的时候，他身上披着军大衣，手上捏着点燃的香烟，身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会议开始，耀邦没有讲什么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不像那些老谋深算的领导干部那样，初到一个地方只听不说，令人莫测高深，而是同大家一起，冲口而出，侃侃而谈

在讨论陕西农业上不去的原因时，耀邦先后讲了以下这些看法：

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和"共产风"刮的不大，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的不快；在

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了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至经济恢复的物质条件不如其他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陕西的公购粮负担过重，你们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谈到社教运动，耀邦只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即："捕人多了一些；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在这次讨论中，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先后作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1. 捕人暂时停一下，但要继续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

2."双开"暂时停一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3. 面上夺权暂时停一下，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4. 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后来全省共抽调干部2万余名。

5. 向国务院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6. 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

7. 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为陕西省增拨3万吨化肥。

前四条，立即实行；后三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心里搬掉了几块大石头，一片叫好，他们把解放

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大批干部下乡称之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都是上级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的，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作为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后来又加上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变成"六个暂停"。有些人还把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当作物质刺激加以批判。真是逻辑混乱，匪夷所思！

耀邦在陕西做工作 10 天左右，就到北京去先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 11.2 提出两个施政纲领，贯穿"解放思想、解放人"，使耀邦能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 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1965 年 1 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纠正社教运动"左"倾的文件。但"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且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二十三条》还规定了一些宽松、求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为胡耀邦的超前改革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胡耀邦举起宣传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旗帜，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系列观点与措施，进行了他的超前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

于1965年1月18日至28日，在西安丈八沟招待所举行。耀邦于1月22日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先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军队、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人。

一、解放思想。

耀邦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清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除此之外，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二、主要反"左"。

《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指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提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耀邦明确回答："在当前主要是反'左'。"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学习片言只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

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1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主席思

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耀邦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四、对阶级斗争情势，要具体分析，有多少就说多少。

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是"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

五、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

耀邦在省委1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

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有一位17岁的女青年黄

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石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六、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

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而把工作中的持不同观点者排除在外了。

七、抓关键，向前看。

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份；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

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爱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耀邦对大学师生和中学教师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主要的，对实际工作有远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人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分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帐，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受彭德怀、习仲勋冤案、错案株连的人更不用说了。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帐，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八、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耀邦在省委1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

惨惨。”“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犯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耀邦这样的话，讲了不止一两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件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人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这一年的春节，本来是会空前凄惨冷清的。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啊。

九、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取反对的话。

耀邦在省委1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过硬啊？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耀邦不仅能够这样讲，也能够这样干。他性子急，容易激动，有时批评别人过分尖锐。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脾气以后，可以当面反驳他，顶撞他。他不仅不会"秋后算帐"，还会当面认错。这一年2月下旬，他的秘书小李写了一段关于社教的稿子，耀邦不满意，他发脾气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怕右，我的家很穷，我14岁参加革命，我就不怕。"当天晚上，他的秘书戴云和我一起对耀邦提意见说："小李这一段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但这同人家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我们两个的出身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用呢？"耀邦起先不认账，他说："我没有说这个话呀。"我们顶他说："你就是说了，我们都听见了。"耀邦说："要是说了，这个话不对。"接着，他就去对小李说："小李呀，你的那一段文章还是下了功夫的呀！"4月间，西北局转来陕西留坝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瑜琨向中央告耀邦的信，批评耀邦"忽左忽右"。耀邦刚看到这封信不大高兴，他说："我正在挨批，他又来火上泼油。"我在旁边说："偏僻山区的县委干部怎么知道你在挨批。你的《电话通讯》刚发下去又被迫检讨和停止执

行，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不就是'忽左忽右'吗？"耀邦说：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个人敢讲反面意见，以后把他调到省委来。后来耀邦和我们都已吾身不保，无权也无心去调这个人了。

十、反对依靠少数积极分子而不依靠广大群众。

耀邦在省委1月工作会议上，对群众运动讲了思虑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跳，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讲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耀邦这一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了，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一些资深的"左"倾领导人对这段话特别反感。

十一、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耀邦在省委1月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十二条》当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

配公购粮，对于他的《电话通讯》，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藏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十二、在学术文化领域，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志。

省委1月工作会议以后，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节目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个标志。"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当时，我主管陕西的文艺批判。对文艺评论家胡采的观点，由我提出经省委和西北局宣传部同意，让胡采发表文章进行自我批评。我以为这样做已经很宽大了。耀邦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自我批评是你们指定的，不是人家自愿的，你们把胡采也解放了吧。"

以上这些，就是胡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1965年春节期间，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

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西、中部分片负责,耀邦去陕南。

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到12日,采用日夜加班的办法,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了的案子,耀邦说:咱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刻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大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啊!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批判耀邦时,上级一位领导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题歪打正着。耀邦当时确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

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中的"左祸"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敝,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也有了直接的感受。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系统的讲话,2月14日,他又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是耀邦在陕西省提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汉中地委又作了一些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回来,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耀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务了。"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

二、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扣得过碎。

耀邦讲了三条：

(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待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大的问题，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一条是重申了耀邦"抓"和"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的主张。

三、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耀邦提出四条：

(1)"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2)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耀邦说："我省山地荒坡地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帐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今后几年从山地荒坡地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好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耀邦还在不少县、社，帮助他们计算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

大帐,帮助他们提出一个一抓什么,二抓什么,三年、五年、十年抓到什么程度的规划的轮廓。

(3)不仅要认真注意现有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包括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4)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耀邦提出五条:

(1)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

(2)把集市贸易搞活,我们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所有的集镇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又乱没收。

(3)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而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

后来,耀邦到了汉中地区,农民又提山区运输难的问题,耀邦同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后,对山区修路作了具体部署,即:山区道路,可以修架子车路,也可以修简单公路,由县、社自行组织人力修建。省上给每个民工每天补贴粮食一斤,菜金二角,再调拨一些炸药和钢钎子。

(4)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扶持其他行业。必须非常注意解决乡镇工业的原料问题,无

非是木头、竹子、钢铁、纸张、棉纱、油料等,不要扣他们,卡他们。

(5)三级财政当花的钱要花一点,不当花的钱花了,当花的钱不花,都是违背总的路线的。什么都有节余,不是好事。

五、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六、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

1965年2月18日,耀邦同汉中地委负责人张军、彭彬谈话时说:"生产队经营管理上有问题,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划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当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办法,大多实行以人定量加按劳分配,耀邦主张一律改成按劳分配加照顾。耀邦也提出了联系产量计酬的问题,但是由于还没有承包制,不好落实。

七、造林方针。

耀邦所到之处都要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的造林方针,就是:“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八、对增产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物质奖励。

耀邦在安康地区提出,当年秋季要在全省和各地举行生产评比大会,对增了产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

为了说明耀邦在陕西先后提出的观点、政策、措施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当时的意义作用,这里讲一讲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者所知道的耀邦的理论认识、人品性格、生活经历。

耀邦在陕西进行局部改革,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在全国范围进行全面改革,也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这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所要建设的社会,“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屡屡扩大和错位,不断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人的思想也常常受到整齐划一、定于一尊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这就使人本身和人的思想、才智不断受到压抑和摧残,从而为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目的的基本动力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进行符合人民实际利益和真实意愿的改革和建设,就必须首先把作为目的和动力的人及其指挥部——头脑放出来。可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会遇到压抑思想摧残人的旧体制和保守势力、邪恶势力的顽固抵制与打击,没有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魄和献身精神,是难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耀邦博览群书又

勤于思考，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远见卓识；他在中央苏区的错误肃反中受过审查，在建国后的反右斗争中受过批判，他对思想禁锢和冤、假、错案有切身的感受；他保持着尊重人、同情人、爱人、助人而不整人、害人的善良天性，又具有无私无畏、敢做敢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促使耀邦始终把"解放思想、解放人"作为推动改革和建设的首要任务，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耀邦把发展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和强调把经济搞活，这种思想也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在我国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被颠倒，只能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说抓革命也抓生产，更不能说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可是，时时关心生产、重视生产，这种思想在耀邦的头脑里已经扎下根来，形成了习惯。同时他也注意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要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状况，即使是带着政治任务和其他任务下去，也是如此。他常常批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懂生产，要求我们学习生产知识。

耀邦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说："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他提出的农民互通有无和短途运输不产生剥削，都是以《资本论》为依据的。在安康和汉中，他引证《资本论》中的论断，说明农民为买而卖不产生剥削。短途运输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

钱,而牲畜又是要由驾驭者喂养的,也不是剥削。本来,集市贸易是党的八大提出的,是合法的,可是,1963年和1964年,国务院一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取缔私商,集市贸易大多被关闭了。耀邦在陕西重新开放集市贸易,后来也受到批判。

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是受到湖北、广东等地的启发。耀邦说过:湖北的多种经营搞得好,农村比较有生气。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可是,耀邦学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果然吃了大亏。不仅有人抨击他否定毛主席的"以粮为纲"的方针,而且上级一位领导人还胡搅蛮缠地攻击他:"你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了粮食,另一只手抓了多种经营,还有哪一只手去抓阶级斗争呢?"

植树造林,是耀邦一贯的爱好,走到那里提倡到那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他就多次带领青年植树造林。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又在西北地区和其他地区提倡和督促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植树"谁种谁有",似乎不是他的发明。"开山育林"是他的发明。他反对机械地、自生自灭地封山育林,主张对一部分森林,有控制地开山育林,该采伐的采伐,该淘汰的淘汰,同时大力增植新生树木,有利于新陈代谢。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和发展乡镇工业。在他之前,有的社

会学家提出过，领导人似乎没有说过，是他的一大创见。可惜，他只实行了100天新政就受批判、靠边站了，在陕西实际工作中未见成效。

至于物质鼓励，现在看起来算不了甚么，但在当时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内容之一，也是耀邦受的罪名之一。

## 11.3 “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的传诵中足见耀邦雷厉风行，说了就干的作风

耀邦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正是一个有创见、有战略眼光的而又敢作敢为的实干家。他的工作很勤奋，很艰苦，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每天只吃6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跟着他下乡，令人疲于奔命，每到一个站，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他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当机立断，说了就干；要干部雷厉风行，注意速度，讲求实效。

耀邦在2月14日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以后，2月15日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开座谈会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加以纠正。谈到一件杀人未遂案，主管部门起先不大通。原来，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蹬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并没有动手，未婚妻就把他告了，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耀邦说：这个青年

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同她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那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处理了。

2月15日晚，耀邦从石泉县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F书记，是耀邦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F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F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F又说：省委通知：2月16日西北局第一书记T君要作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

谈完工作以后，我已经准备睡了。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伙计，工作不好搞哇！"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意见不一致么！"接着他说：省委F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有争论。F认为：汉中地区土改、镇反很不彻底。地委认为：汉中地区土改中所定的地主、富民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左右，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基本上是彻底的。在西乡社教中也有争论。F认为：西乡县委和县政府烂了，是夺权单位。地委工作团认为，西乡县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个副县长是问题严重的四类干部，而且这位副县长的问题仅仅是男女关系，如果不是自杀，连四类干部也排不

上。至于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因为他的夫人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躲过清查，F书记就说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政治立场，是四类干部。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做法也有分歧，地委认为F老是“左倾”。

张军讲完以后，我说：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张军说：“不敢讲呀！耀邦和F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我说：“据我接触，耀邦是一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你敞开讲吧。”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F书记的几点分歧。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从数字上看，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求工作团一个人、一个人地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县委一把手和县级领导班子，都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一些问题，耀邦也否定了F书记的过“左”做法。

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被限制自由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解放了。

2月16日，耀邦到了张骞、李固的家乡城固县。李固就是东汉“党锢之狱”中受迫害的清流领袖，是耀邦钦佩的人物。

由于我的衣着比耀邦好些，身材又较为高大。走下吉普车以后，城固县的同志把我当作耀邦迎接，把耀邦晾在一边，

省上在城固蹲点的人提醒城固县委书记:“这不是胡书记,胡书记在后边站着呢!”

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胡耀邦提出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大路,荒了田。

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年,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完成。

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茄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冠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五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闹闹嚷嚷地进行讨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开春前,一次在6月份。

区、社干部提出:汉中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

万亩。

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和建成。

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省上调派一批干部来。

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耀邦同志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扬。有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耀邦到了汉中地委。17日全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和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规划或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有时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怎么知道?"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账、收入账和未来发展的账。那时还不兴用计算器，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的心算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谈完工作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

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韩溪，传说韩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丐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沔县高潮公社连续九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这一句错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也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M。我插话说：“M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耀邦批评我说：“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M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过去作过胡宗南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有功的嘛！”

2月17日下午，耀邦要我写一个材料，介绍城固县的社教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我大大咧咧，信笔一挥就交了卷。耀邦看了稿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是党八

股。毛主席说,党八股要亡党亡国的。"接着又说:"我一到陕西,就听说你是个人才,现在看来,徒有其名,没有真本事嘛。"我在革命队伍所受的批评,常常是"急躁、骄傲";从来没人说我无能,耀邦尖锐的批评,是我生平经历的第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把耀邦的房门"哐当"一声用力一带,走了。我跑到张军的房里去大发牢骚,说:"耀邦粗暴、武断,我不干了。"张军安慰我说:"耀邦性子急,要求高,有时说话随便,心肠却是很好的,你不要在意。"

本来,我的情绪可能要闹几天,而且会同耀邦顶撞。可是,天外飞来的灾祸却把我的情绪一扫而光。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前后,西北局第一书记给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事后很久,我们才知道,西北局把耀邦的《电话通讯》寄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杨尚昆送给彭真,彭真又送给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看过后说:"除了那个四条以外,我看文字上对阶级斗争讲得也少。胡耀邦是抓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不讲阶级斗争呢?"几位领导人又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谈,毛没有看耀邦的《电话通讯》就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2月18日上午,耀邦给《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安

康完全一致。耀邦的信心没有动摇，但是在工作中又不能不尊重中央和西北局的批评，反“右”的火力减弱了。

2月19日，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侯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的县城，只有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离县城30公里的张良庙却是一个风景优美、庙宇巍峨的地方。张良庙西花园回廊墙壁上攥刻着许多名人题词。我介绍耀邦看几首富有山林隐逸情趣的题诗和对联。耀邦看过以后说：“悲观主义，有什么好?!”在平时，谈诗文、谈音乐、谈戏剧，耀邦总是喜欢那些雄壮、激昂、乐观、向上的富有阳刚之气的东西。谈到《梁祝》一类的作品和乐曲，他总是觉得“软绵绵的、凄凄惨惨”。同时，他只顾工作、读书，而不会娱乐，陕西省委有的同志给他概括了四个不断，即：“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有时候，我们向他宣传好戏、好电影，建议他去看一看，放松一下。他说：既然好，把剧本找来看一看，就行了。他的生活情趣是读诗词。他能背诵许多诗词。有一次，他让我背诵岑参和八元咏大雁塔的诗，我背了几句就背不下去了，他接着背诵完。

进入凤县以后，川道上灌木丛生，山鸡很多。凤县的命名，恐怕同山鸡多不无关系。山鸡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其中最大最多的说不定就是古代北方人心目中的凤凰了。南方人把孔雀当作凤凰。耀邦一发现山鸡，就要停车下去打猎。他的性急，打完山鸡，让警卫捡回来，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有一次，他的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人家处长还没有上车呢!”耀邦回头一看，处长正在上车，他马上说：“对，自私！自私!”耀邦枪法好，边走边打，两个多小时就打了

11只山鸡。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山鸡全煮了，请县委的同志和我们四个随行人员饱餐一顿。

当时，凤县正在日夜加班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县、区、社、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耀邦和我分别参加了小组会，原来我们估计基层干部听到耀邦的《电话通讯》会是一片狂欢，甚至有人起来诉苦、翻案；而贫下中农代表因为原先大多参与整人，有人抵触不通。可是，我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啊！

我也曾直接参加不少群众运动，在"左"倾思想集中指导下的群众运动，几乎把群众塑造成木偶了，牵线的人怎样牵他们就怎样动，那里有多少真正的民意和"自觉行动"啊！

2月20日，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也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同耀邦像朋友一样倾吐积压多年的知心话。

2月21日，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镇。杨陵，是后稷教民稼墙之地，也是暴君隋炀帝杨广埋骨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

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耀邦来了，要求讲话。耀邦在2月22日下午离开以前，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耀邦重重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重围。这种状况，在影视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中是常见的，在党政领导干部是极其罕见的

2月23日，耀邦经过咸阳地委回到西安，才发现他已处于四面围剿之中了。

## 11.4 “耀邦瘦了，陕西肥了”。1965年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上受批判、靠边站

胡耀邦于1964年11月30日到陕西就职，1965年3月1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受批判、靠边站了，前后只做了100天工作，但却受到持续两年的十次以上会议的批判。耀邦在西安时先后作过六次违心的检讨，第五次检讨还是耀邦被整得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以后，被迫爬在病床上写的。由于整人者揪住不放，耀邦忍无可忍才在陕西省委6月会议后期发表了“八条申辩发言”，并于6月20日随叶剑英元帅回北京申诉。耀邦走后，斗争一再升级，批判没完没了，在1965年7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8月中旬的陕西省委127次常委扩大会议，8月下旬至9月的陕西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

组会,在1966年2月的陕西省委工作会议,6月的西北局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7月的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活动。后面这些会议和活动,对耀邦本人是缺席审判;对耀邦的支持者们是直接的批判和打击,株连甚广。

1965年6月,随叶剑英元帅同来陕西的张爱萍将军说过:“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

“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这两句话,非常生动和确切。

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受到沉重的打击,确实把他整瘦了。但是,系统批判耀邦的正式文件——《中共陕西省委128次常委会议(扩大)纪要》是1965年9月形成的,10月以后才向全省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并“肃清其流毒”。在此以前,虽然陕西省地、师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但是,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是支持耀邦的,他们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执行耀邦的既定方针。所以,在1965年10月之前,胡耀邦新政所造成的良好形势并未受到大的破坏。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提高,1965年,陕西省的工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工业总产值29.65亿元,比上年增长24%。农业总产值23.66亿元,比上年增长29%,国民收入总额31.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人均国民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23%。粮食总产量125亿斤,比上年增长44%。棉花总产量11.47万吨,比上年增长72%。陕西确实肥了

12 龚育之

#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 12.1 标志“文革”的——开台锣鼓(即《二月提纲》,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与收场锣鼓(即《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

## (一)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那是1976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 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 1975 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

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7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

《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 （二）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1966年1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

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1月17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

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的美谈中的那一出戏)。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中宣部请示过、中宣部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1月18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 (二)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忆周扬》

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1月28日给彭真、定一、康生、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1月29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

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 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1月31日送上去的，是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第88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戏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查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

事?

此信写于1月31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2月1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毛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5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3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6日,许告诉林,在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

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8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12.2 整理毛泽东的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8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同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1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了。

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

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1966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

《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2月18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50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

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
>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
>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
>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

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5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1965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1956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1965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

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1966年2月3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2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2月6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1962年2月24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

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

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郦生上谒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 （十一）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

"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1965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现在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 (十二)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1964年8月18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1964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

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1964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1962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1964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一次是1941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比我在1964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1983年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

东选集》中选出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另外一次是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在1959年的《党内通讯》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1966年2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2月12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 12.3 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在当时还是被看作"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的

## （十三）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

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2月18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

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3月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

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要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3月3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 （十四）两个"南方谈话"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

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许也认为不必管它。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月1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胡绳这

话，有很大的份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这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7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所以，关锋、戚本禹

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 12.4 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们被作为"阎王"首先被揪出,我则作为"牛头马面",不久又升级为"判官"被揪出

### (十五)风暴的再起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我是在进入4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署的1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这两篇攻要害的文

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那篇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4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 1 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 3 月 17 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 3 月 28 日到 30 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

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1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1966年5月6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像"。范老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

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有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高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在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5月19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已经揭开

了。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13 李雪峰

# 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 13.1 1965年11月林彪让叶群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最后相信了叶群的话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

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 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 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 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

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 13.2 第一次杭州会议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

会。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没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 月 18 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 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0 日上午会议结束。

21 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 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

议

## 13.3 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要王任重整理主席的讲话，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但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

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他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讲些废话,"天热了……"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

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 13.4　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并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在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北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

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彭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5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 5 月 16 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

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儿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

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林对杨问题的讲法也同邓小平对我讲的不同。小平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有事。但是什么事，他也没有讲。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人，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

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 13.5 5月25日康生、陈伯达设圈套,骗我到北大讲话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

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

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聂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 不提倡写大字报；2. 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 要有领导；4. 要有步骤；5. 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适合？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

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 13.6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

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14 杨赞贤

# 红卫兵红场流血记

1967年初，中国一批留欧学生在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遭到前苏联军警的疯狂镇压，发生了"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今天，中国已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大步；苏联亦解体、分化。抚今忆昔，回首自己亲身参加的这件往事，豪迈和愧疚一起涌上心头……

**14.1 在苏军几名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将手举"红宝书"的我们、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等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于1月24日晚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中国火车回国。25日全天没有安排。1965年我们赴法国路过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这次还去不去呢？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是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文革"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此时再去瞻仰革命导师遗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决定25日仍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既然是一次"反修斗争"，就得有所准备，以免临事慌乱。大家心里清楚，当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1966年1月苏大量派兵进驻蒙古，并在蒙古积极建造军事基地；2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10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并限令在当月内离苏；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并通过反华决议。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国外，"红卫兵"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手举"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走进红场，抬的花圈中还有一个是献给被他们否定了的斯大林，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但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

不回避斗争,因此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在列宁墓前排方队时,让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站在队伍中间,身体高大强壮的男同学站在外圈。

25 日午饭后,约 12 点半我们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通知了苏外交部。车行 20 分钟即达红场。天气阴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零下 30 度。红场上参观者已经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在一名苏军少校的带领下,我们抬着两个花圈列队进人红场。等了一阵子,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又排上了几百名"参观者"(后来得知都是便衣特务)。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强迫我们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 22 页。"哗,每人都捧起了"小红书"。"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突然,两个军警冲上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前与苏军少校交涉。这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学接着领读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都是针对当时所称的"苏修领导集团"的。响亮的声音在红场上空回荡。苏军少校恼羞成怒,气得关上了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大批武装警察和我们身后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蜂拥而上,推推拉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把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架到红场中间,劈头盖脸地打,然后推倒在地,用大皮靴连踢带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冲上去营救,队伍散了。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士兵将我们和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及翻译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我们一个同志拳打脚踢,乱打乱撞。几个士兵把我们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有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女同学的小腿或腰部,扔进红场边上的雪堆里。最可憎的是他们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我们很多人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地上到处是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69人不论男女全遭毒打,30多人受伤,9人重伤。随行的女翻译高呼口号,苏方警察拉住她脖子上的围巾使劲勒。他们还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相机和胶卷。我们冲上去极力保护相机,才使记者摄下的苏方军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来。

约半小时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凶恶行径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帮助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 13 点 45 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时，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等口号，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驻莫斯科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使馆都分别派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表示同情和支持。

## 14.2 回国的旅途中传来周总理的慰问电，外交部抗议声明及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系列消息，更增加了我们进行绝食斗争的勇气

斗争在火车上继续进行。

1 月 26 日下午 3 点 50 分，我们 60 名受轻伤和无伤的同学乘火车回国(9 名重伤者另乘飞机)。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则包扎。一些无伤的，也都拄根棍子，故意瘸着跛着走路。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行。苏方则在我们前边用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驾"，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学生，弄得他们无可奈何。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的请我们讲昨天红

场斗争的真相，进行录音；有的用照相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仍是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昨天在红场上读的那两段，放声高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地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睬，仍使劲地读、喊、唱，吸引了许多旅客围着我们看。

中国火车在苏国土上行驶时，挂的是苏方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我们立刻派代表向苏方列车长及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上答应，但下一餐吃饭时，他们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方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再这样下去，就不给你们饭吃！"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大家一致决定绝食。我们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我们坚决不去餐车吃饭。就这样，我们60名学生和9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中国乘务员，此后再没有喝苏联一滴水，吃苏联一片面包。

27日，列车的广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的慰问电，传来了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还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大家万分激动，个个泪流满面，更增添了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30日晚7点抵达苏边境站拉乌斯基。在这里要进行出境检查。这里警戒森严，不许随便说话。我们哪管这些，这边

苏检查人员一上车，我们将包厢的门全部打开，接受检查；而另一个车厢的同学就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检查人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31日晨6时许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使馆的同志们带着面包、馒头、罐头等食品早等待在站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有毛泽东思想和全国人民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月1日下午2点，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我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红袖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棉帽子并放下帽耳，打拍子的双手戴着挂在脖子上的军用棉手套，显得笨拙而可亲可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誉为"反修战士"。

2月11日，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对这场事件的宣传逐渐冷清下来。

## 14.3 好在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上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将永不发生

抚今忆昔，那当年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意识到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就不该发生。从我们这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 1967 年 8 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遵照苏方的有关规定，在红场上没有读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举动，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

回想在巴黎时，虽然我们远离祖国，但每天晚上 10 点钟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从法国报刊上和广播电视中也不断看到和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及场景；在街上偶尔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的形势。无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组织曾牵头召开辩论会，辩论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退?"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中国部分留学生和进修生经充分准备到会发言,着力抨击"大促退"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对同学们更具有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说什么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生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革",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有极少数同学已经行动起来到使馆贴"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 年 1 月 18 日黄镇大使专程到留学生住地传达中央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文件时,同学们真是欢欣鼓舞,磨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战士要马上开赴前线一样。我们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的法国来到当时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正如同学们说,这是到了修正主义的老巢、反修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在红场上的行为,完全是国内红卫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国后我们的一位代表在向某高校作报告时说的:"红卫兵就是要杀向人类世界的蟊贼,涤荡一切残渣余孽,砸烂整个旧世界!今天,中国的红卫兵来了,来到了列宁身旁,带着毛主席的教导,怀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壮志,以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大无畏气魄,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猛杀来了!红卫兵威震莫斯科!"听,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情绪。在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绪支配下行动,不出事才怪呢。

当然,前苏联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两党、两国

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对中国留学生抱着敌意，军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说居心叵测，蓄意制造事端。对于赤手空拳、在列宁墓前只是念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书生们拳脚交加，大打出手，实属野蛮，有失人道。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也是咎由应得的。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我相信，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顶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将永远不再发生。

15 许广亮

# 九届二中全会见闻录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当年，我是作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两位中央委员的随员上庐山的，现将这次会议过程中我的见闻作些介绍。

## 15.1　只有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车辆与众不同。他们的车是从北京用运输机连同司机一起运到南昌，再送上山的

1970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为首长做警卫工作。8月17日，我正随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池明同志在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参加全军装备管理现场会，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张池明同志第二天赶回北京。当时现场会议还未开完，他又是这个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因此，商定请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同志主持会议。18日，我随张池明同志从沈阳乘飞机返回北京。回京后，才知道中央通知他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军委直属机关（包括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等）与会的中央委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因病请假的外，共有21人。根据军委规定：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两人可带随员一名。秘书、警卫人员、医生均可。这21名中央委员中有的3人带一名，有的2人带一名，带上庐山的随员共9人。总后勤部当时有第九届中央委员4人，除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张天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张天云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议。我是张池明、张令彬两位中央委员决定随他们上庐山做警卫工作的。我记得这9名随员中年龄最大的是陈奇涵上将的夫人，我年龄最小，那年24岁。8月19日作些准

备,20日上午乘空军专机苏制伊尔—18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到达武汉。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央委员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大约有五六十人。由于当时的九江机场还很小,不能起降大型飞机,所以送与会代表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湖北武汉或安徽安庆降落后,再换乘小型飞机到九江机场降落。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在武汉机场降落的。用过午餐稍事休息后,便换乘两架苏制安—24型小型飞机于当日下午3时左右飞抵九江机场。这个机场不大,跑道上的水泥接缝中还长着一些小茅草,看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并不多。会议已安排车辆送委员们上山。大部分车是北京吉普,也有江西南昌生产的一种吉普车,外型和北京吉普差不多。中央领导人用的车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卧车。只有林彪和叶群乘坐的两辆车与众不同。他们的车是从北京用运输机连同司机一起运到南昌,再由南昌经九江开上庐山的。他们的车都是美国造,一辆是“林肯”,另一辆是“凯迪拉克”。这种车的车身很长也很低,长度要比国产的大红旗轿车还要长一截,门窗玻璃都是墨绿色的,从外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据说,这是专门为他们进口的,当时,在国内很少见。

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乘坐的都是北京吉普。两名中央委员加一名随员乘坐一辆。上山的途中,在路边还临时设了两处茶水站,是临时用帐篷搭的,作为休息之用,帐篷内备有茶水和各种水果。从九江机场上庐山,全是盘山路,路面不宽,拐弯处弯度很大,又是上山,因此车速不能太快,大约两个小时到达住地。

## 15.2 大家分住在仙人洞附近山坡上的别墅里，平房每人一栋，二层楼房两人住一栋

庐山位于长江中下游九江市南侧，是驰名中外的避暑游览胜地，海拔近一千五百米。庐山山峦奇峻，苍松翠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经常雾气弥漫，处在茫茫云海之中。不仅从远处眺望庐山时隐时现，就是在山上行走，也常被雾气包裹。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大概是雾气太大，看不清的缘故。清风徐来，遍体浸凉，一早一晚凉气更大，真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

庐山上有许多漂亮的西式小别墅，军委直属机关的21名中央委员分别住在仙人洞附近山坡上的别墅里。平房每人住一栋，二层楼房两个人住一栋。9名随员分别与他们住在一起。这些别墅，建筑很考究，房间里的设备也很齐全，室外周围生长着古老的松柏树，粗壮的树枝像手臂一样遮盖在屋顶上，从山下往上看，隐隐约约能看见点点屋顶浮在绿海之中；从高处往下看，只看见茂密的树林，几乎连房屋的影子也看不见。大会为每栋房子配备了一名服务员。他们都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都很忠厚朴实，情绪亦十分兴奋，会前经过一些训练，为会议提供了优质服务。我们的住处设了会议医疗组，由广州军区驻江西某野战医院和南昌市某医院抽调的4名医护人员组成。

我们9名随员与21位中央委员同在一个餐厅用餐。这

是一个小餐厅，是专门为这21名中央委员服务的。他们21人分坐三桌，我们9人另坐一桌，伙食标准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我们这些随员都是跟随首长多年的秘书和警卫人员，还有一位是空军的医生，与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都比较熟悉，因此也都无拘无束，比较随便。他们餐桌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经常端到我们的桌子上来。

庐山地区盛产甲鱼、石鸡和蛇，几乎每天都有这些土特产做的菜。据说，为了保证供应，由某部抽调了一些战士到山上捕捉。别人都说鲜美可口，但我看那石鸡又大又黑，活像癞蛤蟆；那甲鱼的模样一看直恶心；再看那一米多长的蛇，装在铁笼子里钻来钻去，皮被扒掉了，尾巴还在摆动，叫人看了浑身发麻，所以，我在庐山的10多天里一口都没敢尝。

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8月20日或21日到庐山的。会前，代表们及随行人员都到庐山的风景区游览和作些会前的准备工作。风景区主要有仙人洞、花径、庐林、含鄱口、大天池等等，还有名贵的云雾茶场。特别是秀峰那气势磅礴的瀑布更加引人入胜。李白的脍炙人口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正是庐山瀑布的传神而生动的写照。

会议安排了摄影师在几个风景点为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照像留念，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把住址留给摄影师，一两天内就把照片洗好了并送到各自的住处。我当时在庐山照了很多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 15.3 会议的警卫工作很严密。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感到很惊讶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大礼堂开幕。会议期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分发文件，收文件，开会时为他们安排车辆，再就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由于我们的住地离开会的地方较远，因此，无论开全体会或分组会，都要派车接送，每两人乘坐一辆吉普车。九届二中全会的分组会是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划分的。部队的中央委员分别编入这六个大组。我负责的两位同志，张令彬同志参加华北组，张池明同志参加东北组，这两个组的会场相距不远。会议的警卫工作是很严密的。据说，从山下到山上有好几道岗哨，住地也有哨兵巡逻。在那里，只要首长的身体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有绝对保证的。因此，开会时随员可同车去，也可不去。一般开全体会时我都去，主要是想去见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北京经常能见到周总理等其他领导人，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所以开全体会时我必去。把首长送到大礼堂后，就到礼堂后台进门处的路边上等着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一般都是在会前一两分钟或正点到达，毛主席一到会议就开始了。

中央会议的保密性很强，出发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保守机密是我们警卫人员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不仅开什么会要

保密，就连到那儿去、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能对外讲。到庐山之后，也很严格，会议要求，没有要紧的事，不要与外地联系，即便是有要事需要联系，对外也不能说是庐山，只能按照会议规定的代号，对外统称200号。但会议对我们随员都很信任，有些工作交给我们做，如文件、简报的分发，都是我们经手分送的。会议期间，21名中央委员的文件、简报，是由中央办公厅用一个信袋装好，密封后直接送给随员中一位空军首长的秘书。他启封后不再密封，由我们分发给各自负责的中央委员。这类文件几乎每天都有。说实话，出于好奇心，我们在分送过程中也顺便翻阅。因此，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从文件和简报中随时就知道了。如收回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等。当知道这些消息时感到很惊讶，随员之间私下也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当从简报上看到揭批陈伯达之后，很想去看看这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挨了批之后是个什么模样。有一天，我便随车去开会的地方，看到陈伯达耷拉着脑袋，慢慢腾腾地蹒跚而来，都快到点了他才到会，这和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气劲可大不一样了。

## 15.4 全会闭幕后规定不准带会议上发的任何文件、材料，就连委员们自己的笔记本也必须销毁，几乎连张纸片都不准带走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结束时，关于携带文件的规定特别严格，与过去不大一样。以往中央全会、中

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通常是发给各部委、各省、各大军区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一整套会议文件,由与会同志带回,传达给本单位的党委常委。这次会议规定,除了只准带一份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外,不准带会议上发的任何文件、材料,就连会议中委员们自己的笔记本也必须上交或自行销毁,几乎连张纸片都不准带。所带回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必须以见报为准,报上没发表之前也不准公开。因此,临下山前,首长要求我们,庐山发生的事,回到北京后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准泄露。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大约在 1970 年 10 月初,军队各单位传达到军以上干部,随后开始学习讨论。开会的地方是很严密的。为了尽量缩小知情范围,中央决定,各单位在学习期间上报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不准打字员打印、铅印,也不准让没听传达的人经手,只能手抄上报。为此,总后勤部在这个期间里上送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简报,是由总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亲自起草,总后党委常委讨论定稿后,晚上由我在张池明同志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工工整整地誊清后,再由那位政治部副主任密封,经保密室发送。直到 197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传达给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在这期间,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保密程度是相当高的。

还有几件事值得一记。庐山上有两个人工湖,水清见底,游鱼可数。其中一个湖很大,毛泽东主席就住在湖畔上的一

栋房子里。为了隔热，屋顶上又搭了一层席子，毛主席经常在这个湖里游泳。湖里还有两艘汽艇，上边有几名海军水兵。据说，这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安全的。另一个湖比较小，就在仙人洞的附近。这个湖边上停着两架云雀式直升机，飞行人员经常在机上维护飞机，并往飞机周围的土地上洒水，以免起飞和降落时尘土飞起。

在会议开幕前，庐山的商店还组织了一批廉价商品，是江西省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供应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如：手提式樟木箱，规格大小不一，有四五种；景德镇瓷厂生产的造型美观的台灯和其他瓷器；南昌纺织厂生产的棉毛衫、棉毛裤。由于价格特别便宜，所以大家都争相购买。后来，听说是周恩来总理发了话，就不再卖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江西省革委会关于找到大盐矿的报告作了批语。报告说，今年3月江西省九〇九地质队在江西省会昌县周田公社找到了一个大盐矿，地质储量初步计算为19亿吨。从见矿到出盐，只用了47天，结束了江西无盐的历史。9月2日，毛主席作了批语："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19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语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印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同志。并送给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工作人员每人一袋精盐，塑料袋上用红字印着毛主席的批语。据说，当时这个盐矿被命名为"九二盐矿"。

这已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未作任何记录，全凭记忆写下这篇短文，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权供读者参阅。

园 丁

# 军报变相停刊事件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军报》的领导班子,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如同《红楼梦》中甄士隐所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领导班子,虽然也经过审批、任命手续,但其名称或叫"总编小组",或称"领导小组",没有社长、总编之说。

冬去春来,到了1973年,经过"批林整风",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基本上都恢复了工作,有些冤假错案开始得到了平反,报社的形势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在这种形势

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将军，派出工作组来到军报，广泛听取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总政党委于1973年底提出了一个报社正副社长等领导班子的名单，经军委讨论批准后，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都画圈同意。

但是，这个领导班子不合"四人帮"的意，原来窃居军报领导小组的造反派成员，在这个班子里消失了，只保留两人任党委委员，"四人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块舆论阵地了。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突然袭击：先是出了若干题目，比如巴黎公社是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又是发生在哪一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写出来的，等等，让军报的华楠社长当场回答，说是"我要考一考你这个总编辑"；继而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指着华楠说，"你这个军报的总编辑，中央没有批，是军委批的"随后，"四人帮"派出亲信到报社，对编辑部和军报印刷厂的一些人"交底"，说报社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复辟的班子"，是"修正主义回潮"的产物，煽动他们起来贴大字报造反，与此同时，江青又派人到她抓的所谓"两个点"——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和38军某部八连，传达她的指示，要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看军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找出问题，通过记者告诉我，或者直接给我写信"。"四人帮"就是这样，一方面派人来报社煽风点火，一方面操纵连队来"轰"军报，内外夹攻，双管齐下，妄图把刚刚上任的报社领导班子搞垮。在他们的导演下，发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

## 16.1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1974年1月2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会议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等人留下，说是要谈谈"宣传问题"，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鲁瑛等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张春桥接着就点题了。他说："最近，军报有篇谈批评与谅解的文章，1月17日发的，是很怪的。《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它。"

王洪文也凑上来帮腔："《解放军报》突然发了这个，写得很坏。"

张春桥还说："很多事是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们，才知道什么报上有什么文章，有什么人讲了话。"

军报究竟发了篇什么样的文章，惹得"四人帮"要大动干戈？

这是一篇不到1500字的部队来稿，介绍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标题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发表在《党团生活》版。文章介绍这个厂的党委："以前他们开展党内批评，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争论个'你是我非'，结果不但是非'断'不清，还使党委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后来，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批评

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讲批评能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讲谅解又能避免无原则纠纷。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错误。"四人帮"所以要拿它开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这篇短文是根据周恩来在空军党委一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的。周恩来在讲到党委内部、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时,强调要"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前面提到张春桥讲的"有什么人讲了话",就是含沙射影指的这件事。

## 16.2 《这样介绍"体会"对吗?》是怎么出笼的

鲁瑛从江青、张春桥那里领受了任务后,就布置在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蹲点的记者"找几个战士来写",实际是由记者捉刀代笔。这样,一篇由四个战士署名、题为《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的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很快摆到了江青的案头。

1974年2月9日,江青很高兴地看了这篇文章,立刻批示张春桥、姚文元:"我看这几个战士是勇敢的、对的。请你们二位把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我看可以发表。"

姚文元比江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批曰:"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考虑由《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军报可能引起国际上某些反映,是否可先登《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汇编》上,再由《人

民日报》告军报加一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请江青同志酌（文字推敲由两报共同负责）”！

江青于2月10日对姚批写了“同意”二字。

根据江、姚的批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140期上刊登了。

2月12日，王洪文在这期《情况汇编》上，作了如下批语：“请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

这一系列“批示”完成后，鲁瑛出面了。他给军报打电话说：“你们1月17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说，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

军报的老总们当然只能奉命照办。“四人帮”以四个战士的名义炮制的《这样介绍“体会”对吗?》连同军报公开作自我批评的编者按语，刊登在军报1974年2月15日一版头条位置，占了近半个版的篇幅。透过这篇“来者不善”的文章，军报编辑部从上到下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篇文章的炮制者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抓住“怪”字大做文章，一连指出了《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好几个“奇怪”，但中心在于指责这篇“体会”，离开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讲党委如何在事关大局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是宣扬以讲谅解来达到所谓团结，实质上是在宣扬中庸之道。文章质问说：“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这样来介绍‘体会’是为了什么？是要批判中庸之道，还是要

保护中庸之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进，还是磨灭工农兵斗争的锋芒，阻挡运动的发展？是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合，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经过这么一问再问，"上纲上线"，一顶特大号的政治帽子就戴到了军报的头上了。

在那个蛮不讲理的年代，当然不能同"四人帮"去讲理。军报的老总们只能违心地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自我批评"。在这篇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按语中，他们"承认"："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讲团结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传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作这样的宣传……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 16.3　张春桥等就是要给军报强加一个"有意对抗中央"的罪名

从这以后，"四人帮"又接二连三地对军报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

1974 年 2 月 27 日，军报在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通讯，介绍民乐县武装部长自觉同旧传统观念"决裂"，不为三亲六友"开后门"的事迹。就文章谈文章，这篇通讯的内容是无可挑剔的。没想到，它却被江青、张春桥诬为"有意对抗中央"、"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

“转移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引来了一场围攻军报的大字报风波。

发表一篇宣传“不为个人谋特权”的通讯，何以会招来如此大的罪名？这还要从当年江青主持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说起。

1974年1月24日，即农历正月初二，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突然召集军委系统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的干部，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的主讲人是迟群、谢静宜。他们讲了一通批林批孔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之后，又抓住军队一个高级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上大学一事，煽动群众“反走后门”。两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江青和姚文元也不时插话。由于毛泽东当时要求的“斗争大方向”是批林批孔，他对突然搞出来一个走后门问题颇为不满，斥之为“形而上学猖獗”。中央还为此下发了一个1974年8号文件。

如果说有人“干扰了斗争大方向”，始作俑者也是江青等人。但他们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扣到军报的头上来了。

最早抓住这篇通讯“做文章”的，是江青派到38军某部八连蹲点的那个人。他看了这篇通讯，立刻召集也在这个“点”上的团报道组开会，经过一番指点，一篇题为《解放军报个别人究竟想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就出笼了。大字报称：“军报在中央下发8号文件之后，发表了《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文，继续反对特殊化，是妄图调和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把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扑灭。”

江青得知这篇大字报的事情后，很快派了两个人到这个

连队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江青同志看过八连对解放军报2月27日一篇通讯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后讲,这篇文章是对抗8号文件的,我们没有看出来,包括我在内,八连同志看出来了。"还说江青希望他们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解放军报社那里去,要联系过去解放军报社一个阶段不批孔,一个阶段批林批孔不结合,这一阶段又干扰大方向的情况。

不久之后,江青又窜到这支部队的领导机关,接见大字报的作者。江青兴高采烈,说大字报"写得好"、"水平高",又是握手,又是照相,又是送书,又是拉到身边吃饭。在谈话中,江青还阴阳怪气地给这个部队不同意用大字报形式反映意见的领导,扣了许多大帽子。在江青的淫威下,部队领导不得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并由蹲点的军、师、团三级领导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这张大字报以八连的名义贴到军报后,当晚10点钟,江青又派两个人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解放军报2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八连的几个战士对这篇文章写了批评信,认为在中央8号文件下达以后,发表这篇文章,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八连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去贴了大字报,一个副社长出来接待,讲了一些话,说连队到军报贴大字报,没有先例,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最后还是贴上了,贴得高高的。江青同志说:八连和六连都是我的点,搞得都很好。六连要支援八连,六连要去几个同志,去贴大字报。解放军报社的斗争是复杂的,八连的大字报贴出以后,触动不大,盖子不大好揭。军报引导方向,这是关系到几百万人向哪里走的大问题,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重大任务。"

六连听了传达,当然得闻风而动。第二天上午,一张支援八连、声讨军报"个别人"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的大字报,贴到了军报办公大楼三楼的正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编辑部各处、室自然不敢袖手旁观,也纷纷张贴大字报,表态支持八连、六连的大字报。处理那篇通讯的有关领导,被迫一一作检讨,检讨到"实际上起到了干扰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对抗了党中央指示"的程度,也还是通不过。张春桥责令追查,报社向他报告:已经做了调查,没有查出是"有意"的问题。他阴阳怪气地反问道:"难道是无意的吗?!"可以看出,张春桥就是要给军报强加一个"有意对抗中央"的大罪名

## 16.4 江青要该连官兵替她"经常看军报","要找他们的毛病"。并说"军报内部有坏人"

3月10日,已是深夜零点25分,江青又派专人给八连下达指示,要该连官兵替她"经常看军报","看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江青说:"军报内部,阵线不明,可能有坏人,看报要经常发现问题。军报、大字报都可以去看嘛!连队派两三个同志,能看出问题的。记者也可以一块去,看有什么问题再贴(大字报)嘛!你们除通过记者渠道外,还可以写信,给我写信。两个点的同志都好嘛,都是看出了问题嘛!谢谢大家,问大家好!"

在江青的煽动下,3月13日,又以八连的名义,张贴出一张题为《根子在哪里?》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军报,3月

9日把延安枣园军民批林批孔的消息，同成都部队某部九连在原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与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的消息，并列排在一版，又给军报扣上了“干扰批林批孔”、甚至“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得惊人的政治帽子。

大字报指责说，军报“个别人”把延安枣园同刘文彩庄园相提并论，两条消息同样是愤怒控诉和批判，而且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用了“怒火熊熊”这样的文字作标题，这“实质上就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真令人哭笑不得。用“怒火熊熊”来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就是影射攻击毛主席？报道军民在原刘文彩庄院里批林批孔，就是肯定地方资产阶级专政？……

这张大字报还指出，军报在3月1日头条位置发表了工程兵某师勤务连一条批林批孔的消息，是公然支持这个师的负责人“分裂中央的反动行为”。帽子大得也够吓人的。不了解内情的人会感到莫名其妙。

事情的原委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看到江青在那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叶帅作指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曾在下面议论过：江青以什么身份给叶帅作指示，她代表谁讲话？迟群、谢静宜在军队有什么职务，为什么敢那么讲话？……这番议论被反映到一期内部简报上，王洪文、张春桥就给这个师政委扣上了“分裂党中央”的帽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的这番议论，只是刊登在一份绝密级的内部简报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军报3月1日关于这个师的勤务连批林批孔的报道，使用的又是阿拉

伯字码的部队代号,从编发这条新闻的编辑到审定稿件的报社领导,当时都不知道这个连队是工程兵某师的。由此可见,倘若没有了解内幕的"高参"加以指点,一个连队的大字报,是难以发出此类炮弹的。

与此同时,一个上通王洪文,下联军报造反派,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也窜到军报煽风点火,说什么:"我是来放炮的。中央首长指出了工程兵某师领导分裂党中央,军报又宣传这个部队,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同中央唱反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他的煽动下,有人在全社的干部大会上向报社领导提出质问,造反派则乘机要挟党委必须给军委写出令有关领导停职检查的报告。一时间,乌烟瘴气弥漫报社。

## 16.5 1974年"张春桥、王洪文的"3·11接见"后,军报丧失了发稿权,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

1974年3月11日,张春桥、王洪文以军委名义召集军报的领导和群众代表,听取关于批林批孔情况的汇报。他们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利用插话的形式,态度鲜明地为军报的造反派打气撑腰,声色俱厉地训斥不合他们胃口的群众代表,打报社领导班子的闷棍。

汇报会一开始,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张志按照汇报提纲刚开了一个头,张春桥就打断他的发言,让他"不要照稿子讲,离开稿子汇报"。张志只好不看提纲,继续说下去。说

了还没有两分钟，张春桥又发话了："我看你不要讲了，听群众代表汇报。"

张春桥的这个下马威，当然不是偶然的发作。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那个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就向军报造反派交底："你们的大字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锤，要集中力量攻张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盖子的关键是张志。"于是，一张揭露张志是报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大字报就出笼了。既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怎能容他在这里汇报呢？

群众代表，名义上是各处、室支部推选的，但造反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在汇报中，向张志和报社的领导班子猛烈开火。

有的代表汇报说，张志在领导报社运动中，不批陈（伯达），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三年"极左"。张春桥马上插话："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批群众。"王洪文接着说："这是苏修的调子。和苏修一样，和美帝一样，和蒋介石一样。"

当有人汇报说，张志批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这个口号时，张春桥说："张志，你是怎么批的？我考一考这你这个副社长。毛主席批的是'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小将讲的是'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是完全正确的，有什么错？！"王洪文则厉声质问："无产阶级能打天下，就不能坐天下？还能让给你们这些老爷坐？！"

有人汇报说，报社的领导往往是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这本来是顺着王洪文、张春桥的调子批军报领导的，说他们运动来了约束一下自己，运动一过就又复辟

了。谁知张春桥认为说得很不够,凶神恶煞地说:"什么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你们军报天天在搞'复礼'!"王洪文也跟着吼着叫:"早就'克己'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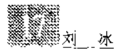
当有人汇报说,报社经常有流言蜚语,说什么"老帅舌战群儒",张春桥立刻冷笑着说:"就是叶帅战姚文元和我喽!"之后便厉声说道:"从你们汇报的某些人,要看到大的阵线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点名就是点的我们这几个人,这不是很清楚吗?他们不是批我们几个人,是批毛主席。我们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你们不要上当。"

这时候,又有一名群众代表发言了。他汇报的内容和调子同前面发言的不一样,矛头没有指向军报领导,而是指向了报社党委中两位造反派人物,诉说他们是怎样阻挠批林彪的,同时揭露了他们的一些劣迹。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造反派身份的代表没让这位同志把话说完,就立刻起哄、围攻,说是"造谣"、"诬蔑"。张春桥不仅不制止起哄的人,反而声色俱厉地呵斥这位汇报者说:"你不要说了!你已经表演够了!"

当有人又汇报起军报连续出现《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和《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类的"错误"时,张春桥说:"你们这些问题是对抗中央,是路线问题。你们报社的问题还是党委的问题,现在这个党委应当批判。"接着就宣布:"我们几个人商量过,可不可以采取你们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华社的怎么样?"他口气上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就是宣布决定。这样,从1974年3月12日开始,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丧失了发稿权,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

这就是"四人帮"一手导演的所谓"3.11"接见。接见之

后，不仅报纸变相停刊，1973年底刚刚建立的报社新领导班子自然也就被搞垮了。




刘 冰

# 冒险上书揭发迟群

## 17.1 迟群、谢静宜封锁邓小平的讲话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周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从1975年1月到8月，小平同志有许多重要讲话，提出各项工作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派性，要落实党的政策，要建立一个“敢”

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真知灼见，受到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是，在清华大学，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大都被迟群、谢静宜封锁了。他们公然不顾党的原则，要我在向下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之前，先报告他们，经过他们同意。这显然是针对小平同志来的。对于他们这种违背党规的要求，我当然不会照办。我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同他们进行斗争。7 月 14 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和吕方正在市委听了传达后就回校传达了。

8 月中旬，学校教改处的负责同志在市委听了小平同志 8 月 3 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说："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听了汇报，我认为讲话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对学校工作，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决定按市委规定，于当天下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学校，他们安在党委办公室的"钉子"向他们报告了下午传达邓小平讲话的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邓小平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时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

诉我们就传达呢?"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这明显是无理取闹,以势压人。我压着怒火,先请她坐下,然后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议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吗?"在我的强烈反驳下,谢静宜语无伦次地喃喃地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你应当先告诉我们一声。"我回敬说:"传达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呢?难道就因为没事先告诉你们吗?"谢静宜无言以对,气呼呼地甩了甩头发,站起来扭头走了。

已是中午12点钟,我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遇到迟群,互未理睬,我径直走出了"工字厅"。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从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发表后,迟群、谢静宜在谈话、讲话中经常赞扬张、姚的文章,宣传文中的论点,尤其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然而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他们则千方百计实行封锁。两者相比,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何等鲜明!谢静宜今天的无理取闹,不正是他们的自我暴露吗?

## 17.2 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杀"了出来，决定由我挑头上书毛主席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党委副书记、工宣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当时，他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议论和责骂。1975年，小平同志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在迟群手下工作，感到要贯彻中央精神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以来，他患了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

(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大家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当前两种思想、两种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曾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他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他改弦更张。李兆汉认为这种办法不可用,没有上级领导的介入解决不了问题,唯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反映迟群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是毛主席抓的点,是"斗、批、改"的样板。向中央写信要避开"方向""路线"问题,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线索,集中反映迟群有野心、骄横、搞阴谋诡计、破坏民主集中制等个人品质和作风上的问题。

就这样,1975年7月,柳一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告发迟群问题的构思形成了。对此,李兆汉、任彦申起了重要作用。随后,柳一安找惠宪钧、吕方正商议,意见完全一致,并决定联合上书。

7月下旬,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会间休息时,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把我拉到休息厅一旁的座椅上,告诉我,他们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要犯错误,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是位老同志,信得过,因此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早就考虑同迟群、谢静宜要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有想好斗争的方法,此时三位宣传队的负责人"杀"了出来,真是太好了,"正合吾意"。我当即下定决心要与江青在清华的哼哈二将公开较量,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他们三位的主张,并自告奋勇,由我来牵头。

## 17.3 我们在校内的行动处处受到迟、谢亲信的跟踪监视

政协礼堂的干部会后,当天晚上在惠宪钧的办公室,我们四人就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要以迟群为重点。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到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虽然有看法,如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等,但信上很难说清楚。要抓主要问题,要实事求

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了保密,草拟信稿要在晚上8点钟以后,在主楼接待厅进行。关于信的内容,我们商定,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他的政治野心;他毫无党的观念;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些问题都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用事实说话。稿子写好后,标题再斟酌。信稿由吕方正执笔,集体推敲修改,最后由我修改定稿。为了尽快拟就初稿,我们让吕方正利用他将要调回部队的机会,回到家里集中时间赶写。老吕抓得很紧,三天就写出来了。然后我们用了两个晚上集体研究、逐条推敲,着重把事实说清、说准,不说虚话、大话,最后我又用一个晚上改了一遍。第2天,我们到惠宪钧原单位卫戍区一师的招待所,四个人字斟句酌地又改了一遍。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给主席反映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粗心和不实。

当时之所以去这个招待所,是因为我们在校内的行动受到迟、谢亲信的跟踪监视,校外也想不到适当的地方。惠宪钧受我们之托,向他们的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沅说明情况,请求帮助。这两位同志非常痛快地表示:向毛主席反映江青这两位横行无忌的干将的问题是大好事,我们支持。他们立刻嘱咐招待所腾出专门房间,派出专门人员热情接待,并准备午餐。这一难得的支持,在当时不仅对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重要,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我至今也忘不了这两位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好同志。

信稿审定之后,由惠宪钧交给军代表安恩奎同志,嘱咐他尽快复写几份,争取尽早发出。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

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1974年我去看望耀邦同志时，他曾问到过迟群、谢静宜的情况，他表示这两人年纪轻是优势，但太骄傲，狂得很。我当时意识到，他指的是1974年1月这两人与江青一起，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大放厥词之事。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市委科教组。但考虑到谢静宜也是个市委书记，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 17.4 胡耀邦建议我将信直接送到邓小平家去，并告诉了邓小平的住址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李昭和子女都不在，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耀邦上班去了，你到房间里休息一下吧！"一边说一边领我穿过院子，来到过厅旁边的书房里。我问："星期天还上班呀？"她说："耀邦、李昭星期天都上班。耀邦中午也不回来，带个饭盒，让人给热热就当午饭了。他呀，对自己严格啊！"

老太太离开后，我靠在沙发上，陷入了往事的回忆：1964年我来看耀邦，那时他兼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因为对农村"四清"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受到批评、责难和排斥，回京呆在家里。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我说："对基层干部要有正确的估计。在我们党领导下，大多数基层组织，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遍地是虱子，到处有问题，我们党在农村取得的伟大成绩怎么解释？！我历来主张对人对事要公道，要实事求是。"1974年我来看耀邦，他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了好几年，那时还未分配工作，又呆在家里。见到我，他说："我没

事就看书、想问题。王明路线是1931年到1934年共四年，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四年多一点。这两次都使我们党受到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到的损失比王明路线还严重。这是教训啊!"耀邦同志的深刻分析，至今言犹在耳。就是这次谈话，他说到了迟群、谢静宜，想来他不会料到，今天我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两个人的事。我见他书桌上放着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走过去翻了一下，看到书中用红铅笔划了圈圈杠杠之处，多是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很显然，他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联想到1974年我来看他时，他正在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在书中划了许多圈圈、点点、杠杠。那次他就是从这本书说到王明和林彪，说到他没事就看书、想问题。现在他有事干了，更是要看书、想问题了，这是耀邦的习惯，也是他的性格。

"啊!刘冰来了!"是耀邦亲切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我说："4点钟我就来了，你星期天还上班?"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你有什么事?"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耀邦从茶几上拿了一支烟，边找火柴边说："记得去年我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的他们那些事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吸了口烟，接着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

他。他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他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他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时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他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你从邮局寄也行。""我怕信件遗失。""那不会的，你寄好了。"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那你就寄嘛！""不能寄，我不放心。"他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街××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

你大胆些,怕什么!"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在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车子到家门口停了下来,我还坐在车上,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8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了。"接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9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

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他转告清华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

## 17.5 迟群这些露骨的活动，表明他已经嗅到了或听到了什么，预示着他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

1975 年 8 月份以来，迟群很少再同我们研究工作，连正常的书记例行办公会也不开了。但上万人的大学，各种问题必须及时处理，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必须有序进行，领导机构不能正常运作，这怎么行呢？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商定由我以常务副书记名义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直接研究工作。每次这样的会议商定的事，我们都向迟群写出书面报告，但每次他都要寻找“理由”加以推翻。与此同时，他连续两次甩开其他书记和宣传队负责人，私自召开宣传队会议，煽动攻

击校党委其他领导人。第一次是全体宣传队员会议，他亲自出马讲话说："我们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有人要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第二次是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他指使一个亲信去讲话说："现在有人反对迟群，大家知道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个亲信还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迟群这些露骨的活动，表明他已经嗅到或听到了什么，预示着他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

已经是9月了，无论是主席还是吴德那里仍然杳无音讯，怎么办？我们不能再坐等了，需要走出去打听消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北京市城建委主任杜春永同志家里。这位老同志曾在河南和我一起工作过，比较熟悉，我向他坦率地讲述了迟群、谢静宜的情况以及我处境的困难，并打听市委对清华的看法。他告诉我各方面对迟群的反映都不好，问我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当我告诉他已向吴德报告了时，他劝我耐心等待。

又是一个星期天，纪登奎同志的女儿纪南来看我。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是许昌地委书记，相互来往较多，现在纪南在清华学习，常来看我。但她今天来，似乎有点神秘，小声说："刘叔叔，我爸爸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把她带到我的卧室兼办公房间，请她坐下来，慢慢谈。她说："我星期六回家，爸爸问到了刘叔叔，并让我告诉叔叔，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爸爸还问候刘叔叔好。"这表明，纪登奎这位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对于我们青年时代的友情还没有忘记，我打心眼里感激他。纪南毕竟还是个孩子，我不便再问她什么，也不便向她谈什么，只是请她转告我对她父亲的感谢和问候。纪南传递的信息，无疑对我们是重大的鼓舞和支持。我向惠、柳、吕三位通报了这件事后，我们分析，纪登奎的这些话，起码说明他对迟群、谢静宜也是有看法的，有极大可能他已知道了我们写给主席的信，这也从侧面说明，主席是会支持我们的。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同迟群、谢静宜斗争的信心。

几个月来，从外校不断传来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干部会、教师会、汇报会、座谈会等各种场合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其中许多观点都是与迟群、谢静宜尖锐对立的，因而受到迟、谢的严密封锁，在清华公开场合看不到也听不到教育部长的这些重要言论。

9月下旬，柳一安得到一份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传抄稿。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我们认为这是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发出了整顿的号令，教育战线有希望了，清华有希望了。要整顿，在清华首先就要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我们读到这篇讲话真是高兴极了。可惜是传抄稿，不能向下传达，但我们估计正式文件会很快下来。为了防止迟群的亲信扣压文件，我每天都到机要室去询问中央和市委来文的情况。

9月27日下午，市委科教组电话通知：30日晚周总理举

行国庆招待会,清华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研究确定,将名单报科教组。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科教组汇报过迟群的问题,科教组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 17.6 我们决定写第二封信,要把谢静宜也挂上

过了国庆节,小平同志在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文件仍未发下来,我们告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

10月5日上午,迟群突然通知开书记会。奇怪的是,不是书记会议成员的几个迟群的亲信也来参加了。来者不善,

但他们要干什么，不得而知。迟群宣布开会后，他的一个亲信首先说："应该研究一下形势，根据形势研究工作。"我问："研究什么形势?"迟群说："校内外形势都可以研究。"那位亲信接着用挑衅的口气说："我看先从学校说起。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党委的领导班子就有问题，有走资派。这种人表面上装着革命，背后在搞鬼，并且越来越不象话，大家要提高警惕。"这些话显然是对着我和惠宪钧、柳一安来的。我想既然你们"开了第一枪"，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说："刚才有人说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我们领导班子里有走资派，确实如此，这是客观存在。因此，我提醒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新的情况。现在我们班子里的走资派有新的特点：第一，这种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爬上来的；第二，这种走资派用革命的辞藻唱高调，讲大话，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把自己伪装起来；第三，这种走资派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笼络人心；第四，这种走资派政治上野心勃勃，想掌握大权；第五，这种走资派一直在搞欺骗党的活动。这表明在新的情况下，产生了具有新特点的走资派。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识破他们，揭露他们!"我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对那位亲信的回敬，也是对迟群的鞭挞。我已下定决心，准备与迟群恶战一场。迟群坐不住了，面红耳赤，用苦笑来强装镇静。可以看出，他没有料到我敢这样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也许是毫无准备的缘故，他忽然转题了。

我们送上去的信仍然没有回音，而迟群已公开叫阵了，该怎么办? 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上封信遗漏的，要详细补上；要比上一封写得更具体，要把迟群这两个月

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一桩桩都写上;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只是仍然不要把她与迟群等同,要有区别。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头一封信出了问题。

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他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

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他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并且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刘 冰

# 我竟成了“右倾翻案急先锋”

## 18.1 被告审原告，会场上只要我一说话就遭围攻，就有人起哄

1975年9月间，我们发现迟群在宣传队的活动不正常，曾经考虑过在干部中揭发迟群的问题。但又考虑到他那样做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错对错，去做违背原则的事。10月5日迟群公开挑衅以后，我们在发出第二封信的同时，考虑到在

斗争的紧要关头给少数干部就迟群问题的性质打打招呼，这不违背原则，而是捍卫党的利益。于是我们分别找了系党委书记以上的几位同志，提醒他们保持警惕。遗憾的是，这件事我们做晚了。

11月3日下午，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叩门说：“3点钟在第二教学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请他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分析，召开常委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很可能与我们的上告信有关，那就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正在这时，迟群到我办公室来了。他倒背着手，大摇大摆、喜形于色地提高嗓门说：“啊！你们都在这里。”我问：“你干什么？”他说：“3点钟在二教楼开常委会。”我说：“你不是已派人通知我们了？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他讨个没趣，溜走了。我看看手表，离开会还有10分钟。你一言，我一语，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按惯例径直走到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坐。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北大的人。今天的会非同一般，大概是两校党委联合批斗我们。怎么办？运

用我多年挨斗的经验应付就是了。3点1刻，吴德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这位我们盼望了70多天要求接见而不予理睬的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今天总算见到了。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了回来。看到他与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了。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批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哪些话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由迟群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大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但迟群事先布置的喽罗们不断对我围攻，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

念完了信，接着是对我们的批判，发言者不用说都是迟群、谢静宜事先布置的。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

法反对毛主席”,等等。我申辩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正是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诚。信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迟群的一个亲信说:“我可以证明,他们信中说的什么烧被窝、摔杯子等等都是编造的,我天天在迟群同志那里,我怎么没见到。”这时,吴德火上浇油,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话,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的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失去了自由。我慢步走出第二教学楼,和老惠、老柳相互握手示意,目送他们两人并肩朝“工字厅”方向走去。11月初的北京,6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 清华园的天空灰蒙一片,北风阵阵,寒气袭人。我独自沿着二教楼到甲所的小路,翻过土丘,朝十公寓方向走去,沿途一些教师和职工或站在路旁默默地看着我,或向我点头示意。一位穿着工作服的同志问:“你推着车为什么不骑呢?天气冷,赶快骑上回家吃饭吧!”同志的关怀,温暖了我冷却的心,我说:“谢谢你,我想这样走走。”这位同志陪我走了一段,他要到公寓食堂吃饭,向我握手告别了。多好的同志啊!遗憾的是因为天黑,他的模样我没有看

清，也不便问他的姓名，至今我不知他是谁。

回到家里，苗既英第一句话就说："一切我都清楚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我用温水擦洗了一下手脸，坐在饭桌旁。端起饭碗，看着满面愁容的妻子，我一边吃、一边在想：真是患难夫妻啊！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女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父母又要遭殃了。吃了饭，我们来到我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她让我躺下，盖上棉被，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听我详细讲述下午会议的情况。她毕竟是经过风雨、受过磨练的女同志，没有流泪，也没有惊慌，镇静地说："给你扣的帽子，真要都是主席的意思，那也没办法，说明主席也会有错误，起码是听了谢静宜一伙的片面之词；要不就是你们错了，但错在哪里呢？难道对错误的东西向主席报告也错了吗？我看我们于心无愧。我们对党、对主席是忠诚的，不然为什么写信呢？我们挨了那么多斗、吃了那么多苦，对主席的忠诚坚定不移。我们冒着风险给主席写信，不是表明了这一点吗？现在主席不相信我们，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总有一天主席和党中央会弄清谁忠谁奸！"我说："你说的我赞成。今天吴德讲了一大篇，最重要的是要大家搞清问题的性质。他对迟群、谢静宜亲切地称呼同志，亲热得很，而对我们一句'同志'也没有称呼，就是说问题的性质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给我们扣帽子'反对毛主席'，这大概就是吴德引导大家讨论、辩论的目的。吴德不原文传达主席的批示，其中有鬼。我猜想他可能和迟群、谢静宜商定用这种办法把那些支持我们的干部暴露出来，不然为什么要大家辩论问题的性质呢？"苗既英说："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主席批示中有对他们不利的地方，他们就根本不传达呢？"我说："这没

有可能,谁也不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分两步,先是讲得含糊一些,用'放'的办法把想揪人的都揪出来,然后再正式传达。"她说:"既然这样,要不要告诉你打过招呼的同志,防止上当?我夜里可以到他们家透个消息。"我说:"不能这样做,这会被人抓辫子,只能靠他们自己了。我希望他们与我划清界线,而不要为我辩护。这样他们可以少受点罪。"她问:"明天干什么?"我说:"明天仍然全天开会,估计明天的会是交待和揭发。"她说:"凡是揭发,只要是事实都表示欢迎;胡说八道,恶意攻击,那不行,要反驳。要你交待无非是围绕着告状信的活动,我看他们问什么,就说什么,信已宣读了,没有什么秘密,光明正大。只要我们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能站住脚。"就这样,一直讨论到 12 点钟。她劝我多吃点安眠药,加大剂量到三片,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明天的斗争。也许是挨斗的次数多了,经验多了,有点不在乎了,但更可能是绝望后无可奈何的缘故,思考停顿,反而坦然了。吃了安眠药,没多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两张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我看完大字报,到座位上刚坐下来,突然来了两个我并不认识的人说:"这不是你的座位,你的座位在中间。"我看到会议室中间摆了三个凳子,这无疑是我和惠、柳三人的座位。我当然不会听从那两人的指挥,看了看手表,才 7 点 50 分钟,开会时间未到,便站起来又去看大字

报。8点整、迟群、谢静宜罕见地早起，来主持会议了。被告审原告，难道主席允许这样做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思想“凝固”了。我和惠、柳二同志挤在会议参加者中间坐下来，等待着。

迟群宣布开会了，他说：“昨天吴德同志传达了我们主席的批示精神，刘冰宣读了他们的信，大家应根据吴德同志讲的精神展开辩论，对他们的信可以提问，可以批判，刘冰他们也可以申辩。”讲得冠冕堂皇，但都是鬼话，骗人的！会议全过程没有任何一点点民主。迟群、谢静宜的吹鼓手、《走资派还在走》大字报的署名者在会上“独领风骚”。他肉麻地吹捧迟群、谢静宜对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说迟群“夜以继日地工作”，谢静宜“带病工作”，追问我：“你刘冰为什么不顾事实反而诬告他们，你目的何在？”我说：“目的就是要毛主席知道情况，为了清华的工作。”那位吹鼓手嘶哑着嗓子嚷嚷：“不对！刘冰不老实。他是为了篡权！他想当党委书记，复辟旧清华，搞修正主义！”会场上不管是我还是老惠、老柳，只要一说话就遭围攻，就有人起哄。11月4日全天的会是这样，往后的会也是这样。所谓辩论，就是批斗、围攻；弄清问题的性质，就是给我们扣上“反毛主席”、“正在走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这就是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吗？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会议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1300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

## 18.2 列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说我写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钟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这莫名其妙的通知，引起了我的疑虑和紧张。我叫来既英，把电话说了一下。她问："现在到人民大会堂干什么？"我说："我问她，她回避不说，这必有鬼。今天是批斗我们的第13天，什么'罪行'都揭了，什么'帽子'都戴了，反毛主席、反党、反革命，总不会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吧？唯一的可能是要我到那里先谈话后逮捕，这是个骗局！"苗既英说："这是真的吗？能这样吗？"我说："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呀！"她哭了，泪水成串地流下来。她说："我们对党忠心耿耿，怎么是这个下场！我们往哪里说理呀！"我说："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她擦了擦眼泪说："我们也别太老实了，你现在立刻离开北京到老家去，这是他们逼的。我留在家里，一切由我顶着，要抓他们抓我。孩子都大了，我们没什么顾虑，总不能株连九族、抓孩子吧？"她已经没有眼泪，脸色镇静而坚定，从心里吐出的铿锵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到她不再像一位普通妇女，而是一名视死如归的

战士。我说："我赞成你的精神，但是不能走，走了反而又多一条罪状，最终还是我们遭殃。我考虑还是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他们要我到哪里就到那里，就是死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得把我们这一案搞清楚，几十年后还得平反。现在你作好一切准备，如果我被抓，你要给孩子们通个信。"我看看手表，时间已到，拿上大衣，准备下楼。她从口袋里拿出些钱交给我说："你带上，我下楼给你煮几个鸡蛋。晚去几分钟，他们能怎么样，你晚饭还没有吃呀！"我找个本子，把钢笔灌满墨水，口袋里装了两个煮鸡蛋，7点零5分离开家。她送我上了车，在握手分别时，她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开车的司机很严肃，好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一路无话。我集中思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想，如果有人跟我谈话，我还是实事求是，如实回答，正像苗既英说的，要光明正大。如果不讲理，要抓我，那我也没办法，就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让时间为我讨回公道，换回胜利。正想着，车子突然停了下来，我才发现已经到了人大会堂的北门。下了车，我向门内走去，哨兵拦住问："你哪个单位的？干什么？"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哨兵说："你跟我来。"刚进门，一位穿军服、干部模样的人，让我随他走进了东大厅。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接着谢静宜来了，我想，大概就是他们两人加上吴德、迟群跟我谈话吧？我看墙壁上的挂钟，差5分8点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

议了,也顾不上多想,就走到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帮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8时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又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毛远新慢腾腾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我说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

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而喝点水或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说都没说。大约 11 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 8 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来想去，觉得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大概该我检查了。但如何检查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我说："想过，是有错误。"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但我想不能怨他，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

感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冤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过了一会，她抬起头，镇静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停了一会，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80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她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我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过几年再说，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她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想主席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些鸡毛蒜皮，给主席派来的干部罗织罪状，然后给自己戴一顶‘诬告’的帽子。”她说：“不能过细检讨，不能戴帽子，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我说：“戴顶帽子，将来也要

翻案。"已是3点钟了，我们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苗既英这年夏天进城开会，下车时摔成脑震荡，好几个月不能工作，从10月下旬才开始半日工作。昨晚彻夜未眠，头痛加剧，上不了班，只好请假。在家里她用长布条勒住脑袋，躺在床上，考虑我的检查。我自己一整天呆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了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不检查，会有损主席的形象和威望，我决不愿意那样。检查吧！可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把没有的事安在自己头上不是自欺欺人、欺骗主席吗？主席说我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申辩又有何意义？翻来复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晚7点我离家时，苗既英一再交待我"要冷静"，说话要留余地，尽量不要给自己戴帽子。我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来到。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邓副主席宣布开会后，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

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信要由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看看周围没人回应，我呆不住了，要求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然后，我概括地讲了五个意思：第一，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第二，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第三，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第四，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以处分；第五，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

扭头一看，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少有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贡献。怎么能因为送了一封党员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一瞬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呢？这不是信口开河，以势压人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在第一线领导教育工作的部长竟如此不尊重，随便给人戴帽子，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棍子、帽子一齐打来，可以看出，有的政治局委员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 18.3 迟、谢以两封信为突破口，从清华点火，烧向全国，掀起"文革"中的另一新高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在此之前，党委扩大会议已连续开了17次，都是以"大辩论"之名行批判围攻之实。这次万人大会，按迟群们的说法是"在全校范围开展大辩论"。会上先由吴德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随后是对两封信的批判。对于两封信如何批判？看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只传达批示，不宣读信文说不过去，宣读信文又怕他们的丑事传出去。于是想出了"读一段，批一阵"的办法，使人不能得到连贯、完整的印象，并以批判湮没事实。同时他们又想出了布置人作伪证的"高招"，以颠倒是非。这次会上准备了15个作伪证兼批判的发言人。虽然这些人经过训练预演，但历史不容篡改，会上的表演漏洞百出。迟、谢以假乱真、掩人耳目的伎俩未能收效，聪明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把两封信分割开来一小段、一小段地念吗？大学生们就一小段、一小段地记录下来。他们不是念上几分钟、批上几十分钟吗，大学生们就利用这几十分钟，仔细回忆、仔细核对记录。他们批判了一整天，学生们记录、核对了一整天。就这样，两封信的全文一字不漏地被记了下来，传了出去，散发到全国。至于那15个作伪证兼批判者的发言，则很少有人记，也很少有人传。

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 吴德讲话中说:"几十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人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迟群、谢静宜于12月10日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的骗子嘴脸。《报告》中说:"我们在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真是十足的政治骗子!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没有一句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迟的一位亲信说他"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那张"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迟群同志从来

没有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呀,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更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真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撒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我们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下来,传播开来。

全校大会后,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苗既英脑震荡的后遗症加重了,整天头痛、头晕,不能上班;但不准她请假,还要她上全天班。"革命左派"的迟、谢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运用自如。随着对我的专政,对苗既英的残酷折磨也加紧了,非要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每天四次来往于十公寓到"工字厅"的路上。正常人这段路只需要步行15分钟,她要在路上休息几次,要用40分钟,每天160分钟,有几次她晕倒在路旁。无奈只好写信要我的一个侄女来京,天天搀扶着她上班。也就是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三位同志被拉到各系轮流批斗,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罗列的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教育革命的帐"、"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党、反毛主席"。就在发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四人的同时,开始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数力系馆前和"同方部"院子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并逐渐扩展到新

水利馆院子里。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每天大批人马人山人海涌向清华园。常常像耍猴一样，把我们拉到大字报区，名曰“看大字报”，实则是让人们进行围攻。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呆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是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她是跟着爸爸来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的。他们先到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握住小米的手说：“谢谢你和你爸爸了！”我重复着这句话，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

来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练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送走项小米已快5点钟了,系里还没有来找,看来下午的批斗可以幸免了。根据这些天的经验,晚上10点前如果没人来找,一般当天就不再有什么批斗会了。这天晚上快11点钟了,有人来叩门,但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我有点奇怪,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斗的经验,我机警地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去开门,准备着被带走。开门一看,是我的小老乡、工程物理系学生宋章元。我请他进到房里,坐下后他说:"我今天夜里专门来看看你。"他问了我的身体后说:"你们四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许多人把你们的信用复写纸复写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性质,同学们在宿舍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话都是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宋章元同学的消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一叶知秋,人心的向背是很清楚的。

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还组织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提审。这种提审不同于批判大会的主要之点是,提审者人数很少,追问很多,比如追问我为什么找胡耀邦送信而不找别人?为什么要邓小平转信而不找别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我怎样解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迟、谢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他们是要我供认邓小平、胡耀

邦是我的后台。不要说这样严肃的问题，即使是一般的事，没有事实，也不能胡说八道，我只能实事求是。每次提审，他们怀疑地问，我如实地讲，每次都以骂我不老实而告终。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文明一些。

1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高级领导干部130多人参加的"打招呼会"。接着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转发了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中进行讨论。《讲话要点》转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要大家认识，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是在更大的范围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迟群、谢静宜早就在清华说："抓住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从清华点火，烧向全国。

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段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

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显然是由迟、谢乃至江青一伙策划的，是企图将清华正在进行的大批判扩展到整个教育战线。在清华，开始时只是批判刘、惠、柳、吕四人，11月19日起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开始了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没过多久就给我们扣上“翻教育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帽子，说我们“要搞修正主义”，“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并把我和周荣鑫同志连在一起进行批判。

自从开辟大字报区以来，迟、谢们加紧组织力量书写大字报，不断扩大大字报区，一排一排张贴大字报的新席棚扎了起来。除了通过北京市继续组织市区各单位人员来校参观外，他们还运用“四人帮”的淫威，强令各地方的领导来清华参观。迟群等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极力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论据，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场狂风恶浪推向全国。

李昌

# 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

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时，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实事求是，大胆进行全面整顿，而科教整顿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我有幸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参加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现在邓小平同志走了，回忆这一段工作经历，小平同志的思想哲理、果断决策和听取群言的伟大形象和高尚风范，我终生难忘。现把亲身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供同志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学习邓小平文选作参考。

## 19.1 和胡耀邦一起受命整顿中国科学院。当时分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传达邓小平的指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

1975年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之后，10月又派王屏和刘华清参加整顿工作。邓小平同志认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分管科学院工作，在胡、李、王到科学院工作时，他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去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当时是三科（科委、科学院和科协）合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科技办公室管原属科委管理的部分日常工作，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在科学院办公；科学院主办有迁往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科学院的政治情况是"灾情"严重。

在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精神被否定。(1)"四人帮"帮派分子认为科学院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科学研究工作是"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要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反动观点"，他们把爱因斯坦视为"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此批判"相对论"。(2)"四人

帮”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1位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3)科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十名。(4)“四人帮”帮派分子夺权,科学院遭受严重破坏。1965年科学院拥有106个研究所,24714名科技人员,基本形成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究中心。1967年“四人帮”帮派分子夺取了科学院的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科学院,但“造反派”始终在领导层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此期间科研机构出现了大的变动。一部分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一部分下放地方、一部分科研机构被撤销,到1973年,除43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外,直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仅有13个,多年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相当大的部分散失损毁了。真是遭了一场大劫。

7月18日,胡耀邦和我们到科学院之后,在与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和极“左”思想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中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向中央、国务院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的建议。10月,党中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了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王屏任政治部主任,曹冠群任副主任。废除了“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组织的做法。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整顿指示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了。

## 19.2　胡耀邦提出科学院要以科研为中心。我们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

胡耀邦和几位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整顿科学院的指示精神，深入各所召开各种座谈会，针对实际，发动反“左”的错误和反派性活动。胡耀邦在1975年8月15日召开的有邓述慧、贾国玉、卢盛奎、林文成、王声孚、陈本明、常龙存等参加的座谈会上，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思想作风的整顿包括：(1)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科技路线的认识；(2)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3)划清正确与错误的干部政策的认识；(4)科技战线政治工作的原则，即政治工作要为科研的中心服务。党性和党风的整顿，包括：(1)分清党性和派性，如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2)什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应怎样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3)什么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我们哪些地方违背党的纪律；(4)各级领导班子的作风，是否应该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分清大是大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好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能从正面或迂回地引导明确在科技战线上执行的正确路线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大方向。

首先，胡耀邦为首的科学院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理论论断如“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

伟大运动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作依据，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纠正一系列荒谬观点。我们还强调指出不能把科学实验等同生产斗争，而取消了科学实验。科技是人们通过观察、实验、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科学实验，就是联系实际。不能在"开门办所"的口号下，强迫科学研究人员都到工厂农村去，更不能把实验室拆掉办工厂，压制、扼杀科技人员开展业务和探索自然科学理论。当然，科学实验运动包括专业队伍和工农兵群众两方面，但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

其次，自然科学既然是认识和改造自然，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自然科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属于生产力，它本身不包含阶级斗争，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不能实行"全面专政"，不能把科技人员变成专政对象。

第三，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提法，强调要重视人才，要奖励出成果。当时，有人说某某人是走白专道路，胡耀邦在8月19日的座谈会上说："我不那么看。他科学上有成就，国际上把他的成就叫'×氏定理'，政治上没有资产阶级派性，不争官，争权，争名，争利。当然，不是说他没有弱点。说他'白'，他有可学习的地方。什么叫'白'？我看，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才是白而不专。"我们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者复查，落实政策，尽量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在座谈会上，胡耀邦还说："拜托大家帮助一下，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

……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科学院在四个月的整顿中,落实政策的达800多人

第四、重视和强调发挥研究所所长的作用。胡耀邦在10月31日座谈会上说:"要重视选拔业务干部","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支持他们大胆放手地抓业务工作,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负责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

第五,我们明确:研究机构要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研究工作是中心,政治思想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一星期政治学习和活动不要超过3个半天。胡耀邦用生动和率直的语言,强调要把科研工作搞上去 他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作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遗传所汇报时,又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 这个必须弄清楚"。他还说,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

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0月中旬，他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号召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他说：“长征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胡耀邦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2500多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现在看来，除了对现代化要求有些过急而外，讲话的内容是正确的，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胡耀邦提出的“新的长征”的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 19.3 《汇报提纲》被诬为“三大毒草”之一，邓小平下台，我们也被停职反省

到科学院后，我们抓紧调查研究，准备向国务院汇报，特别是胡耀邦集中力量，起草《汇报提纲》（原名《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以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开始由胡耀邦提出分几个部分，由我、王光伟、胡克实等分头组织起草

草稿,再由吴明瑜和罗伟作助手,按胡耀邦的意见,进行文字综合,最后由胡耀邦分章、分节、逐句、逐字定稿。"汇报提纲"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几经修改后报送国务院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讨论《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现将我们的汇报和邓小平的插话和讲话,作一一回忆。

开始胡耀邦按《汇报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邓小平同志插话:"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胡耀邦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1)科学院系统,(2)国务院各部、委、办系统,(3)各省、市、自治区系统,(4)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研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邓小平同志插话:要加上国防工办单位,全国应加在一起。国防工办主任方强补充: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万6千人,其中科技人员48000人。)胡耀邦继续汇报说:科技路线的任务,第一,是为生产需要服务,第二,是发展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研究基础科学。(当问到什么是三大前沿科学时,王光伟回答三大前沿科学就是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

胡耀邦汇报科技路线时,讲到现在又红又专,不敢讲红专。(邓小平同志插话: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说清楚。)进口科技资料,很少有人看,每年用8百万元。(邓小平同志问:这不包括军队的?还是全部的?高教部负责人周荣鑫说:全

部的。)

胡耀邦汇报科学院整顿说：一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胡乔木补充：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大家不满意。(邓小平：怎么会满意呢？)胡说到科技人员生活时，(邓小平同志：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修房子。)胡汇报到落实政策时，(邓小平同志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说落实，他搞他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的问题了。)接着李昌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二是想在怀柔办一高等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三是办进修班，把各行各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四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邓小平同志插话："不懂外文，你搞什么情报；没有数理化，你名字叫高中、大学毕业，你怎样搞自然科学！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不但懂外文，也得有基础知识，不然外文的东西也翻不出来了。")当李昌讲到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和稍后于光远又提出办自然辩证法刊物很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组织起来。(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插话说，你们为什么只搞一个？当然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主席对《化石》都有批语。刊物太少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水平低一点不怕，慢慢提高。没有刊物也不好发现人才，教育人、发现人。)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同志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

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千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这种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他是学部委员，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邓小平同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

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思想整顿关键是5千，不是4万5千(指科技队伍)，是班子。领导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技路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不就是这些人嘛。

邓小平同志又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提当所长？40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40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后勤很重要。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保护好；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搞不起来。科研机构，包括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个部分，无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搞科研的人整天东跑西

跑。所谓整顿班子要包括这三部分人。搞后勤的人也得学科学知识，不懂科学知识，搞后勤也不行。挑选些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搞后勤。

邓小平同志说，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三套人，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里。外行要热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后勤工作。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科技人员，那些有前途的记下来。15 万人有 4 千人也好。也许有几十个人有成就的，就了不起。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发展条件。不管资格老不老。1957 年我在苏联，尤金说：苏联搞原子弹，就是三个无名气的、其貌不扬的人搞出来的。不是大科学家，是三四十岁的。"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注意，创造条件，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分居要帮助解决。

邓小平同志还说，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好些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七·二一职工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教师要提高地位，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如果我们工厂自动化水平要提高，就是要增加科技人员。提高数量，提高质量，自动化提

高,体力劳动减少。世界上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都是走这个道路。这些是不是劳动者?

小平同志说:《汇报提纲》送主席批准,政治局传一下,国务院批准。

《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让再作些修改,把有些太尖锐的话去掉了一些,但原则要保留。并让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进行修改,然后报呈毛主席。我记得胡乔木召集研究室领导同志和胡耀邦及我讨论过如何修改。胡乔木对《汇报提纲》作了较多修改,题目也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分三个部分,即:(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抹去了"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和科技队伍"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明确鲜明的论断。(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学技术路线,就是按着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语录,编为科技路线的十条。(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但就是这个修改稿,也没有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问题出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说,他记不起说过这句话。查对 1963 年参加毛泽东主席听取科技规划汇报会的韩光、于光远等笔记,发现毛泽东同志讲科技重要性是有的,确实没有讲过科技是生产力。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本来就不注意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

卷第116页)。这次稿子也胎死腹中,没有发布全国。所以,毛泽东同志犯"左"的错误,推翻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后来又发动和领导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其祸根都是他的深层次弱点,即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是否认科技是生产力的。

就在11月初,邓小平召集一次打招呼会,有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主席的联络员)和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刘冰及我参加。事先通知我们,要准备检讨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由邓小平同志转交)矛头是指向他的。江青张牙舞爪,大肆咆哮,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流"、翻案风。接着胡乔木检讨了一翻。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才,我们要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从高中毕业生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出大字报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被停职反省。

## 19.4 斗争中有的被定为反革命,有的被非法拘留,横遭迫害

风云突变　在中央打招呼会议、胡耀邦和我停职反省后,"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几员干将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造反派头头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四人帮"在清

华大学的干将谢静宜、迟群和他们串联，说："教育界的翻案风"是从科技界刮过去的，而科技界现在的阻力很大，我们要来支持。科学院的"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把"汇报提纲"送审稿，私印2000多份散发作为批判靶子，还把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邓小平同志的插话记录，偷偷送往上海同伙，他们印成白头文件发到一些基层"供批判用"。殊不知《汇报提纲》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散发到广大科技人员后，人们将其和"文化大革命"一比较，心里就明白：正是《汇报提纲》，说明了十七年科技战线执行的是正确的科技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整顿科学院，开拓着科学发展的光明前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和群众运动冲击科研，恰恰是损害和毁灭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汇报提纲》在广大科技人员心目中，并不是毒草而是香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并不是谬论，而是合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为国、为民、为党的金石之言。

正、反不两立。"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篡党夺权同邓小平领导整顿科学院的尖锐斗争急剧发展。"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认为"整顿就是复辟"，1975年中央派几位领导干部到科学院工作，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1976年2月，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他们策划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成百名记者，《人民日报》预留版面，准备大肆宣扬。在这次批斗会上，胡耀邦因病未到场，李昌被造反派押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后，到会群众要求认识一下被批判者。当李昌从台上站起来时，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李昌被要求下台到场绕行一周，群众纷纷向他投去

亲切的目光和微笑，表示欢迎。批判开始后，与会者纷纷退场。"摄影机摄下的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使'四人帮'极为难堪的场面"，"四人帮"打了一场大败仗。

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科学院广大职工十分悲痛，而"四人帮"限制吊唁周总理的活动。激起群众的不满。"四人帮"的诸种倒行逆施，使人民的义愤不断增长。4月4日是清明节，人们习惯为逝去的亲人扫墓，天安门广场成为千万人奉献花圈的白色海洋。这是一场痛悼周总理、冲击"四人帮"，实质上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运动。4月5日"四人帮"强行拆除花圈和逮捕抗议的群众。当时"四人帮"还掌握实权，"四五"运动被确定为反革命运动，并撤销邓小平同志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那些悲壮的日子里，多少革命同志成群结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多少家庭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我们各单位的广大群众同首都人民、全国人民一样，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主动精神和路线斗争觉悟。同志们不顾"四人帮"和他们在科学院的党羽的威胁和刁难，纷纷走向天安门，送花圈，献挽诗。全院的花圈有154个。一〇九厂的广大职工早就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6年2月，他们到"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清华园贴下了大标语，勇敢地提出要用"梁效"展开辩论。他们义正辞严地责问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在《参考资料》上刊登诬蔑周总理的文章。1976年4月3日，他们抬着花圈，举着大幅诗牌，穿过王府井等市区，走向天安门广场。诗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火与剑一般的诗，反映了

人民的心声，刺向了敌人的心脏，迅速传遍了北京城，传到了祖国各地。“四人帮”对一〇九厂广大职工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00 人的工厂，被捕的有诗的作者宋胜均和常存玉、李龙坎等三位同志，隔离审查和停职的有 17 人，办“学习班”勒令交代的有 30 多人，重点审查对象 70 多人，还有所谓重点知情人，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一〇九厂的广大职工继续英勇地坚持斗争，不屈不挠，不愧是我们的“四五”先锋！

情报所的郑殿珍同志，因为散发天安门诗抄而被捕入狱。当时她爱人在国外工作，抛下了两孩子无人照顾。计算所共青团员杨建国等同志采集了鲜花青松，精心制作了花篮，送到了天安门。他们在悼辞中写道：“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愤斩祭周公。”就因为这首革命的诗篇，杨建国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逮捕入狱。计算所共青团员孙卫国同志，半导体所的吴佐明同志，高能所的迟延昆同志，计量院的刘建新同志，图书进口公司的朱福铮、肖祖武同志，地震局的梁鸿光、丁荣生同志等，也都因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有的被定为反革命，有的被开除团籍，有的被非法拘留，横遭迫害。

“四人帮”为了诬陷邓副主席，千方百计想从邓副主席女儿邓楠同志身上下手。公安部派工作组到半导体所搞清查，他们没有抓到邓楠同志的把柄，就把同邓楠同志一起工作的冯应章同志隔离起来，妄想从这里逼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他们的卑鄙阴谋遭到了冯应章等同志的坚决抵制。

周总理去世后，根据广大团员和青年同志的共同要求，科学院团委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毅然收集和印发了回忆周总理的学习材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和宋克荒等同志，同七机部五〇二所的同志一起，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收藏和征集的诗词编印成集，发行量达20多万册，在革命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还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七机部五〇二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和哲学所的同志们一起，从多方收集到的1万多幅照片中，精选出五百多幅编辑成《人民的悼念》画册。不少同志把抄的诗词，拍的照片，想方设法珍藏起来。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到了1978年11月，"四五"运动终于平反了。人民胜利了。《人民日报》11月26日报道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庆祝"四五"运动伟大胜利，表彰"四五"运动英雄大会。大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科委副主任蒋南翔主持，我作了报告。科委副主任武衡代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宣布"关于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同志平反和表彰'四五'英雄的决定"，大会授予一〇九厂一面"'四五'先锋"锦旗。

"四五"运动为"四人帮"灭亡和形成我们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了准备。

## 19.5　5月12日，邓小平在他的西山住所召见方毅和我，作了一次关于整顿科教的重要谈话。随后又与中央两位同志作了类似的谈话，这些即是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1月，中央派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日常工作，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3月经中央批准，郭沫

若继续担任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方毅、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担任副院长,郁文任秘书长,方毅任第一副书记,李昌、胡克实、武衡任副书记。王屏仍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有钟炳昌和曹冠群,副秘书长为刘华清、秦力生、童大林、刘春、李苏、高登榜、甘重斗、赵北克等。应该说,中央为科学院配备的领导班子是相当强的。

方毅到科学院工作后,重点抓了对科学院"四人帮"黑爪牙的揭发批判。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自1月25日开始,共开了16个半天,于2月16日结束,方毅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四人帮"长期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乱党、乱国、乱人民,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在我院的黑爪牙紧跟"四人帮",配合"四人帮",搞的是同样货色。我们同"四人帮"及其黑爪牙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实际上已经篡夺了院核心小组的权,完全窃取了院政治部的权,并且控制了院机关党委和一些局、所的领导权。经过4个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恶劣本质的识别能力,要把斗争继续引向深入。我们决定:(1)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院核心小组要充实专案组和加强领导。(2)对于参与阴谋活动的人数不多的一批骨干,各所各单位要组织专人,展开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争取他们尽快转变立场,深入揭发,交代问题。(3)加强专案审查与群众揭发、批判、斗争的结合。

在"四人帮"爪牙实际上篡夺了院核心组领导权期间,核心组一些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与"四人邦"爪牙的性质不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王光伟自己检查主持核心组工作期间,屈服压力,放弃原则,

丧失立场,拱手让权,犯了方向性、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

方毅说:这次在党的会议上,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十分必要,对今后的工作,对犯错误的同志本人、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在狠抓革命的同时,必须猛促科研。最近召开了支农科研、富矿会战、地震工作、重点光学装备、强激光等一些会议和960路微波通讯国家鉴定会,开得很好,很有必要。希望各单位大力加强业务领导,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做好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5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西山住所,召见方毅和我,作了一次关于整顿科教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相同,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标题,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小平同志谈话坦诚而深刻,有深远的意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整理当时我作的笔记,供同志们参考:

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召见我们作这次谈话呢?"四人帮"覆灭,中央将恢复小平同志重要领导职务,他关心科教,找我们两人先谈谈意见。

下面是小平同志的谈话的部分内容,是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的补充。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为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研机构,要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这非常重要。邓楠在半导体所,那里还是没有好多工作,后勤跟不上,现在还没放下心工作。

领导要抓重点。科学要抓重点研究室、重点项目和重点

人。要注意解决科技人员的衣、食、住、行、用的困难。开个名单,先解决一两千人的。出成果,有成就的是几百人。科学院一家不要改动工资制度,用补贴也可以。先解决重点,告诉群众,大多数会赞成的。还有些老工人很重要。二机部、七机部有直属工厂,科学院也有吗?

现在各部门的国内、国外资料都不交流,搞什么保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你们说:《中国科学》美国翻译出版,人家并不是学我们了不起的东西,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的实力。一个时期,科技人员连发明权都没有。有些发明,明明是科技人员搞的,也不说是他们搞的,要承认事实嘛!(方毅说到吴仲华的成果,中国未用,外国用了。)科技成果如何用,要管。要创造条件,提出建议,在哪个方面用,在什么地方用。要不然,外国人用了,自己还没有用。黄昆适宜搞半导体研究。如果他现在还是改行搞别的,不能发挥他的长处,就可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陈景润有百把个,有什么不好?他对国家有贡献,对无产阶级做好事!杨乐、张广厚这种人要团聚起来。这些人政治上要热情帮助,家庭困难要切实解决。

有的专家过去写文章批判过我,他们是被逼迫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请转告他们,不是背包袱。

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说是臭老九,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就有科学实验。科技人员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然他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

"四人帮"恶意诬蔑说，这是三株"大毒草"之一。

据说，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科学新成果，政府头头每天办公室都放有一张每日科研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落后了。据说美国农业部的资金，90%放在科技研究上，项目分得很细，还依靠每个州的农业大学解决问题。日本的工厂，科技研究都占重要位置，产品质量就高。

工业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科技经费有些可放在各行各业，要占他们生产收入的一定比例。整个国家的科技经费，国务院要规定在财政中占有一定比例。资料、仪器可进口一些，急用的先买。

聂总主持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是成功的。今后还是要搞规划。

抓科研，就要抓教育，培养人才，后继有人。国务院要把科教两个部门一起抓。

日本明治维新后打胜仗，国家发展起来了。他们总结说是办好国民教育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他们搞军国主义和我国不同。但抓好国民教育是重要的。小学要办好，学制5年，搞点劳动，重点在学。劳动可到工厂摸摸机器，有的到农村去劳动，知识面广些，理论联系实际。

学校也要抓重点，办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对教师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要提高，使他们心情舒畅，培养年轻的人才，各部门学校科技队伍也就有来源了。想抓科技上去，不办好教育，就没有前途。

方毅到科学院，听说一开始不那么受欢迎，贴大字报，欢

迎胡耀邦回去，方毅到科学院后说，科学院群众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觉悟高；群众就欢迎了，是这样吗！

为了使邓小平同志整顿科学院和开展科学研究的思想得到落实，6月20日至7月7日，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有352名代表出席。会议讨论和肯定了方毅的工作报告，讨论了《1978年至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郁文作了说明），还讨论了有关筹备全国科学大会的若干问题。"报告"和"纲要"确定了科学院的5个重点科研项目，为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科学遥感技术、激光技术。同时，要重点抓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即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关于调整科研机构的发展和布局，健全科研机构的领导体制，加强后勤工作，办好科技大学，大力培养人才等，特别是有计划地选拔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到国外考察、进修、留学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邓小平同志整顿科学院，开拓科研新局面的思想逐步具体化了。

## 19.6 会后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要他们解放思想，厉行整顿，办好教育

1977年8月4日，邓副主席邀请了部分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参加的有吴文俊（科学院数学所）、马大猷（科学院物理所）、郝柏林（科学院物理所）、汪猷（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钱人元（科学院化学所）、邹承鲁（科学院生

物物理所)、张文佑(科学院地质所)、叶笃正(科学院大气物理所)、黄秉维(科学院地理所)、王大珩(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严东生(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王守武(科学院半导体所)、许孔时(科学院计算技术所)、高庆狮(科学院计算技术所)、金善宝(农林科学院)、黄家驷(医学科学院)、沈克琦(北京大学)、何东昌(清华大学)、潘际銮(清华大学)、苏步青(复旦大学)、吴健中(上海交通大学)、杨石先(南开大学)、史绍熙(天津大学)、唐敖庆(吉林大学)、苗永宽(南开大学)、查全性(武汉大学)、程晋(西安交通大学)、沈其益(华北农业大学)、宗永生(中山医学院)、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等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30人。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的负责同志方毅、李昌、武衡、胡乔木、童大林、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于光远、邓力群、雍文涛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小平同志说:到会的看来多数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看来有希望。前一段我没有工作,一个人胡思乱想,与方毅、李昌、邓力群、于光远吹了一下,我觉得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要从科研、教育着手。我出来后主动要求抓科研教育,中央批准了。方毅和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说我撑他的腰都可以。这个会我有时间就到。会议请方毅同志主持。小平同志在会议开头和总结时讲话都整理到《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我在这里作点补充。

会议反映的意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苏步青说,复旦数学所他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人,"四人帮"分子把人调出去,只剩2人。现在形势好了,但缺少25岁至35岁的人。搞

基础理论要靠年轻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温元凯、黄家驷、查全性等都提出把“文革”前在高校学过几年基础课的人择优再培养。唐敖庆说：今年到美国考察了几个月，科技水平，美国还是先进的。我们和他们的差距：①是科学实验手段美国是当前70年代水平，我国高等学校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代的水平。他们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的自动控制实验操作程序；广泛应用激光等新技术；把各种分析、鉴定和处理数据的仪器会成一个系统，实现高速化、自动化。②专业科研队伍的数量和业务质量我们相差较远。美国的重点大学把很大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例如麻省理工学院，8000名学生，研究生占4000人，加州大学总校28000学生，8000是研究生。③基础理论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比我们大。当唐谈到教学质量时，宗永生、汪猷、邹承鲁、何东昌、王大珩等依次插话，热烈讨论，一致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工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困难，基础课水平太低。

对科研工作，严东生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说：制定科技规划，要依据：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②注意我们国家的特点；③是要参考借鉴国外技术发展趋势。关于科研组织管理，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浪费，要组织好社会主义大协作。要把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区别开来，生产不能代替科研，科研实验没有过关的东西，就拿去生产，必然要失败。引进新技术，要很好地加以消化，真正做“一用、二批、三改、四创”。不能只测绘人家新产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

不可能做到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叶笃正、邹承鲁说,防雹工作要在成雹机理、消雹规律的研究上下功夫;治肿瘤,也要搞基础研究。杨石先和很多与会者都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委,归口管理全国科技工作。邹承鲁还提出必须制定全面的科学发展规划,对我国科学发展作出全面的安排。科研人员至少要保证每星期有5天以上时间搞科研。他还呼吁加强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生产。

程晋和潘际銮说,现在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高等院校应当是国家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可在高校建立研究所(室),有专门的科研编制。黄家驷说,要明确医科院的方向任务,调整医学科研机构,加强医学科研队伍和有计划地改善现有的设备和图书馆条件。

会上对教育工作,意见集中而尖锐,一是"四人帮"说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是修正主义黑线专政,大家强烈不满;二是对大学招生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办法,大家认为不妥,需改正。胡健中、潘际銮等都说,"文革"前17年到底黑在什么地方?哪些是黑的,哪些还是正确的?"文革"中的十一年,招生走后门,教育制度搞乱了,学生的政治质量业务质量都下降了,还说成绩很大?何东昌等都对学制年限、专业设置、教学工作积极发表意见。金善宝说,教育和科技是孪生兄弟,科技是红线,教育也应当是红线。

査全性和邹承鲁对招生的办法,提出立即改进的意见。他们认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教育部现行招生办法"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是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大家反映激烈,要求立即改正。

小平同志在结论上(见《关于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有关意见》,《邓小平文选》二卷),讲了有关意见:对建国以后的17年估计,这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对全国教育工作,我看,主要方面也是红线。科学研究要靠教育输送人才。要办好教育,要尊重教师。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大学教师少,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教师是脑力劳动者,要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关于科教体制、机构问题,关于后勤工作问题,关于学风问题;还有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问题。这些在邓选中有雄文在,我不赘述了。我要着重说明的是查全性提出要求,立即改进招生办法。教育部同志说今年改正时间来不及了。会上提出可延迟半年招生。小平同志当即点头赞成。大家的心融在一块了,大学招生的改革,提前了一年实现。小平同志的当机立断,英明果断,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

会后小平同志又找教育部同志作了谈话。帮助教育部同志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厉行整顿,办好教育(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科教座谈会后科学院立即着手进行了两项大的教育工作:一是在1977年9月5日向国务院作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1)扎根安徽,办好中国科技大学;(2)继续执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要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3)加强基础课教学;(4)学制定为5年,主要招收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招高中文化程度、有志自然科学研究、有培

养前途的其他优秀人才。要自愿报告，严格考核，政治审查，择优录取；(5)学校规模定为学生5千人，研究生1千人，现校舍12万平方米，至少再建18万平方米；(6)在北京设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暂定规模一千人；(7)领导体制，是中国科学院设在安徽的重点大学，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由安徽省委领导，业务行政工作主要由科学院负责。二是9月10日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提出：今年暂定招收研究生300人左右。关于培养目标，学制和分配，研究生的招收，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的待遇，都有适当的规定，这两个报告得到及时的批准和执行。这就是说，在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方面，当时科学院是全国的排头兵。我记得后来邓小平同志曾表扬过中国科技大学办得好，特别是创造性地举办本科少年班受到他的赞许。

## 19.7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诗人的手笔描绘科学春天的到来

1978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由副总理兼科委主任方毅主持，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得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他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

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是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现科学原理，发明先进技术，而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力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他论证了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脑力劳动者；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绝大多数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还阐明红专的标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科研机构的领导体制和加强党的领导；评定职称；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选派留学生等一些方针和政策。

总之，他的讲话澄清了科教战线的路线是非，明确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团结、动员科教战线解放思想，轻装前进，为我国科教发展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我在大会汇报了科学院贯彻中央指示，整顿工作的情况。4月1日《人民日报》以"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为标题作了突出的报道。下面是报道的全文：

李昌向大会汇报了一年多来的一些工作情况和经验。

一、彻底揭批"四人帮"，把清查工作搞到底。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院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欢欣

鼓舞，奋起同“四人帮”斗争。但是“四人帮”在我院的帮派骨干还在负隅顽抗。在这紧要时刻，华主席、党中央派来了方毅同志，恢复了一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同志的工作。我们明确指出，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同“四人帮”在我院的帮派头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运动要做到“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开打垮他们结帮篡权的帮派势力，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运动迅速打开了局面，掀起了高潮。挖出了控制院内一部分单位的帮派骨干，查出向“四人邦”写黑信、告黑状的多起。我们还下决心，除恶务尽，进一步查清了一些帮派骨干的问题，一些后进单位的运动也迅速赶了上来。现在，我院清查工作即将基本结束。我们今后一定要严肃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处理这些帮派骨干的问题，悔改从宽，抗拒从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坚持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绝不养痈贻患。

二、整顿领导班子是关键。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兄弟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调进了一批革命干部，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职务，又提拔了一批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干部，配备了一些单位的一、二、三把手，调整了多数单位的领导班子。事实证明，整顿好领导班子，是搞好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一年初见成效的关键。

三、澄清路线是非，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去年我院召开的和参加的几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传达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对科学技术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三大革命运动要一起抓，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研究

所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并重申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坚持学习和独创相结合，学习先进，赶超先进。在澄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一年多来我们恢复和建立了以下几项规章制度：（一）切实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配齐政治、业务、后勤等系统的干部；（三）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恢复科研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的技术职称，明确职责；（四）定期进行业务考核，提升科技人员。

四、制定规划，掌握和发展新理论、新技术。我们去年制订的基础科学的规划中，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六大基础科学及各分学科做了全面安排，选定了若干重点项目。

五、选拔和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大力办好中国科技大学。为了培养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准备邀请国内外的优秀科学家举办讨论班，组织具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进修，并将派出水平较高的科学技术人员，出国参加研究工作。

六、加速科学实验手段现代化，建设一批先进的实验基地和实验室。我们确立建立一批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其中包括高能物理，重离子物理，受控热核反应，半导体科学，固体物理，分子生物学（包括遗传工程）和天体物理实测等实验基地。要在各个科研单位加速设备更新和实验室改造，大力发展科学仪器的生产，扩建一些科学仪器工厂，并将大力加强科学书刊和资料的出版工作。

七、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为了推动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去年 10 月，我院开始筹办《自然辩证法通迅》。

李昌说，一年多来，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进一步努力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的突出报道和为此而配发的"短评"，在科学院引起热烈的反响和一片欢腾。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用诗人的手笔，描绘科学大会的召开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是对科技光明前景的欢呼，也是对科技不断出成果、出人才的期待。

余焕春

# 《人民日报》与天安门事件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亿万人民积怒在胸的一次总爆发，终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的坏事，人们知道得也有限。但历史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每当人们回忆这件往事时，常为不知其细节而流露出几分遗憾。基于此，作为一名记者，又曾经是《人民

日报》社清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之一，感到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和史料记录下来，做些弥补的工作。

## 20.1 姚文元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14日《人民日报》1至3版竟然没有出现一点悼念文章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开始不时地传到编辑部，人们的心情变得万分沉重，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虽然同时也传来了邓小平复出的喜讯，2月邓小平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时形势总是朝着与大多数人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事情很快又变得更糟了。报上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所谓当代“大儒”的调门愈来愈高，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同时也指向了邓小平。同志们莫不感到失望，心情更加沉重。

1976年1月8日，正是光明与黑暗决斗的前夕，周总理不幸逝世，全中国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下禁令，限制《人民日报》进行报道。人们泪流满面，围在报社门口阅报栏前，阅读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的情景；不尽的人流，从长安街慢慢地走向北京医院那间小房子，与周总理告别时失声痛哭的情景；北京200万市民扶老携幼，冒着刺骨寒风，肃立十里长街，默默向周总理致最后敬礼的情景……所有这些历史性场面，都不准我们报道，残酷地

蹂躏人民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

9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11日，姚文元蛮横地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成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为此，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东西"。

14日，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一文。文章开头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真是弥天大谎。这一天，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人民日报》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一点悼念总理的文字，多么冷酷无情哟！姚文元还得意地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清华大学的迟群说得更露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四人帮"和他们的心腹，总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改变民心、夺得民心，扭转当时的局面，但他们忘了，自古以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时局面是他们改变不了的。广大读者看了14日的《人民日报》，纷纷提出抗议，电话铃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同志在电话中说："《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

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人民日报》社。鲁瑛等人将电话记录整理成内部情况，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其中对报纸提意见的内容，专门保留对报纸进行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印发，为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在报社内部，鲁瑛等人规定：不准举行悼念仪式，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要追查。还扬言凡是去天安门的，"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恐吓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但报社许多同志对这些禁令漠然置之，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人有增无减。报社新闻研究所还针锋相对地编了一个悼念周总理专辑，登在他们编的内部刊物《报纸动态》上。姚文元一看，凶相毕露，咒骂说："谁叫你们干的？是要翻案吗？要反革命吗？"

大家强忍悲愤，警惕的目光更加注视着"四人帮"及其一伙，看他们在周总理逝世后如何动作。

## 20.2 南京喊出"打倒《文汇报》黑后台"。4月5日，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坐镇小楼，要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

当"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删去3月5日一篇文章中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接着又在3月25日一篇文章中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等反对周总理的言辞后，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纷纷举着花圈，走向雨花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并在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弹，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标语。很快，声讨"四人帮"的烈火在许多地区相继燃烧起来。首都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活动，就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心，又影响和作用于全国各地。

"四人帮"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大火必将烧到自己身上，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与惊恐，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从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江、张、姚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他们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现摘录几条示众

3月30日王洪文电话：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4月2日15时40分姚文元电话：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

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电话：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电话：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小楼，用电话指挥记者：

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仅这几个电话，已足能看出“四人帮”要干什么了。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4月3日这一天，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姚文元下令写《牢牢

掌握斗争大方向》这篇社论的。社论每段写什么,引什么语录,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

社论写成送审时,姚文元又在文中加了"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句充满杀机的话。

社论4月6日见报。5日深夜,也就是"四人帮"对广场上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广大群众下毒手的同时,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要把这篇社论"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还对鲁瑛说,"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请看,姚文元对他亲自炮制的这篇社论是何等重视。可以这样说,4月6日社论是他4月3日日记的翻版,是他那一帮人当时心态的反映,是杀人的反革命信号。

## 20.3 12期《情况汇编清样》,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并诬"邓小平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从4月1日到5日,《人民日报》根据"四人帮"提前定的"反革命性质",突出采写、编发了12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经姚文元修改同意后,再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这些《汇编》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之能事，制造了许多假材料、假情况，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天安门广场上最大量、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民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要反映情况，当然首先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但"四人帮"心虚，害怕这些，一见花圈、诗文、悼词就删；一见群众反对他们，就怒火冲天，统统一笔勾销。留下的则是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和罗织的罪名。

且看他们是怎样陷害群众的。4 月 3 日《情况汇编清样》中提到一个署名"青年工人丁尧"的《倡议书》。作者以大无畏精神，揭露"四人帮"是"从内部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要篡夺领导权，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倡议书》结尾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姚文元作贼心虚，在《清样》中把《倡议书》全文删去，而恶毒地将"说共产主义空话"篡改为"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这么一改，痛斥"四人帮"是说共产主义空话的修正主义者的《倡议书》作者，竟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反革命了。

许多当时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会看到科学院一〇九厂用大字在四块牌子上书写的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也登在 4 月 3 日的《清样》上。姚文元竟在诗后批道："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于是，这个 500 多人的小厂，有 3 人被抓进监牢，30 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全部改组。姚文元这个刀笔吏，就是这样杀人不

见血的。

再看他们是怎样诬陷邓小平同志的。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与事件毫无关系。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大多数悼词和诗词根本没有与邓小平有关的内容。鲁瑛等人捞不到材料，就想从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邓小平有一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4月2日，《情况汇编清样》上登了该所放录音的情况，第二天姚文元就打电话让鲁瑛了解放的是什么录音。鲁瑛等心领神会，立即派记者去查，还要记者通过"内线"，搞所谓深层情况。4月4日，这位记者没有搞到录音内容，却有"意外收获"。他向指挥搞内参的头头汇报说，听说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室做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巨星陨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还听说小平女儿和其他人一起将花圈抬到了广场。头头听后如获至宝，要他赶快写出来，还说："不要小看这一二百字，可重要啦！"其实，邓小平女儿根本没有抬花圈去广场。他们这样写的目的，就是极力要说明花圈、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

就在同一天晚上，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比半导体研究所的材料更为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用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正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

"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4月5日晨，姚文元在这份手抄件上批道："此情况已口头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过，文字稿送毛远新同志阅。""四人帮"对这个材料断章取义，恶毒篡改，把小平同志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 20.4 在所谓"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营房"等问题上，篡改事实真相，炮制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4月7日，形势急转直下，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这天早晨，鲁瑛奉"四人帮"之命，带着几名编造天安门事件情况的记者和那几份《情况汇编清样》，赶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得意洋洋，劈头就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张春桥说："在清样基础上写，不要另写。"

大会堂内，"四人帮"额手相庆；大会堂外，群情激愤，像火山喷发的岩浆。善良的人们怎知一场更大规模的镇压就要来临。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当面赞扬："你们有功劳！"江青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关心地问："你们挨打了没有？"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鲁瑛等受宠

若惊,即时改编,把张、姚这些话统统塞进了公开报道。还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编写中间,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警卫车。"就这样,他们编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来回穿梭,为大造杀人舆论,急如星火。

大会堂里的气氛,很快传到了编辑部。同志们虽已感到眼下无法挽回大势,但并不绝望。大家只要一想到天安门广场那潮涌一般的群众情绪,就充满信心,并相互鼓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4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登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颠倒黑白、充满谎言的报道。在所谓"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入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一系列涉及天安门事件性质的问题上,"四人帮"都不择手段地掩盖事实真相,并进行篡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举报道中所引"反动诗词"为例: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这首诗就完全是"四人帮"篡改、拼凑起来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将这首诗的原文引述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对不起您,/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掏尽红心,/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挥尽血

泪,/难倾满腔悲愤思绪。/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功高日月,声震环宇。/国际史上,/永载您的音容笑貌;/革命路上,/踏遍您的稳健足迹。/风云涌,鬼神泣,/巨星一陨天地哀,/四海五洲下半旗。/可笑群魔不自量,/妄想重翻腥风血雨,/鼓唇摇舌,捧裾牵裾,/猿猴沐冠,什么东西!/让那些家伙看看吧,/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你们不祭我们祭。/总理精神万代传,/子子孙孙举红旗。/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

鲁瑛登《清样》时先删去前16行,即从"敬爱的周总理"到"四海五洲下半旗",还有最后两行"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姚文元审《清样》时,又接着删了11行,即从"可笑群魔不自量"到"子子孙孙举红旗"。后面倒数第五、第六行"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姚文元和张春桥各删一行。这还不算,他们又从《清样》中找来另一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拼凑到这首诗里。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登出后,举世震惊,海内外友人议论纷纷,来访者要求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内的读者不约而同愤怒地将报纸撕得粉碎。一位署名"一

名现场工人民兵"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4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这是人民对"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的声讨。

"四人帮"仍不罢休。他们继续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人们相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真的，邓小平这个总后台也是真的。他们又布置写一篇《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写评论的同志特意到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去了解审查天安门事件案子的情况。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说，他们在审讯中没有发现什么写信要邓小平当总理、放邓小平讲话录音的材料。有的同志甚至明确讲，天安门事件是《文汇报》攻击周总理的文章引起的。

可是，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去，反映上去了，说真话的同志是要遭殃的。于是，真理被封锁了，谬误得以流传。"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天安门事件蓄谋已久"，"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等等颠倒是非的话，都塞进了4月18日这篇社论中。

尽管"四人帮"造了那么多陷害革命群众和领导干部的舆论，他们追查所谓反革命的工作依然遇到很大阻力。姚文元打电话对鲁瑛说："追查反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较多，是否要研究一下，写篇社论。"写评论的同志又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了解情况，并告知姚文元要写社论谈"阻力"问题，请他们帮助考虑社论怎么写，是否要写这样的社论。公安部领导同志说，

这事要向华国锋同志请示 姚文元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 20.5 中央派迟浩田为首三同志进驻报社，领导报社清查工作。我因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积极，险些被打成"现反"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派以迟浩田同志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报社，《人民日报》获得了新生。不久，我被大家推举参加领导报社清查工作，从小汤山"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许多同志对我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回到编辑部，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 1976 年 12 月 10 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三人名义报送党中央。

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飚同志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年多过去了，材料如石沉大海。尽管党中央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问题，许多无辜被捕者得到释放和平反，但整个事件本身的性质没有改变，因而平反是不彻底的，不少地方有关这方面的人和事，都留有尾巴。

怎么办？我想起了刚刚恢复活动的全国政协，那是民主协商大事、广开言路的地方，我决定带着清查材料到政协会上去呼吁。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间的

斗争还很尖锐，可能会有风险。所以我到政协去发言，事先没有同政协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也没有请示报社领导。万一有什么事，言责自负，可以减轻他们的责任。

1978年2月8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开会，我以政协委员身份在会上发了言，吁请委员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努力。会上，我把报社清查出来的问题，向委员们作了介绍，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吴世昌、杜任之、李初梨、孙家祁等委员，都就天安门事件发了言。

事隔不几天，果然出了麻烦。一天，报社总编辑胡绩伟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严肃地要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看后他什么都没有透露，只是对我说："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向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这使我甚感诧异，并预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便多问。我想，一定是政协写简报向上汇报了。于是，打电话给政协文化组，希望看看简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电话里得知，政协机关也在查问2月8日文化组开会的情况，他们说政协简报写好了尚未发出，上面是看了统战部的简报发怒的。谁发怒？讲了什么？全不得而知。

一个多月后，当时政协文化组组长周扬在一次例会上说：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周扬同志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不赞成这种动不动就追查的办法。听了这番话，我精神为之一振，但究竟是什么人要追查我的发言呢，仍是个谜。半年后，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胡绩伟、曾涛、杨西光、

华楠、于光远、王惠德六位同志的联合发言，才揭开这个谜。

原来是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看到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立即召集四大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开会，讲了一通要警惕帝修反的挑拨、把好宣传关之后，转而厉声训斥："帝修反在挑，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2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他还说，天安门事件这案一定要平反，否则人民不平。他说，有人认为翻天安门这个案，有损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错案真正翻过来，毛主席的旗帜会更加鲜艳。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党员，党员能这样说吗？"知道这些之后，真使我不寒而栗。要不是周扬同志仗义执言，要不是胡绩伟同志尊重事实，不顾自己头上的乌纱帽，顶住了巨大压力，我恐怕早已成了"现行反革命"啦。

其实，当时毛主席的情况，这位领导同志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一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同志回忆说："1976年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日子毛远新时常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之类的话。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5日，毛主席正重病卧床，江青说有事要同主席谈。她

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开会的详细情况。'不多时，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汇报后用红笔在另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这些事实，是任何个人意志都改变不了的。

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是大快人心事，但首都新闻界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等几位老总，觉得这个宣布没有直接道出平反这一点，是个不足。于是，他们聚在一起，研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种补救办法。经过一番思索，得出了一致意见：由新华社专发一条北京市常委扩大会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新闻，鲜明地提出："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北京市委扩大会宣布的内容中没有这一提法，因而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事关重大，他们又请来于光远等名士一起再商量。大家觉得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因为北京市委宣布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把"四人帮"妄加的"反革命"罪名颠倒了过来,这当然是平反了。

就这样,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时,特地认真作了标题,主题强调北京市委宣布的"革命行动",副题补充说明"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6日《人民日报》和首都以及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照登不误,读者反应非常好,认为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胡耀邦同志看到后,自然明白这条消息的用心,只对胡绩伟说了一句:"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未再多说什么。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包括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这一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公报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人们至今也忘不了中央这一结论当时在全国引起的欢腾局面。

这就是事实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于光远

#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 21.1 新华社社长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11月17日我整天关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反应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

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8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

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

## 21.2 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和《人民日报》,才把这个实质挑明,起了一个"拔高"作用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作了一番文献考证。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

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作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

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 1977 年 3 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 年 11 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 11 月 15 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 1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 21.3 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有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 年"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 478—479

页)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而在 1994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 月 14 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 1976 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 44 页)也是在 1994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 165 页)。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

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作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作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

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十一月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作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作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